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論汇编

内部資料·供批判参考

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編印

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

每册 0.70 元

D 2-0
39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这張大字報和这个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实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見，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前　言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揪出了长期以来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刘少奇。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从来就不是一个眞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是我们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后台老板，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对于刘少奇，看一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敢不敢夺取政权以及如何夺取政权的革命根本问题上，他追随大叛徒陈独秀、王明，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积极宣扬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如何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问题上，他反对毛主席一贯指示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导；而是大肆宣扬可耻的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歪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极力鼓吹投降主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去进行"**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公开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幻想用"议会"斗争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在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他反对毛主席关于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贯彻执行了一条"**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脫离中央路线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建国初期，他反对毛主席制订的党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公开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光荣"，鼓吹"四大自由"和"剥削有理"的谬论，大肆鼓吹发展城乡资本主义经济。

对一九五〇年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他胡说"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的严正指示，扼杀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場重大的斗爭。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爭**"，关于"**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爭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理论，极力宣扬阶级斗爭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爭，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他利用三年困难时期，反对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各方面贩卖并执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貨。在政治战线上，他大刮"翻案风"，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经济战线上，他积极鼓吹"三自一包"和"自由化"，大刮"单干风"；在统一战线上，他极力宣扬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他大肆鼓吹"三和一少"；在教育路线上，他积极推行资产阶级的"双轨制"等等。所有这些，完全暴露了他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个人野心。

为了从思想战线上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他在一九六二年又重新增订出版了他那本黑《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爭、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爭，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妄图通过这本书，一方面抵制林彪同志提出的大学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的号召，一方面又得以宣扬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世界观，改造共产党的面貌，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蜕变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驯服工具"。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炮制了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提出和推行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歪曲"四清"运动的性质，攻击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过时了"，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当前这場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剝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为了反对这場大革命，刘少奇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指出，制订这条路线的人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場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推行这条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妄图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他长期以来在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势力，并保护他自己。

上述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罪恶事实，彻底地集中地暴露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眞面目。这些事实说明，他是一贯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一贯猖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

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热爱还是仇视，就是眞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刘少奇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人民的死敌，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些事实说明，长期以来，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在我们党內，两条路线的斗爭是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在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刘少奇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关鍵时期、关鍵问题上，都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妄图实现历史的大倒退。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历史紧要关头，都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他作了坚决的斗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他一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場上，死抱着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不放；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发展，就越要触及他的肮脏灵魂，他就越是要疯狂地、变本加厉地反对，歇斯底里大发作，实行白色恐怖。两条路线的斗爭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爭。他是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也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必须斗倒党內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些事实还说明，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中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总指挥、总头目。他们日日夜夜，伺机篡党、篡军、篡政，阴谋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如果他的罪恶活动得逞，**“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請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場新的伟大战役已经开始了。

这場新的伟大战役，就是要把炮口对准刘少奇、对准这个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猛烈的总攻击，对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和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在这場新的伟大战役中，摆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光荣的、严肃的战斗任务，就是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彻底清算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淸他的流毒，根除他的影响，把他彻底批倒、批深、批臭。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才能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才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爭，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爭；才能把大批受迫害、受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才能使一些受蒙蔽、受欺骗、受毒害的同志淸醒过来，不再继续上他的当，眞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淸界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

器。在当前这場大批判、大斗爭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眞正学到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林彪同志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带着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和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必将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必将取得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为了积极地投入这場伟大的战斗，为了适应这場伟大的群众批判运动的需要，我们带着对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比仇恨，编辑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这本材料。为了表示我们的战斗激情，在编辑中，我们在这些修正主义言论的每一章前面，都加上了几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作为我们批判的最锐利的武器。同时，我们在每一章前和若干段落后，还加上了一些按语。

由于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够，掌握材料有限，错误遺漏和不当之处，深望革命同志们提出意见，批评指正。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同志的有力支援，我们还吸收、利用了许多革命组织编辑的材料，我们向这些组织和同志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

目　录

前　言

一、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1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叫嚣要毛主席“下台”……2

（二）诬蔑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胡说毛主席也犯了“错误”……5

（三）抹煞毛主席伟大的领导作用，反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8

（四）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抹煞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11

（五）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教条”，公开叫嚣对毛泽东思想“可以怀疑”……14

（六）借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诬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为“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16

（七）无耻地吹嘘自己，妄图篡党、篡政……20

二、追随大叛徒陈独秀、王明，积极宣扬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24

（一）投机参加革命……24

（二）诬蔑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宣传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胡说北洋军阀可以“让出政权”，国民党“同情”和“援助”工人运动……26

（三）鼓吹依靠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反对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28

（四）在白区工作中顽固执行关门主义，拒绝利用合法斗争，鼓吹“集中力量，打击在野反动派”……30

（五）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经济主义……31

（六）荒谬地把雇农和贫农分割开来，否定农村广大贫农的伟大革命作用，片面强调依靠雇农……32

三、无耻歪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肆宣扬投降主义……33

（一）竭力否定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胡说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通俗、合法的组织形式”，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34
（二）鼓吹华北各武装部队“合并起来”，“统一指挥”、“统一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统一”于蒋介石国民党……36
（三）鼓吹阶级合作，宣扬工农和地主资本家应“抛开仇怨”，“互相让步、道歉”，提出富农也可以加入农会……37
（四）抹煞群众工作中的阶级斗爭，企图把群众运动引向经济主义的道路……38
（五）否认和曲解人的阶级性，诬蔑劳动农民……40
四、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43
（一）配合美帝及其走狗发动內战的阴谋，拚命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人民的斗爭……44
（二）叛卖革命，阴谋放弃武装斗爭，交出人民的军队，鼓吹“合法的、议会的”道路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易……44
（三）在对待被俘蒋军反动军官的政策上抹煞敌我界限，大搞阶级投降主义……46
（四）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47
五、在土地改革中制定和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49
（一）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胡说土地改革搞迟了，宣扬蒋介石和美国共和党也不反对土改……49
（二）制定和推行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线，强调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50
（三）取消党的领导，宣扬“自发运动”，鼓吹“由农会来篡党篡政”……53
（四）诬蔑农村党组织，排斥、打击基层干部，用“搬石头”的办法把广大革命干部一脚踢开……54
六、妄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58
（一）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剝削合法论”……59

1. 胡说剥削有理，美化资产阶级……59
2. 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叫嚷剥削阶级可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65
3. 歪曲党的统战政策，对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只团结不改造……67
（二）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诬蔑和攻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70
（三）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鼓吹发展城乡资本主义……72
1. 胡说国家在工厂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要依靠资本家和资本家的代理人……72
2. 鼓吹公私企业合作发展，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75
3. 鼓吹"长期"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78
（四）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79
1. 鼓励发展个体经济……79
2. 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81
七、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83
（一）叫嚷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基本结束"……84
（二）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取消阶级斗争……87
（三）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88
（四）为右派进攻煽风点火，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89
八、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92
（一）歪曲三面红旗，大刮"五风"……93
（二）攻击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96
（三）诬蔑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比例失调"……96
（四）叫嚷"人民公社办早了"，有"瓦解的危机"……98
（五）胡说三面红旗使经济临近"崩溃"，造成"漆黑一团"……100
（六）叫嚷"非常时期"，实行生产大倒退……103

（七）攻击庐山会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104
九、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航道……106
（一）打着“统战”的幌子，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107
（二）纵容资本主义自由泛滥，推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破坏工农联盟……111
（三）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培植私有经济……113
（四）提倡学习中外资本家的剥削经验……115
（五）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取消党的领导，推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116
（六）鼓吹利润挂帅……121
（七）打着“亦工亦农”的幌子，大念资本家剥削经……122
（八）反对突出政治，鼓吹技术第一、专家第一，大搞物质刺激……127
（九）在文化出版广播事业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132
十、在国际斗争中贩卖修正主义黑货……136
（一）吹捧现代修正主义，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三无”……136
（二）吹捧美帝国主义……143
（三）在反美统一战线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44
（四）攻击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145
十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47
（一）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思想……148
（二）推行资产阶级教育的“双轨制”，反对教育革命……150
（三）阉割半工半读教育的革命内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154
十二、制定和推行形“左”而实右的“四清”路线……163
（一）把农村大好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否定“四清”运动的伟大成绩……164
（二）歪曲“四清”运动的性质，转移斗争目标……168
（三）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实行“三结合”，排斥打击农村广大基层干部……169
（四）片面强调退赔，把政治斗争引入经济主义邪路……172
（五）否定调查研究……173
（六）大捧王光美……174
十三、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77

（一）疯狂反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179
（二）支持和包庇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和一切牛鬼蛇神……181
（三）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派工作组，大搞国民党的“训政”……183
（四）颠倒黑白，围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186
（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189
（六）开脱罪责，布置退却，妄图“秋后算帐”……192
十四、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195
（一）宣扬剥削阶级的道德，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面貌改造党……196
（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鼓吹修正主义“全民党”……201
（三）取消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鼓吹无原则的和平，腐蚀党的战斗性……203
（四）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奴隶主义……206
（五）取消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工作，破坏它的战斗堡垒作用……208
十五、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210
（一）大肆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反动哲学……211
（二）极力鼓吹私字当头、名利挂帅……215
（三）宣扬叛徒哲学，炮制叛徒集团……222
（四）提倡反革命的“合二而一”谬论……224
（五）兜售假共产主义……225

最 高 指 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林 彪 同 志 指 示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在接见高等军事院校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

一、猖狂反对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对偉大的毛泽东思想

編 者 按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他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最正确、最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評价，說出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里話。林彪同志对捍卫、宣傳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貢献。

可是，刘少奇却頑固地坚持資产阶級反动立場，一貫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每当国内阶級斗爭激烈的紧要关头，他就更加瘋狂地进行这种罪恶活动。早在抗日战爭时期，他就公然抹杀毛主席的偉大的領导作用，胡說全党的領袖“很久沒有实际的形成”。抗战胜利后，他又丧心病狂地叫囂毛主席也“可以反”。到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已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隨着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阶級斗爭的深入发展，日夜夢想着資本主义复辟的刘少奇就更加处心积虑地瘋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一九五〇年，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刘少奇却說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以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羣众运动蓬勃开展，刘少奇一方面誹謗偉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教条”，誣蔑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羣众运动是“形式主义”、“庸俗化”、“簡單化”，为国内外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攻击毛泽东思想定調子；一方面再次抛出他的不要革命，不要阶級斗爭，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級专政的彻头彻尾的妄图篡党篡政的修正主义黑綱領、欺人之談的《論共产党員的修养》，宣揚腐朽的資产阶級世界观，宣揚反动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明目張胆地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对抗。在“八大”会上，他公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針”这个确定不移的原则从党綱中删去。此外，他还到处做报告、講話，全面地系統地惡毒地攻击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泽东思想。他妄图取消毛泽东思想，叫囂“不带任何框框”，誣蔑毛主席“犯了錯誤”，攻击毛主席不实事求是。更令人气愤的是，他竟猖狂到要毛主席“讓位”、“下台”，甚至公然叫囂“篡党”。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們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正确領导的結果，我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偉大胜利。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誰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人民的死敌，就要全党共誅之，全国共討之。我們一定要清算刘少奇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的罪行，把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權派、个人野心家和反革命阴謀家拉下馬，叫他靠边站！

（一）惡毒攻击毛主席，叫囂要毛主席“下台”

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的形成，党在各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的形成。

《论党内斗爭》（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领袖不能自封，那得人家承认，自己承认是不算数的。强求势必要发生错误，另搞一

套不行。一定这么搞，就会和人民的方向对立起来。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眞正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作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內决不能成为领袖。

同 上

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內曾经是不少的。在过去某一时期內，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內出现，幷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別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內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內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眞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眞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爭，而是党內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蟊贼。这种人在党內，终归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和抛弃，是无疑问的。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內就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十一页

〔按〕《論共产党員的修养》一書，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修改过一次。在那次修改前，这段話开头是这样的："这一种人中最坏的代表如中国过去的李立三、張国焘等，就比上述的情形坏。"一九四九年改为"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內曾是不少的。其中最坏的代表，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就是說，刘少奇在最初講这段話时，是指李立三、張国焘等人的，而修改后它就是通論泛指了。可見，刘少奇从一九四九年起已經把矛头轉向我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了。一九六二年，把这句話改成現在的样子，同时把最后一句中的"完全"改为"从此"，也就是說，从"过去某一时期"以后，不能說沒有这种人。这不是更加露骨地攻击毛主席嗎?!

眞正刻苦修养，忠实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绝不计较自己在党內地位和声誉的高低，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人家或幻想人家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他认为自己沒有这样的权利。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十二——十三页

每个党员不论他能力多么大，不论他做什么工作，起多大作用，他总不过是几十万党员中的一个，是列宁党的这个矛盾机构中的一分子，应该是站在党內来领导和推动整个党而不是站在党外或党的头上来领导党。列宁、斯大林都是站在党內来领导党，幷推动党前进的，都是作为一个党员在党內来起作用的。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秋）

党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党內斗爭的态度，他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些

似乎疯癫的人看来，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们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争的对象，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内斗争中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依靠这种错误的斗争，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内斗争，才算是“布尔什维克”。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眞正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对党开玩笑，把极严肃性质的党内斗争当作儿戏来进行。主张这样做的人，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来投机的人。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七十一页

这种对党内斗争的绝对态度，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被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党内的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发展到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依靠这种所谓斗争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

同上，第六十四页

“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无虚假？”我们党“不懂装懂”，“就是没实事求是”。大跃进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是“戴帽子，乱斗争”，“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革命”。这是因为“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不要欠帐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

《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

老的不行嘛！不要占着茅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帮头子黄金荣，他的徒弟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地把座位让给了蒋介石。

《同薄一波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六、七月间）

刘少奇在攻击了“庐山会议犯了错误”后说：“把位子让给能干的，自己当助手，不会吃亏，威信也不会降低。”

《在济南军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你们反对中央局，我们可以撤回来，你选一个，如能保证对一千二百万人民有利，为何不可以这样作？不只中央局，毛主席也可以反，如他错了，如有人比他强的话。中央不是没有换过的，过去中央换了多少负责人，……。只要换的好，我赞成。如果换坏了，我要反对，换来换去，换得更不好，不行。

《对晋察冀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清华有一个人贴了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就揍他了，一揍他就

揍怕了，如果保护他一下，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让他多写几条反动标语，多发表反动言论，这并不妨碍大局。

《在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我们服从党，服从中央，服从眞理，而非服从个人。任何那一个个人都不值得我们服从的。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秋）

有些人把党当成汽车，他是开汽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驭党，否则他就是汽车，党来开他。党是不是工具，是工具，我们也是工具，工具论。……范瑾是不是工具，你们是不是工具，编辑、教授、专家、主席是不是工具，都是工具。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不要喊万岁，不要唱东方红。……我现在要搞邓小平同志威信，……我沒有损坏彭德怀的威信。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

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搞邓小平的个人崇拜。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

刘少奇给胡乔木下达指示说"引用毛主席的话或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呼"，"主席的话不要用'教导'、'指示'等词"，并恶毒攻击说："沒有听说把列宁叫列主席的"。

摘自《胡乔木检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二）誣蔑毛主席的英明領导，胡說毛主席也犯了"錯誤"

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刘少奇到他的家乡炭子冲时，对当地农民干部谈及这几年的灾害时说："毛主席也犯了错误。"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编印：《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言行录》第三集，补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领导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对领导人解决问题不应该这样要求，特别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他的决定、指示、政策、办法，自应力求完滿，但事实往往相反，……事实上并沒有这样的领导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装腔作势，猪鼻子上插葱装象。除过去的皇帝那样想，但到事急时，也下罪己诏。只有蒋介石才说："我是不会错误的"，但他下面造反了。对于领

导上不能要求其沒有错误。上下古今沒有十全十美的领导者，不能避免错误。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说：不怕中央犯错误，那有不犯错误的中央，有时犯路线错误，有时犯原则错误。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曾希圣不靠实事求是吃饭，总是要倒台的，那个人都是一样。

马列主义研究院大字报：《揭露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那个人走路不跌过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决议错了，可以改嘛，任何一个决议或者一项政策，不管是中央的或者是谁的，错了都要改，不改就是非马列主义。

总之，有错必改，不论谁(错了)都要反对，当然有错而改了的中央，要拥护。那有人不犯错误的，如果不然，有错不改的中央，那就不拥护。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反之，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嘛！……不要怕孤立。

至于历史决议错了也可以改嘛！田家英现在修改毛选注，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毛选注中有错要改。

《对李雪峰和朱理治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

经济工作中犯过错误，土改工作中犯过错误，组织工作中犯过错误……过去犯的那些错误，是马克思、列宁早就说过了的。

马、恩、列、斯都发表了很多书籍，问题是你沒读过。很多事情，那里都讲了，问题就是你们沒有去看。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我劝告同志们，不要作括弧里面的“左”派，要作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作那一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加括弧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的后果来说，和“左”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作风的，更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作风的。在我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我们党内产生的脱离实际的右倾错误或者"左"倾错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忽视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以为凭主观想象，凭一时的感想，或者仅仅摘引某些书本上的个别语句就能指导革命。大家知道，这些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各种挫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办食堂，搞水利，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一直到现在全世界沒有一个万头猪場，因此根子还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加油添醋了。

…………

餓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沒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沒有不犯错误的人。……

《接见工作队负责人、县委书记、工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炭子冲大队和四个生产队干部、部分社员时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在汇报会上，当汇报到大跃进时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不同的看法时，刘少奇说：对错误的看法，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总的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革命沒有搞好，犯了错误，批评一定要批评陈独秀、李立三为什么会出问题。

《对工交会议的一些指示》(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间，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说："对形势的估计，有三种情况：刚好，过头，估计不足。从过去到现在，是估计不足，现在看来，把困难估计过头一点，比估计不足好些。现在还沒有发现由于估计过头而遭受损失的，将来可能有，现在是由于估计不足而遭受损失。"

又在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说："对形势估计不足，实际情况更严重得多。"

马列主义研究院大字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头目刘少奇猛烈开火》第二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加上实事求是才更完全。(一九六二年)

马列主义研究院大字报：《揭露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刘少奇在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中所犯的错误，是毛主席亲自多次指出并纠正的，但是，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却想翻掉毛主席对他批评的案，说什么"过去那个'搬石头'是有过错误的，但是，如果眞是石头，要不要搬呢？……那必须搬，不搬不行。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也总结得不全面"。

国务院农林口大字报：《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在农业工作中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认眞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你们这些话，不完全正确。

《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

故意的人为的使斗爭激烈化，使斗爭紧张起来，似乎要来制造斗爭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象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解决，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懂得的，你们就要在这次整风学习中，运用辯证法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同杨献珍、侯维煜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五月）

官僚主义这个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几乎是很难避免的，领导机关、领导者稍稍要犯一些的。

《对上海党员干部的谈话》

〔按〕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傳工作会議上的講話》的报告，刘少奇就到处講演反对，誣蔑毛主席犯了“官僚主义”。

官越大，眞理越少，官做得越大，眞理也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

原来我们的计划沒有这样快，毛主席三个报告是三个数字：头一个报告是七年合作化，第二个报告是五年合作化，第三个报告是三年合作化，结果一年就合作化了。所以，毛主席说：“我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哩。”

《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三）抹煞毛主席伟大的領导作用，反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內，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沒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作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爭的经验，坚持眞理，修正错误。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们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按〕总路綫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刘少奇只字不提。

我们之中沒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视野广阔，在需要坚决行动时，他总是能找出正确的道路，并立即将矛头指向打击目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我们的经验是要组织力量，集体创作。国际共运总路线二十五条，写了三十六次稿子。要征求有领导经验有水平人的意见，也要征求读者的意见。要征求领导人的意见，也要征求群众的意见。

《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主席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按〕"二十五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在这里刘少奇只字不提。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由刘少奇、邓小平最后定稿。原稿有这样一段："象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爭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刘、邓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前面加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的提法，反对关于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得多的光辉论断。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把"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

北京师大编大字报：《刘少奇罪行录》

当时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领导的错误，虽然有上述二个原因在当时的存在，但共产党若领导正确亦不致于失败到那样的程度，——年纪大的有错误，年纪小的沒有经验，共产党的内部沒有很好的团结。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三九年五月）

〔按〕否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綫与陳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对抗。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九卷），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因为未看《两个策略》，使中国革命胜利一下迟了二十年。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按〕别有用心地宣傳大革命的失败是沒有看《两种策略》的結果，而不是当时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排斥毛主席的正确路綫的結果。

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天才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那样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看成是天生的神秘人物。这种说法和看法对不对呢？我想是不对的。

我们普通的同志，今天诚然远沒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那样渊博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深和渊博。但是……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十页

中国共产主义者三十年来，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运用了这些原则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有效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宣传了马列主义。这主要应归功于我们党的杰出的马列主义宣传家毛泽东同志，我们应以毛主席为模范来宣传马列主义。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按〕刘少奇只提毛主席是馬列主义宣傳家，惡毒地貶低毛主席的偉大导师、偉大領袖、偉大統帅、偉大舵手的作用。

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我们要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八页、第十三页

〔按〕就是不提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鍛炼和修养的模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八页

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什么人喊一下就会出现的，也不是什么人反对一下就会垮台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按〕貶低毛主席領导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偉大貢献。

报纸、党、国务院、主席、总理，是不是工具，国家是不是工具，都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按〕刘少奇在这里最惡毒地攻击偉大領袖毛主席，为他妄图篡党篡政作輿論准备。

（四）否認毛泽东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峯，抹煞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七大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伙同邓小平竟在八大党章总纲中篡改成：“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摘自《“七大”党章》、《“八大”党章》

党员课本的原稿中引用了军委决议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在后来被刘少奇删掉。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编印：《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言行录》第三集

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看，是错误的，是机械唯物论。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我看可以学到的（按：指主席的思想），不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按〕林彪同志說毛澤东思想是馬列主义的顶峯。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为了贬低毛主席，抬高他自己，讲话中很少提“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万岁”。他还提出“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谦虚”的反动原则口号。……直到一九六六年上海会议上，他还说：“以前提出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谦虚，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

外文局大字报：《××把持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刘少奇反对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黑据点》（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刘、邓主持团中央，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請示的批复中规定，宣传中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不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起来。如果必须提到“毛泽东思想”时，则应说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同　上

学习国际经验，现在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內容是有历史以来无比丰富的。世界任何大的原则问题，均已经解决了，如民族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秘密工作问题等等，中国有

吃饭、住房问题，外国也有，甚至城市地皮问题也可以参照苏联、马、恩、列、斯的理论。所以马克思的书都可以学。能这样学就站起来了，不爬行了。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

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的。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那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沒有出来，这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

《答宋亮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

同 上

……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体道路，又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特别困难些。

同 上

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沒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很好的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一九四三年）

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党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缺点的。

《对马列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十五页

如毛主席湖南农运报告，分阶级办法，基本上也合乎马克思主义。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毛主席所提倡的开调査会的调查方法已不够，已不足用了。

《在长沙县光华大队对干部训话》（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

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跟刘少奇到各省，他召开了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各中央局省

委地委作报告时说："现在无论在农村、在城市了解情况，用过去毛主席的那种办法开调查会已不行了，光华大队蹲点的事就可以说明。"

摘自×××医生大字报

用开调查会的方式来调查研究，现在已经不行了。

向中央机关领导干部作的《关于蹲点问题的报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证实和新胜利。……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不论在经济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次历史事实和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恰恰是反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同 上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到宽广的传播，并且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是，某些重要的特点也可能在别的一些国家中重新出现。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

同 上

〔**按**〕刘少奇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林彪同志說："我們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毛主席仅仅是正确地提出了和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规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的一切成就，应该归功于全国各族人民群众。"

同 上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吸取了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我国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联盟的理论和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总结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化的经验，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按〕刘少奇在《講話》中，論述党的四十年历史，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否認毛主席对馬列主义的創造性的发展。

过去我们说过，也和一些外国人谈过，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会不会复辟？在实践中还沒有完全证明不会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会复辟，但我们要努力避免。有什么办法避免呢？根据的就是那三条措施：第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要坚持到底；第二是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搞半工半读，全日制要改革，还要加强业余教育；第三是干部参加劳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这三个办法。同志们可以想一想，看是否还有第四个办法。我们把这三个办法实行了，也许能够避免，也许还不能避免。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按〕否認毛泽东思想是反修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现在我们所想到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现在我们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两条，是否还有第三条，还沒有想到。

《对何伟、刘季平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我们要大抓马列主义研究，主要是反对外国修正主义，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发展，我们要打开人们的眼界。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传达：《刘少奇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讲一讲资本主义复辟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结合，就可以反对复辟。学习马列，此外别无保证。马恩时无这问题，列宁取得了胜利，就想到了这问题。有人主张“不要共产党的苏维埃”，以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作了斗争。但是经验还不够。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南斯拉夫。出了南国还不注意，如果仅出赫鲁晓夫，无产阶级还是教育不过来的。苏联不出这个乱子，我们就不能注意，匈牙利、波兰事件就不能注意嘛。有二十大，有个世界反共高潮，我们就紧张了。这个代价也划得来。

《汇报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

(五) 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教条”，公开叫嚣对毛泽东思想“可以怀疑”

我们应该向谁学习。要向党內外一切有眞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

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眞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

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错误，党内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给江渭清的信》（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

老实说，你（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那篇讲话，几乎沒有什么创造，空话连篇，讲话的前一部分，是大段摘引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沒有你自己的多少话。

由于你是大量地摘引和重述别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即使都是很好的话，……都找不出错误，……但是你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错误，党內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学习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只要几句话就够了。

我在南京的讲话的全部精神，你并沒有说出来，似乎你对我在南京的讲话，还有某些保留。

同　上

既要有实际经验，又要有理论知识，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两者不可缺一，否则就是跛脚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就是跛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眞理，把马列主义普遍眞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际正确指导的可能。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沒有学习、沒有研究，就沒有发言权。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百家爭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家爭鸣"的口号，最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后来毛主席把它提高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鸣"政策。很多东西也不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不过是加以总结提高。为什么要提百家爭鸣？要反对教条主义，不要一家之言，应该百家爭鸣。你们学习，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迷信别人，……不要怕，什么都可以怀疑。……你们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沒有？沒有看过的可找来看看，那上面改的很多，他为什么要改呢？就是因为有错吗？

《与北大历史系同学谈话纪要》（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

（王光美）离开北京之前，曾請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要解释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按〕攻击工作队員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是带着框框。

（六）借口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誣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为“形式主义”、“簡單化”、“庸俗化”

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说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因此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已经学过马列主义著作的，要继续学习；还有沒有学过的，那就要学习几本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还有一些人对外国历史不懂得，这些困难就比较多些，有些科学知识很少，甚至连简单的数学、物理的书本都沒有学过的，只学过经典书籍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有困难。……如有本国历史知识而无外国历史知识的人，那就可以先学习外国历史。……

同　上

我们不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沒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相当困难。

同　上

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体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验。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按〕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着学习馬列主义即外国經驗的招牌，抵制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首先，我们必须认眞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在地方的县以上，在军队中营团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特别着重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八大"第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一九六三年刘少奇对林枫说：不管什么专业，都要把马列主义学好，学不好就办不好。

军工大字报：《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要吃透两头，一头马克思主义，一头群众。

《对李雪峰和朱理治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

你们要看得宽一些，要作一点试验。现在已经有萌芽，如农村三社合一，可否搞得更完备一些。已請陆定一同志去搜索材料，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怎样想的。

《在劳动部对司局长以上干部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按〕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在当前爭论的每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样讲的。我们就会眞正懂得客观形势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又是如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面孔就会一目了然，清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我认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

《在河内阮爱国党校的讲话》（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

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首先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請敎，认眞地研究他们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我们也要认眞地读读反面敎员提供的材料。包括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以及帝国主义评价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当然，也要读现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

同 上

课堂的学时（指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时）不要太多，主要在用的时候学。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编印：《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言行录》第三集

目前高级党校的干部迫切需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给高级党校的批示》(一九五六年)

我先读三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谈教育问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按〕就是不讀毛主席的話。

现在学习毛选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这样搞下去,会弄虚作假,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千万字的读书笔记,千万不要宣传。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正当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初召开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大肆攻击群众学习运动,大泼冷水,大打棍子,会后还立即把这次会议的黑内容写成“纪要”通知各地,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推行所谓“自愿原则”,胡说什么“不能卡得太死,不能千篇一律,不要搞成形式主义,不要形成社会强制。”

大字报:《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清算旧中宣部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三年杨献珍搞了一个《哲学教学总结》,猖狂的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伟大的哲学著作排斥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之外,幷恬不知耻的提出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学“今后的方向也就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去接受苏联哲学教学的经验问题”。一九五四年杨献珍把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总结》送到苏联高级党校“审阅”。苏联修正主义哲学家格列则尔曼写了一封回信赞扬杨献珍,恶毒攻击毛主席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简单化”“庸俗化”,散布了大量修正主义的毒素。刘少奇看到此信亲自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总结》也在《学习》杂志上发表。幷由旧中宣部大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通令全国党校和高等院校哲学教学研究室“座谈”学习。

摘自近代革命史研究所大字报

党员课本要通俗一点,不要摘引毛主席的话就当课本上的话说。

《接见中央组织部、各中央局组织部正副部长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说:毛主席语录可以学,但不要占过多时间。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编印:《刘少奇罪行录》

“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又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

刘涛、刘允真:《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六年二月,刘少奇诬蔑四清中大学毛主席著作是“用学毛主席著作去代替四清

运动”，规定四清中只许学“二十三条”。

清华大学《井冈山》：《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吴法宪同志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他在江苏太仓参加四清的情况。刘少奇听了以后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

吴法宪同志汇报中谈到沙溪公社的四清，目前正在进行组织建设，工作队提出必须在社员群众中深入地开展毛主席著作学习，要学得少而精，记得牢，用得活，使毛主席著作学习经常化，留下一个不走的工作队。

刘少奇指示说：很好，四清工作的成果发动广大群众来验收，要由广大贫下中农来验收，运动搞的好坏，建设工作搞得好不好，要由群众来评定，结论要由群众来下，送人情留面子，做好事由群众出面。工作队不要充当“好人”，工作队不要去做结论。

……总之，四清运动结束，要由贫下中农来验收。各项工作的落实，也要由群众来监督，这样四清运动的成果才能在群众中巩固扎根。

摘自《农村四清简报》第二十三期

一九六三年七月，刘、邓为首的黑司令部批准以“中央”名义批转旧中宣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规定地方不许代编印、出版主席著作，各地编选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著作，只准印活页，并严加控制印数，在机关内部发行，不得公开发行。

摘自新北大大字报

一九六〇年，十七届中华全国学代会主席团向刘少奇提出买不到《毛泽东选集》，刘竟说：这是纸的问题。纸要分轻重缓急，排个队。教科书一定要保证，一定要用好纸、白纸。

摘自团中央宣传部革命同志大字报

一九六三年，国际反修斗争极为尖锐复杂，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都渴望得到毛主席著作，作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但刘少奇在二月二十一日对外办《关于加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的批示，只字不提大量出版发行毛主席著作，竟说：“目前以出版发行反修正主义的书刊材料为重点。”

外文局大字报：《×× 把持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刘少奇反对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黑据点》（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五三年四月，杨献珍、侯维煜提出“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抗拒毛主席办党校的方针，反对毛主席办党校的革命传统。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方针是刘少奇批准的。

高级党校大字报：《刘少奇是“杨家党”和“林家铺子”的后台大老板》（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

（七）无耻地吹嘘自己，妄图篡党、篡政

刘少奇说：许多事情都是我作的，出名都是毛主席。

新西大大字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当我……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沒有树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起来了，沒树立以前就拚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刘克思？领袖来自于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

《在华东党校一次讲话》（一九四一年）

现在我来举几个实行领导的模范例子。

第一个是马克思的例子……（按即对待一八七一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态度的例子）

第二个是列宁的例子……（按即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出许多，我个人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形。那是在中国党成立的初期，我受党的委托在一个地方做工人运动。在那里我吸收了许多新党员，成立了一个工人支部，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人们的斗争情绪很高，大多数的工人和这支部中的党员都主张发动罢工。可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分析，在这时候发动罢工是一定要失败的。因此我不主张立即罢工。但支部的同志和工人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而且选我做罢工委员会主席，要我下命令宣布罢工。我怎么办呢？……我决定照大家的意见发动了罢工，而且积极地努力地领导了这罢工。不过在发动罢工之前，我就向大家声明，这罢工是要遭受失败的，不过你们大多数都主张要罢工。我只好照你们的意见去做。后来，罢工果然失败了，但是，因为幸而在我领导下，我事先已有预防，所以损失不大。大多数同志在失败后，想起了我早先的估计，因此对我更信任了，同时我也在这次罢工中做了一个服从组织的好榜样给全体同志看，使他们知道，一个党员应如何服从组织。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秋）

促进大也好，小也好，总算促进，这是一派。马克思促进，我也促进，你们也促进，我们是一派，和反动派不一样。反动派都是促退的，促退的不一定都是政治上反动的。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主席并未因此（指受打击）而松懈，反而劲头更大，读马克思主义，写出东西来，作出了成绩。我也是从一九三九年（按，作一九二九）起直到延安整风才讲清，也是十几年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

《与朱理治谈话》（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

对上边错误的东西要顶住，顶得长。不说谎、不造假，不要怕戴帽子，我和毛主席就戴过十多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在湖南公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插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搞实业救国的李烛尘，搞了一辈子工业，办起几个工厂，作了点有益的事，但不是解决人民需要的关鍵问题，解决历史的关鍵问题。写历史，就不必写他一笔，历史上就沒他的名字。有名的还是井冈山，太行山……等，这些都是要上历史的。

沒有山头，就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是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来的？回答是：从山里来。什么山？井冈山、五台山、太行山……等等。山头是谁，历史就是谁，能说李烛尘办了几个工厂么，那不能写。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当年革命的时候，只晓得要革，不知道怎样革命，犯错误，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慢慢地学会了革命。我们过去遇到的事情，大概你们也会遇到。

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个经验，毛主席也这样，在很多时间里在很多问题上也是少数。

《在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太知道，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眞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不懂，党中央其他机构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

同 上

"二七"罢工结果失败了……而全国各地罢工，仍然继续。但也各遭打击，遂使中国工运大衰。……工运不能公开了，领袖被捕了，工人学校与俱乐部都也不能开办了，于是困难便到了……

"二七"后的工运——安源工会仍然存在，并且还有小莫斯科之称，在安源并且还继续的举行了罢工，湖南的工团联合会，仍然是保持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十一页

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工会工作只是我作，他们不会作，所以他们也不敢开除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作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洛甫反对我，我請他写出来，他们常道我能写文章，他也写不了。

《与朱理治谈话》（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

"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革命历史上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结束了中国的反动时期，开始了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涨。不管这个运动还有多少弱点，但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阶段的标志。我们现在所做的，仍是实现"一二·九"运动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完全独立！"

……"一二·九"是中国学生的革命运动的"来潮"，由"一二·九"到"七七"中间有十九

个月之久。保持新起的革命运动至如此之久，乃是由于执行了一个小心谨慎的正确策略的结果。……至于这个运动的坚持和指导，"一二·九"运动是一个模范。

《在延安各界青年代表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

我跟人家讲，人家都很相信我，都按照我的话积极热情地去做，做得很出色。

刘维孔：《革命后代应当干什么——记刘少奇委员长教导我参加劳动的经过》(一九五七年)

×：中国人民在几内亚很受爱戴，杜尔总统和他的同志们以尊敬的心情谈论着中国，读中国书籍，我党的原则是从你们的书中吸收得来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沒有得到你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到处找了也沒有找到。

刘：沒有法文版的。

×：是，要法文本，据我所知《人民日报》去年再版过一次，古巴用西班牙文全文转载过。

《接见某国驻华大使谈话记录》(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晚)

某国大使说：大家都公认，阁下是中国的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沒有人不知道阁下写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也看过，但还沒有看新的修订本。

(刘少奇未表否认。)

《与某国友好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

几年以前……(刘少奇)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沒有关系。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刘受了批評，满腹牢騷，公然对抗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刘涛、刘允真：《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最高指示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三页

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〇——六三一页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九页

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八三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〇页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九页

二、追随大叛徒陈独秀、王明，积极宣扬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綫

編者按

刘少奇的反动面目是在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暴露出来的。然而他的問題并不是这时才有，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发生的；而是由来已久，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早已存在。查一查自他所謂参加革命以来所发表的言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革命、反革命。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敢不敢奪取政權以及如何奪取政權的問題上，党内长期存在着两条路綫的斗爭。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線，一条是以陳独秀、王明等为代表的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刘少奇从来就沒有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綫一边，而是頑固地貫彻执行着一条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路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他追隨陳独秀，污蔑中国工人阶級“幼稚”，胡說什么中国工人阶級“当然說不上馬上”去“实行奪取政權”；他把大革命說成是資产阶級領导的，从而把工人阶級的解放寄托于資产阶級的“援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爭时期，他是王明路線的积极宣傳者和执行者。就是在王明篡奪党的領导權的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員。从这时起，他开始窃据了党的重要領导地位。

（一）投机参加革命

刘少奇出生在一个剝削家庭，他家不但收租，雇工剝削贫下中农；而且还管公堂，从中舞弊，对农民进行榨取。刘少奇从七岁到二十岁一直是上学读书，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教育。就在这一时期，刘少奇的剝削阶级意识，剝削阶级的人生观已经形成。刘少奇在中学读书时，就曾对自己家里人说：“你们现在送我多读点书，将来会有报酬的，能挣很多錢，会还你们的。”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解放中国的新道路，很多革命者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这

个时期的刘少奇，为了自己将来能升官发财，便大搞政治投机，混进了革命队伍。一九一九年他混进留法预备班，一九二一年他又去上海留俄预备班，并且钻进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十×月去莫斯科，并在莫斯科入党。刘少奇虽然被卷进了革命的潮流，参加了革命，但是，他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絲毫沒有改变其剝削阶级立場的假革命者，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九二一年左右，刘少奇曾寄给他的把兄弟洪赓飏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刘少奇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赤裸裸地暴露了刘少奇投机革命的丑恶灵魂。他在诗中写道："一生富贵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从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参加革命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恰恰相反，他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能"一生富贵"，能"及时行乐"。我们知道，为了"一生富贵"和"及时行乐"而生活的人生哲学，是极端反动、极端腐朽的剝削阶级人生哲学，就是这种剝削阶级人生哲学，浸透了刘少奇的灵魂。虽然如此，他为了搞投机，表面上又不得不裝出一副革命的样子。然而，他所干的革命工作，和他的个人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所以，他苦恼，他迷茫，他绝望地问自己："汝何悲憤而长忆？""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最后，他自己想"通"了，他认为干革命是又蠢又傻的事，于是他哀叫道："滿目带愁思，意蠢情亦痴。"刘少奇的这种眞实思想，不向党交待，不向自己的同志暴露，却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的知己朋友洪赓飏。洪赓飏是个什么人呢？据我们初步调查，洪当时是湖南洪江陆军稽查处处长，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是一个反动官吏。……

一九六〇年，刘少奇在同大资本家王光英一家谈话时，又一次暴露了他的丑恶灵魂。他说："我们加入党，是看个人利益横竖解决不了，先解决国家利益，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个人问题也解决了。随着大家利益的提高，个人利益也会提高。"

摘自《刘少奇——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北航《红旗》第十、十一期

附录：　刘少奇的一首黑诗

身长七尺好奇男，
汝何悲憤而长忆？
尔之命促数且奇，
一生富贵何可期。
胡不及时以行乐，
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
人才西渡正纷纷，
尔之翘首望何陲？
岂欲长征班定远，
杖策以相随。
滿目带愁思，
意蠢情亦痴。
天津桥上无人识，
只得远寄与知己。

赓飏仁兄存　刘少奇

（二）誣蔑中国工人阶級幼稚，宣傳資产阶級是中国革命的領导力量，胡說北洋軍閥可以“讓出政权”，国民党“同情”和“援助”工人运动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权的力量消除社会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

在（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近代革命的阶级，都不是完全的被剥削阶级，而是剥削别人的阶级。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国工人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呢？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貨作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沒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很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府对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

《写给洛甫的信：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由一九二二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了政治势力。

《关于党史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

从此时起（指“二七”。——编者）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参加了政治舞台，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站在最前线。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十二页

“二七”以前到“二七”以后，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走到自为的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爭。……从此时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组成为独立的力量，参加了政治舞台。

同 上

中国工人在上述这痛苦的环境（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编者）的压迫下，于是便产生了自然的斗爭和组织，这我们便叫做工人原始的斗爭，我记得在安源、唐山、汉阳等这些地方的工业，这在几十年前，便有过很大的罢工斗爭了，这些斗爭都是带着流氓性的，如当时的哥老会组织。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三九年五月）第五页

而中国呢？工业是外国进来的，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太多了。到城市里去反而找不到工作，因此走头〔投〕无路的手工业者及农民，便成中国特有的无业流氓。流氓的头子拿起了枪杆就成了军阀。

同上，第四页

中山先生是领导全民族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亦在此全民族革命运动中努力向前奋斗以冀这个革命的早日成功。可是现在这个指导者中山先生沒有了。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推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以冀地位得以增高，生活得以改善。可是现在中山先生沒有了。

《悼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四月）

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但中国工农阶级，是社会各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中之主要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主要力量，有单独扶助工农运动发展的“工农政策”，中国国民革命，才可成功。

《廖仲凯先生与工农政策》（一九二六年八月）

廖先生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对于工农阶级不可与其他各阶级一样看待。即依照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工农政策，积极帮助工农组织之发展，并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曾著极大的成效——统一广东，稳固了国民革命的基础。……廖先生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工农群众所占之位置。廖先生之所以伟大，廖先生所以为国民党的模范党员，实即以此！……可是全国的工农群众丧失了廖先生，就是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廖先生遇害的今天，全国工农群众安得不纪念廖先生，努力继续廖先生未完的事业，谋得自身的解放！

同　上

北伐时，假如我们不提打倒北洋军阀的口号，而提出中国要求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等等。如果北京政府眞的肯反帝，则联合共同反帝，如果不肯这样作则請让出其中央政权。二者都不肯我们再来打，这样可以使北洋军阀孤立与分化，可以清楚的表现民族矛盾是主要的。

《中国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一九四二年）

我们得了肖鎮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得以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一九二三年十月）

至是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叹惜他部下的军队沒有这样的纪律，声明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李旅长盖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

（一九五八年《湖南历史资料》第一期排印时在此段后面加了按语。那个按语说："这几句话不是实情，当时军队是为矿局压迫工人罢工的，为了分化军队同矿局的关系，这里故意说军队几句好话"。以便为刘少奇吹捧军阀开脱。——编者）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

河南："五卅"以后，河南英国煤矿公司工人数千人罢工，郑州纱厂工人罢工者数千人，因为有国民军的相当援助，政治上虽然沒有得到胜利，但经济上却得到胜利而复工。

《报告全国职工运动》（一九二六年）

这时（一九二二年二月——一九二三年二月。——编者）还有一个中国工人劳动立法的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了订立劳动法律草案，以保障工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起草后在全国各报纸杂志上发表，书记部为了这个事，請了国会六十多议员客，內中有三十多议员是同情我们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三九年五月）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五年，工运又开始复兴。有中国烟厂罢工，安源的罢工等，冯玉祥占领平津，对工人很好，允许工人运动的自由，于是在北平天津成立的工会，有五万人，可是张作霖到了平津又垮台了。

同　上

国民党当时（一九二九年以后——编者）虽然反动，但多少还顾及到工人的利益，所以后来因此条文（指一九二九年国民党颁布的工厂法与工会法。——编者）而发生了许多公开的罢工，……

同　上

（三）鼓吹依靠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反对毛主席以"农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綫

要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走上更高的阶段，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就必须实现工人的总罢工，……努力发展群众武装组织，自动取得武装，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作斗爭，冲破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压迫，才能使群众运动更进一步的走上推翻国民党的斗爭，在城市中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帮助。

《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一九三一年）

沒有产业中心城市工人的巨大的顽强的罢工斗爭与武装暴动，苏维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援助白区工人的罢工斗爭，是已经得着解放的每一个苏区工人与劳苦

群众无条件的责任。

《唐山矿工的总罢工》(一九三四年三月)

唐山五万矿工总同盟罢工和英勇的血战……说明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沒有产业中心城市工人的巨大的顽强的罢工斗爭与武装暴动，苏维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　上

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爭取群众，爭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爭。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一九三六年四月)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我们和反蒋各派进行统一战线，联合与推动十九路军，提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正确的组织群众的进攻，红军采取配合行动，是可能使蒋介石不能回来复辟，并组织国防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

我们提出的任务是，爭取革命在湘鄂赣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指挥红军向湘鄂赣城市进攻。这在当时是不够的。这就放过了南京中央政府，使全国白区的群众和同志只望着湘鄂赣的红军，只动员群众去拥护与配合红军的进攻，而忘记了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去准备推翻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白区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同　上

六次大会以来，准备暴动的方针，是对的。然而在今天已经不对了。过去的错误，不在于采取准备暴动的方针，而在于进行沒有准备的暴动与盲动。沒有了解准备暴动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过程，需要长期聚集群众雄厚的力量，而在许多小的罢工示威中采取了冒险与盲动政策，消耗了我们准备起来的力量，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违反聚集力量与准备暴动的方针。

《关于白区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五月)

中国单纯城市是不行的，必须內应外合，准备如按多少年也可以讲，如准备直接暴动就不妥当。到九一八的时候，红军是完成了他的任务的，如我们退却得好，如我们“九一八”的政策不错，……红军力量大，城市力量大，二者配合，可将革命继续支持下去，可能将蒋弄倒，存在不住。

《过去白区工作总结及解答问题》(一九四四年)

附录：贬低和歪曲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

（这一部分是刘少奇解放后的言论故附录于此。）

革命的武装斗爭，当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也决不应该轻率地去进行，而必须根据各民族中的具体情况，主观与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来决定在什么地

方什么时候进行革命的武装斗爭，才是适当的。因此，不是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可以进行武装斗爭。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

革命的胜利，是从城市到农村，还是从农村到城市，其结果都是一样，这不是原则问题。

《接见某国代表的谈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中国过去建立过许多边区根据地，就是你这省打来，我到那省去，那里敌人配合不好，是最薄弱地方，所以我们取得胜利比较容易。边区人少山高，过去那里有许多土匪，许多年也不能肃清。既然土匪可以长期进行武装斗爭，我们也可以。

同 上

(四) 在白区工作中頑固执行关門主义，拒絕利用合法斗争，鼓吹"集中力量，打击在野反动派"

"赤色工会应在群众中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口号，打击反动派别的主张，对群众提出的口号，赤色工会都应给以批评，并努力转变群众的妥协口号成为革命斗爭的口号。"要"集中力量在群众中打击在野的各反动派别及各种各色的主张和口号。"并提出要领导群众运动走上"更高的阶段"，"就必须实现工人的总罢工"，"在工厂门口、工厂中、工厂宿舍举行示威，举行群众的鼓动"。

《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应该和群众在一道，扩大自己独立的宣传鼓动，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各派，揭破各派的欺骗，进而驱逐各派的黄色领袖，从新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国民党各派断绝关系，消灭黄色工会。……

在目前如果有人主张与黄色工会国民党任何一派联络去"打倒"另一派，这结果就不过是把蒋介石的人换上汪精卫的人，或将来又可换一批国民党其他派别的人，但工会总还是国民党工会，这完全是投降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

《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一九三二年一月)

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已经有了强大的革命反对派，这些黄色工会下面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反对黄色工会，并加入到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中来，这时候，反对派的组织任务，就是打倒这些黄色工会，驱逐这些工会中的黄色领袖，或从黄色工会中分裂出来，重新依照赤色工会的组织法则(不是依照国民党的工会法)建立赤色工会，或者转入赤色工会，这样就使这个黄色工会再不能翻身，赤色工会就代替了黄色工会的组织，消灭这些黄色工会。

《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一九三二年一月)

在工人斗爭中还表现了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

……(三)在工人中间保存一些"合法"的观念。比如：以怠工来代替罢工（怠工虽然也是工人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最近的许多怠工，幷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而采用怠工，而是因为怕罢工犯法更大，所以才怠工)，以退辞来代替反日罢工。在罢工后宣布"严守秩序""静候解决""不作轨外行动"，最严重的最能打击资本家的部分不罢工(如英电怠工照常供给电灯电车等)，不作游行示威，不向各厂工人請求援助及鼓动各厂工人罢工等；(四)不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向敌人作武装斗爭，许多武装冲突都是无准备的突然的爆发。工人中的这许多缺点，表示黃色纲领在群众中还没有完全被群众所抛弃，是许多斗爭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一九三二年)

（五）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經济主义

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爭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一九二六年六月)

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因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斗爭，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爭。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爭。经济斗爭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一年来职工运动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五月)

各地工人应切实进行经济斗爭，经济斗爭的发展，就是职工运动的发展，经济能够得到胜利，中国职工运动即可得到一条顺利进行的道路。

《报告全国职工运动》(一九二六年)

宣传经济斗爭就是政治斗爭：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爭与政治斗爭的联系。轻视经济斗爭，对经济斗爭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每一个群众的经济斗爭同时就是政治斗爭"，要机械的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那时正是冯玉祥北平赶走宣统皇帝的时候，各处举行了援助上海工人罢工的大募捐，结果工人得到了一笔很大的錢，差不多有几千万，开放皇宫参观的票价，也拿出来捐给工人……

……英国使馆组织了调查团，说巡捕开枪打人属实，彼方深觉遗憾，愿以七万余元作为赔偿，……虽然说在帝国主义的斗爭上只得七万五千元的代价——这便是他的结果，一部分分给工人了，一部分办了一个五卅小学，另一部分还做了一个五卅烈士墓，这便是上

海的罢工。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三九年五月)

城市与苏维埃运动的配合问题，……应该是战略上，客观上的自然的配合，工人罢工，是为了增加工资，主观上不配合，客观上是配合的，主观上不提，其实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口头上一定要讲呢？第三国际说，任何经济罢工，都是对苏联最好的帮助。

《白区工作的总结及解答问题》(一九四四年)

(六) 荒謬地把雇农和貧农分割开来，否定农村广大貧农的伟大革命作用，片面强調依靠雇农

党在乡村中，首先的唯一的就是依靠雇农与乡村工人，雇农与乡村工人是党的路线在乡村中最可靠最忠实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不管他们的数量在乡村中是如何的少，但党的唯一的还是依靠他们，他们对于党的重要的可贵的作用并不减少。

……共产党员在乡村中进行工作（不论是分田肃反与进行各种动员等），他应该首先依靠雇农和工人，首先取得他们的拥护与积极参加，经过他们去领导贫农，影响中农，与豪绅地主作不调和的斗争。

《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很明显的在查田运动中贫农团是占着最重要的作用，而贫农团又必须在工会支部的亲密领导下，才能正确的发挥他的最大作用。

《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总结》(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

最 高 指 示

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八四——三八五页

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四——五三五页

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三页

三、无耻歪曲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大肆宣扬投降主义

編 者 按

抗日战爭开始以后，里通外国的大叛徒王明瘋狂反对毛主席的正確路綫，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竭力宣揚“一切經过統一战綫，一切服从統一战

綫"，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抗战最高領袖"，要求党領导的八路軍新四軍完全統一于国民党軍队，实行"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战計划、統一作战行动"。刘少奇和王明唱出了一样的調子。他胡說国民党是抗日統一战綫的最好組織形式、蔣介石是"革命的旗幟"，提出华北的八路軍和抗日游击队要和国民党軍队"合并起来"，在国民党軍事委員会的"指揮之下"，"統一作战行动"、"統一作战計划"、"統一战略意旨"，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政府要实行国民党政府"所規定的政策"。他还宣揚阶級合作，鼓吹工农和地主資本家"抛开仇怨"，互助互讓。总之，在抗日战爭期間，刘少奇宣揚和推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綫。

(一) 竭力否定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綫的领导权，胡說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綫的"最通俗、合法的組織形式"，吹捧蔣介石是"革命的旗帜"

今天的形势，是中国本部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愿意甘心情愿当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爭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对于一个独立的民族说，沒有整个的民族的共同利益，那是对的。但是中国现在不是这样一个民族，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亡国灭种，就使中国各阶级都有同遭破灭的危险，挽救与消灭这种危险，这对于中国各阶级都是有利的。""民族利益是包括着社会各阶级的利益。"

《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抗日战争初期，刘少奇的亲信彭眞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中，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方针，竭力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公开号召"充分把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刘少奇看到代表大会的文件以后给彭眞写了一封信，对于彭眞的投降主义谬论非但沒有批评，反而给予支持。他在信中公然说：边区政府不应叫"民主政府"，也不应叫"统一战线政府"，"因为现在国民党与閻锡山都还不主张组织民主政府"，"国民党与閻锡山至今还不愿承认统一战线四个字"。他甚至提出，在边区政府及其他公开团体与机关的文件和口号上，"应以少说或不说'民主政府''统一战线政府'等语为好。相反，应用三民主义及閻锡山按劳分配主义的话句。"

《给彭眞的信》(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

那时(芦沟桥事变时)，我们是采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减少各党派的磨擦，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

《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看是那一个阶级站在当时当地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地位，统一战线主要就实行他的政策去对付共同的敌人，其他阶级的政策，是不能实行或不能完全实行的。……在全国，则不能实行我们的政策，也是因为我们在全国的统一战线中，还沒有实际领导地位。

《反对党內各种不良倾向》(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

国民党究竟是什么？我们同国民党打了许多年，五六年来联合共同抗日，如今倒反转过来问什么是国民党？我想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阶级联盟，而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国民党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不过以资产阶级为主导，过去如此，至于将来是不是仍是这样呢？这还要看今后变化；但在过去无论国民党是在革命或反革命时国民党都是个阶级联盟，当国民党革命时，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其中的力量和作用加强，当国民党反革命时，官僚、买办、地主的力量和作用加强。

有的同志把国民党认为即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党，因此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国民党，这是不对的。其实，资产阶级并不等于国民党，在国民党中有广大的中间成分与进步成分，因此反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反对国民党。如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国民党并不一定，要叛变革命，我们尤其不能拿对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去对待整个国民党。然而我们同志常常不区别这一些。

另外有的同志以为国民党还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我们何必还要郑重其事的去帮助与充实它呢？这只是一方面，国民党的确缺乏统一的严密的组织，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个党有它这样大的权利，它掌握有广大的政权，拥有几百万武装，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具有合法的地位。……

因此，三民主义国民党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子，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位国民党领袖，也同样是旗帜。这面旗帜如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拿到手里，就是反革命的旗帜，如被革命者拿到手里，就是革命的旗帜。因此，这面旗帜拿到什么人的手里，对于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关系。……

三民主义，国民党这个旗子，革命者是否在今天也需要呢？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国民党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特别是抗日统一战线最通俗的，合法的组织形式，最好的现成形式。反对这种现成的组织形式，另外来个组织形式，结果会使革命增加许多困难。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约一九四三年)第十四——十五页

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可能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我们应该促成国民党的改组，排除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加入。如此，国民党将变成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五月)

我们还要有工作的独立性，把自己认为必要做和可能做的工作，积极去进行，以实际

工作成绩，给群众看。例如，在山西，起初阎总司令是害怕共产党的。在太原时，我们提议办一个大学，训练青年干部他不接受，后来我们办了一个训练班，许多青年都来了，他就马上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又如废除苛捐杂税的问题，我们曾向阎总司令建议，他不同意，后来我们进行起来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而阎总司令也就颁布了废除苛捐杂税的法令。所以统一战线不仅是口头上讲，而且要实际的先做。

《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在抗日战争开始发生时〕各派别对统一战线的态度不一致，……

(戊)有些人是主张进步的，甚至于比共产党的主张更进步(如改进军队，组织民众，游击战争，肃清汉奸等等)，但他们要独立自办，不愿和我们〔共产党〕合作。

同 上

同志们都知道山西阎锡山将军是抗日的，……他组织一个“牺牲救国同盟”来发动群众抗日，……结果，“牺牲救国同盟”组织了很久，还是一个空架子，眞正的群众运动并沒有发动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不了解组织群众的原则与方法。

同 上

(二) 鼓吹华北各武装部队“合并起来”，“統一指揮”、“統一战略战术和作战計划”，妄图把共产党領导的军队“统一”于蒋介石国民党

我们应该提议：(一)所有华北抗日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建立联军总司令部，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二)联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军区的联军的司令部设经常的军事会议，……军事会议决定战略战术方针和作战计划。(三)……各种零散部队互相集中合并起来，成立正规的抗日军队。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即为团结集中与合并各种零散的部队成为正规军而努力。

《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各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必须实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华北的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必须尽可能的统一在当地的、华北的以及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直接指挥之下，并且实行华北最高政治机关以及中央所规定的政策。各级军事指挥人员尽可能由上级委任或批准。”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华北抗战中的军队，是正在进步中。这种进步，第一，表现在华北的军队正从实际上学习并开始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前在华北的军队是进行阵地战，只有八路军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但是，现在(甲)由于华北已处在敌人的后方，沒有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必

要与可能，(乙)由于许多阵地战的血的教训，使得现在还留在华北作战的军队都向游击战、运动战方面转变。某些军队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获得一些胜利。第二，现在华北的军队都已经开始进行政治教育，提高部队的民族觉悟，在部队中建立政治机关。第三，提高部队的政治纪律与军事纪律，改善军队与人民的关系。第四，改善部队的组织与制度，如轻装，逐渐实现长官与士兵的平等。虽然这些进步还才开始，还沒有达到必要的程度，各方面都还沒有作好，但是，这已经是一种进步。这对于坚持华北抗战是很重要的。

《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

由于日寇进攻的加紧，由于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华北的军事领袖的坚决抗战，华北统一战线一天一天的进步了，在华北已建立了许多的军事根据地。

《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种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必须有以下的条件：

第一、政治条件。……

第二、军事条件。……

第三、群众条件。……

第四、地形条件。……

第五、全国的坚持抗战。这一条是最主要的，有了全国的坚持抗战，我们在敌人的后方才不会孤立，使日寇不能集中优势军力来消灭游击队，使其后方更加空虚，而便利我们的发展。

同　上

(三) 鼓吹阶級合作，宣揚工农和地主資本家应“抛开仇怨”，“互相讓步、道歉”，提出富农也可以加入农会

过去以及最近在某些地区，因为地主与资本家对于工农的过分剥削，以及工农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爭，曾经种下了某些深刻仇怨的，应该去进行调解，号召工农与地主资本家抛开私人的仇怨，去共同对付民族的死敌日寇。这种调解在互相的让步、道歉及某种条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抗日游击战爭中的政策问题》(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在我根据地内，应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斗爭。……我们应以合法斗爭，议会斗爭，去制服敌对阶级。工农和地主比较，地主有文化传统，有统治经验，有法律知识，因此，我们共产党员应特别努力学习合法斗爭，这是大艺术。

《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十日)

工会是阶级组织，农会在一定意义上，即对封建地主来说是阶级组织，对资本主义来

说，不是阶级组织。混淆阶级观念，是机会主义，富农是自己劳动的，不拒绝参加农会，不劳动的富农，则拒绝加入农会。富农少一些加入农会，也不要紧。如果富农已参加农会了，在反封建斗争时，他可能赞成，或可能中立。

《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十日)

(四) 抹煞群众工作中的阶級斗争，企图把群众运动引向經济主义的道路

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由于要求的不同，民众团体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我们根据民众要求一般可以分作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第一，政治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政治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政党、政派及其他政治性质的组织等。

第二，经济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经济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合作社等。

第三，文化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文化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研究会、俱乐部、剧团及其他学术团体等。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九三九年)

在各种民众组织中，经济组织是最主要的民众组织。……经济要求是民众自己最直接、最容易感觉到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同年龄、性别、籍贯及政治信仰的不同，凡是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那可以组织最广大的民众。

……在某种时期，某些单纯的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也常常能够动员与联合最广大的民众，如抗日救国、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等，……目前的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就是这类组织。这类组织在某一瞬间也常能成为民众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这类组织有它的弱点：(1)它的主要要求比较单纯，因此就影响到它的內部生活的不充实、空洞、单调等；……因此，它的內部不巩固。

同　上

一个工会或俱乐部如果长期放弃它原来的经济的、文化的要求，主要去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活动，那这个工会组织或俱乐部组织就要变为第二政党，……以在民众运动中，你如果不准备变更某些团体的原来的性质，那你就不要放弃这些团体的原来的任务与主要要求。

同　上

工会农会是保护工人农民经济利益的，是工人农民的经济组织，是不分信仰、派别、年龄等等的。这样，才可以包括工人农民的全体。如果把工会农会变成政治组织，则就只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农民才参加。实际工人农民的政治组织，就是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

府。把工会农会变成政治组织，是关门主义的，把政见不同或不管政治的人，关在门外，而经济组织是要把所有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参加工会农会的人，不应有政治条件上的限制，这是阶级组织，共产党也是阶级组织，但只是阶级的一部分组织。

《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十日)

至于群众团体代替党的现象，不去搞经济任务，而经常去搞政治宣传，变成了政治团体，变成了第二党。……这是不知道农会工会是经济组织，青年是教育组织。自然不能把经济教育组织与政治任务分开，但其中是有区别的。

同 上

工会组织，应研究行会经验，好处加以采用。雇农工会，可设立会所，盖一间房子，买几亩地，由雇工自己出錢，政府帮助拨地之类。工会每年集会一次，杀猪宰羊吃一顿，平时可以不必作什么，遇雇工发生斗爭，工会就设法帮助，遇生活困难，就设法互济等。华中曾发现一个行会从大革命一直保存到现在的。

同 上

一切群众工作，群众斗爭，统一于群众团体领导，以统一主权。党、政府、军队只能协助，不能领导。

同 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府教育部门，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应有大的动员，应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应密切配合，并应加强青年团儿童团的工作。要注意青年团儿童团不是政治性的组织，而是教育与学习的组织。准备好教材（……）拨出经费，由各群众团体直接领导，在乡村中去创立许多民众夜校。

《致某同志的信》(一九四三年一——四月)

乡下工人，小学校教员及学生，都必须加入农协。为什么工人、教员及学生都必须加入农协？因为在农民当中是沒有干部的，而是依靠别人领导，农民常常受到豪绅地主的指挥去做事，所以工人、教员、学生加入农协，目的是要做领导者。他们常常是不大了解农民的生活，但总比豪绅地主强得多了。

《华北战区的工作经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们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住，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出于群众的自愿。比如大革命时，武汉码头工人自发驱逐巡捕到河里，占领了英租界，一二十万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并要全总負责，全总負责同志说明停止是不可能的，当晚找了群众领袖来说明，示威时绝不能动手，不要损坏东西，这在思想上控制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围领事馆，搞了一天，沒有发生一点事情。这是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眞正的群

众运动，沒有秩序、沒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群众运动。那一次的群众运动，对于收回英租界发生了绝大的力量。

群众运动眞正起来，有秩序的纪律，就在有正确的领导。

《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十日）

我经常对我的勤务员这样讲，你们是老百姓，是工农兵出身，我是为什么办事，就是为你们办事。我这样说要他懂得，工人农民受压迫，受气，受侮辱，不能翻身，我们不吃饭，不睡觉，打仗，作报告，为什么呢？为了对工人农民帮助一下，使大家团结起来翻个身，我替你们这样，你们要努力，你们生活上照护我，不要我自己搞饭吃，搞水喝，你把我照护好，那些事我不要想，我可以多做一点事。

《关于党内关系问题》

我们的革命作风，我们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驟，都要能够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是强迫命令群众革命化。例如陕甘宁边区采取发展生产的工作步驟，生产发展以后，邻近边区的国民党老百姓，自然而然革命化，把国民党给他们的门牌都拆了下来；我们根据地建设起来，全国人民看了都倾向于同情共产党，使全国人民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不仅下层群众，甚至上层产业界都在內；苏联建设的胜利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全世界人民都自然而然地日趋革命化。

《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一九四五年四月）

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也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在工厂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五）否認和曲解人的阶級性，誣蔑劳动农民

民众是什么？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九三九年五月）

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一种本性，一种本质。

人有两种本质：一种是人的自然本质，即人的体质、聪明、健康及本能等（比如在医学上就有各种体质的人）；另一种是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及其要求等。

《人的阶级性》（一九四一年六月）

又比如说农民吧！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的、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对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特性。

《人的阶级性》（一九四一年六月）

最 高 指 示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〇页

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七页

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五页

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三四页

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五八页

四、抗日战爭胜利后积极推行所謂“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綫

編者按

从抗日战爭結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負的关鍵时刻。以蔣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一心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爭的胜利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針对这种情况，代表无产阶級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警惕蔣介石发动全国規模内战的反革命阴謀，采取針鋒相对寸土必爭的方針。当时毛主席曾明确地告誡全党：“**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爭，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蔣介石。**”在这个历史的关鍵时刻，刘少奇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觀絶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謂“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級投降主义路綫。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去重庆談判，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解放日报》竟然发表社論，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散布和平幻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爭意志。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旧政协决議通过后，二月一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又胡說：旧政协决議付諸实施，中国將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斗爭变为非武裝斗爭的、羣众的与議会的斗爭，国内問題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并企图把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来的人民武裝，双手拱讓給磨刀霍霍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这一叛卖活动的思想指导下，一些解放区大量裁減軍队，严重地損害了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这时他認为解放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国民党統治区的工作是发动羣众，搞議会斗爭，通过在政府里占多数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当中国革命处于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鍵时刻，这个鑽进党内的政治野心家終于暴露了他假革命、反革命的真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領导集团，放棄武裝斗爭，交出軍队，企图通过“議会道路”取得政權，实现所謂的社会主义，結果葬送了无产阶級革命事业。

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党内同样出现了这一修正主义思潮，其代表者就是刘少奇。法、意等国无产阶級革命事业慘痛失敗的教訓未能在中国重演，正是由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領导，才使刘少奇这一修正主义路綫未能得逞，从而端正了革命的航向，領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配合美帝及其走狗发动内战的阴謀，拚命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人民的斗争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很激烈爭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1)决定改组政府，(2)并通过施政纲领，(3)宪章原则，(4)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5)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6)及议会制、內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內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內和平，使我党及我党所创立之军队和解放区走向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是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动庆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已经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一决议而奋斗。

《目前形势与任务》(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此次重庆重大决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1)三国莫斯科会议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2)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四个月的坚决自卫战争，(3)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內战与反对一党独裁(4)和国民党內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其一党独裁，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虽然一切决议尙待实行，即使实行离全国彻底民主化还很远，但是全国各党派在全国合法化，人民有了初步民主自由，民主运动即可能逐步开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破坏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推动国家继续走上民主化，因有苏、英、美三国支援，有国內三个主要政党(国共及民主同盟)的合作，及三党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其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应当指出国际国內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在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的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并且英美大资产阶级与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阴谋企图将中国变成反苏基地，我党与中国人民面前困难还是很大，我们的一切困难是能够逐步克服的与必须逐步克服的。

《目前形势与任务》(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二）叛卖革命，阴謀放棄武裝斗争，交出人民的军队，鼓吹“合法的、议会的”道路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易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来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导，(在九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仿照国民党与军队的关系。但军队

中的党员仍保持党籍，各级军政干部仍留原来军队服务，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取得党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及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让步是适合于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也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相反，要更进一步的改造全国军队使之逐步民主化，最后变成人民军队。我们军队中的党员，今后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在脱离党的直接指挥及组织指导后，他们只从党的一般号召一般政策上与其他间接方法来了解党的主张与党的活动方向，因此他们将更加依靠自己创造性与自动性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比较过去更加团结，更加守纪律，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更加提高政治工作，借以保持与提高自己做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因而亦能够保持与提高我们的军队为人民的本质。由于十八年来艰苦奋斗，在党中央及毛主席直接领导与教育下锻炼出来的军队与其大多数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我党整风及七代大会之后，虽然有人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人民军队，应严加警惕，但中央坚决相信，决不会因停止党的组织在军队活动而堕落瓦解与背叛人民的（个别分子有些可能应提高警惕），相反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将因此项改变而使自己锻炼的更加成熟，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那么我们同志应当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

《目前形势与任务》（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个新形势。

同 上

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

同 上

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斗争中去，用心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城市去。

同 上

必须指出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来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之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能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级党委应加解释目前形势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该很好的说服他们。

同 上

“和平民主时期已经到来，军队不要那么多了，以后就象打渔杀家的肖恩一样，他有两

个朋友，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锦毛虎倪荣等，虽然在民间还有点武装。”

“军队要复员，不要那么多了，要多多复员。”

摘自《薄一波在邯郸传达刘少奇的指示》(一九四六年)

和平民主时期不是靠枪杆子逞锋，而是靠选票进城。

李菁玉：《彻底揭发批判控诉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罪行》

今后全国的工作分两种地区，根据地是生产，国民党统治区是放手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根据地不生产不加强生产，不能巩固，国民党统治区不放手发动群众，不能发展扩大民主力量，我党的力量要遭受失败。

现在是合法政治斗争，这个斗争怎样作，工作问题，群众发动问题是很复杂的，发动要有先后要有步驟，发动上层是为了下层，议会是为了群众，会內是为了会外，斗争的中心是为了发动群众。如何发动群众，先搞上层还是搞下层，先搞下层不行，先搞上层，先搞上层是为群众运动打开道路，政府法令是合法的，下层运动才更加合法，所以上层运动是给下层开辟广泛的道路。

《群众运动的方向》(一九四六年初)

农民问题“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美国英国他们都赞成，民主同盟也主张，资产阶级不反对，蔣介石过去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将来颁布法令，但是光有法令也不行，农民沒有发动起来。将来共产党民主同盟可能在政府里占统治地位，农民问题，也能解决一部分。要等共产党在政府里占绝对优势，农民也就眞发动起来后将来统一战线要变化，黃炎培等的民族资产阶级会动摇不定，但是统一战线不会破坏，只有些人会逃跑到外国去，我们一定在将来爭取在政府里占多数，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同　上

对时局问题，在思想上，和平幻想比其他解放区多而且深，可是和平幻想到处都有。中央有，别地也有。

《对晋察冀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

(三) 在对待被俘蔣軍反动军官的政策上抹煞敌我界限，大搞阶級投降主义

一年多的自卫战爭的胜利，我军在各战場俘敌百余万，其中军官约五万。……这是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敌人，虽然在思想上仍和我们敌对，但这种敌对不是不可缓和解消的，他们有可能和我们妥协的，有的长期妥协，有的暂时妥协，蔣介石西安事变还可以和我们暂时妥协，何况这些小蔣介石呢？如果我们采取正确而适当的政策，其中大多数人可减少解消这种敌对，其中一部分还可以爭取他们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同情赞成我们今天的事业，或守中立，其中多数人可以爭取为今天人民事业奋斗，有沒有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呢？有，但只是个别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1)他们的阶级地位多数均遭受帝国主义、中国官

僚资本与封建地主阶级压迫与损害……

《在敌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四八年三月)

根据上述方针,我们的处理办法应该是:坚持宽大政策,不刺激,不侮辱,虽然俘虏还对我们敌视,但我们仍坚持以朋友态度对待他们,……俘虏虽然两面政策对我,但我们仍采取诚恳的严肃的朋友态度对待他们,以上办法除特殊者外,一律适用,……在工作中既不用魔术手法去玩弄他们,也不是牧师精神的慈善态度。

同 上

根据我们的处俘方针,无论在管理或教育俘官时,态度和方式上均须以诚恳、坦白之交朋友态度相对待,尊重其个人人格以少刺激或不刺激为宜。

同 上

接收之后,凡属规则、制度在我拟出后,尽可能经过俘虏自己讨论通过,作为规则,不得违犯。我们应多采用他们自愿自治的方式去管理。伙食(中下级俘虏以我们野战军战士的生活为标准,高级俘官略加优待),俱乐部均可由他们自己去管理,其他如对俘官的审查了解,调查研究及组织等,亦均可利用俘虏去做,使他们生活与学习上尽量做到自治自觉,实行以俘治俘,但必须是我适当的严密的指导与监督之下。

《在敌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四八年三月)

俘虏军官的教育,在编队之后,即可宣布我们要放的方针,以促其安心学习。实施教育时,我们应采取他们自觉的方式去进行,不是灌输而是启发,不是吹牛而是讲道理,讲事实,和我们的表率模范。教育方式上采取座谈辩论,允许反对意见发表,互相讨论之后,我们尽情尽理批驳之。

同 上

在俘虏中发展各种名目的组织,意义不大,更不要搞秘密组织与特别党员,但其中有个别合乎条件者可按党章吸收为候补党员。为团结俘虏中积极分子,以便于管理教育,并使他们有新的依靠与新的出路,因而推动他们去瓦解敌军,许可建立一种名称公开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采取自愿原则,接受俘虏积极分子参加,决定用"爱国军人联合会"的名义。

同 上

(四)妄图阻止历史車輪前进,反对將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最 高 指 示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五页

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一四页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六九页

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二页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土地法大纲上规定的经过人民法庭审讯判决的这一斗争方式，必须认真实行，它是农民群众打击最坏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免犯乱打乱杀的错误。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七一页

五、在土地改革中制定和推行形"左"实右的資产阶级反动路綫，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相对抗

編者按

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是一場极其偉大的革命斗爭。对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党內从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綫激烈尖銳的斗爭。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另一条是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綫。抗日战爭胜利后，刘少奇在土地改革中竭力推行的就是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相对抗的"左"傾机会主义路綫。

一九四七年九月，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議，在这次土地会議上，他违背党的組織原則，擅自发指令、作报告。刘少奇在这些报告、指令中，篡改土地改革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在对待中农，对待地、富，对待工商业和干部等問題上，也都提出了一整套极"左"的政策，竭力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綫，公开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相对抗。結果，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在他影响所及的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发生了諸如分中农土地，侵犯中农利益，沒收地主的工商业，对地、富实行乱砍乱杀，排斥一切干部，实行所謂"搬石头"等严重的冒險主义。只是由于毛主席及时发现了刘少奇的严重錯誤，并亲自总結了各解放区土改的經驗，規定了土改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方法，糾正了在刘少奇指导下某些地区土改运动中发生的"左"傾錯誤，才保証了土地改革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五〇年，全国实行大規模土地改革运动，这时刘少奇更置党紀国法于不顧，公然将党的机密泄露給他的地富亲友，为他們出謀划策破坏減租、退押，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并百般为他的地富亲友开脫罪行，彻底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級的反动本性。

（一）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篡改土地改革的总路綫和总政策，胡說土地改革搞迟了，宣揚蔣介石和美国共和党也不反对土改

解放区农民有四大要求：土地（无地、少地，给农民以足够土地）、生产资料（牲畜、农具等），公平负担（或减轻负担）、民主。……

共产党的态度：坚决拥护这四项要求。不拥护，即反对党的基本方针。并尽一切努力，为实现这四项要求而斗争。

采取什么路线、办法？即"依靠贫雇农及乡村工人，联合全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分子，中立一部分富农（劳动起家富农六分之一），向地主阶级及一部分带封建性的富农斗争"。

《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中国今天在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说，沒有变，以前社会政策是减租，过去不贯彻消灭封建。现在要贯彻土地改革。现在全国、全世界，还沒有反对土地改革的。蒋（介石）也讲这样话："在占领解放区，地主不能收回土地。"美国最反动的共和党，以及魏德迈都向蒋建议"要土改"。

"为什么不早搞"？我个人看，"可早搞，沒坏处，有益处"。那时，为取得"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停止贯彻土改，在三五年、三六年有好处，对党沒损失！已土地革命区也不退，只有陕甘宁，换得"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在全国进行抗日运动，"他不是限制群运，而是在全国范围发展群运。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国民党已反动，一万万多人的解放区可以考虑。当然减租减息也发动了群众。但四二年后，改一下沒坏处，所以说，可以早一点搞。同时，事实上已搞。一加负担，土地即搞给农民一些，特别到五四指示时，如再不实行土改，则中央要犯历史的大错误，同陈独秀差不多。中国共产党中央错误还是有，沒有象陈独秀那样大错。今天有的还不彻底，还不下决心。事实上今天贯彻土改已迟些。

同　上

四三年以后，还是减租就花不来了，蒋介石区域不能工作了，解放区有八千万人口，从群众观点来看，当时是可以决定解决土地问题的。

同　上

五四指示几个中央局未贯彻，中央也负责。中央也有动摇。

同　上

（二）制定和推行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綫，强調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

"今天土地政策是彻底了……就现在的形势情况看，土地政策不能前进了，到此为止，……土地改革在整个历史上了解，还可以有一步，即土地国有，我们的彻底平分是私有的，还可以进到国有。但仅有此一步了。土地问题进到土地国有就再沒有土地问题了。土地国有之后，还有的是农民问题了，富农、中农，农村与城市矛盾，农民还要受城市垄断剝削。消灭农村与城市之矛盾，是一个长期过程，但土地问题沒有了。……但土地国有对全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可大大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实行土地国有，银行、工厂、商人生意就好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实行国有，只有全国政权拿到手，

有了保证，许多资本家会赞成，对他有利。”

“关于打乱平分问题，一般讲共产党与政府不要宣传打乱平分，一切照土地法大纲宣传，一定要照大纲宣传，不准宣传其它的东西。打乱平分一般的讲有它的好处，但阻力太大。

“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一部分中农虽然要抽出土地，大部分中农要得到土地，就是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群众对于个别中农不愿意抽就不要强迫去抽。对群众有利，群众要抽，一定要抽，如果中农坚决反对，甚至地主富农一道来反对，就要进行必要的斗爭”。

“只是对这种反革命予以鎭压，其他才能低头，否则反对人就愈来愈多，富农也会加入，那就形成不杀不行，愈杀愈多。”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虽然对一部分中农，要抽出一部分土地，但，大部分不抽，且得东西。就是对抽了的，也要想各种办法团结他们，不斗，给点代价。为的是使他们不受地主影响反对我们，对群众是合算的。但群众一定要抽就要抽，他若与地主富农一起来反对，也还要斗爭。

同 上

照顾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

《晋察冀讲话纪要》(一九四七年)

地主一亩，雇农六亩是否暂时可行，长久了生活不能维持，总要搗蛋。即收买他一下。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太行的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剝削一定要彻底，他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淨，让他要七天饭，挑三天粪，这时候他以为活不成了，农民说本来是我们的，看你怪可怜的，恩赐你一点吧！

《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不能彻底消灭富农经济，群众不反对的富农，要保留一部分富农，否则中农会动摇，不是汉奸恶霸的中农，也不办。

《在六地委报告中关于工作和土地部分的摘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组织农会，中农加入，有些富农土地改革后也可以加入，农会是全体农民的组织，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同 上

在彻底平分的政策下，富农要反对，甚至不比地主弱，甚至比地主更厉害。中国富农有许多方面比地主本事还要多一些，他们有组织宣传能力，所以对富农要特别注意，一方面在作法上、政策上要有些区别，以便不使他们与地主一道反革命；另一方面如果他要反革命，就要鎭压。要知道，地主很难爭取到中农反革命，而富农则接近中农，爭取中农的可

能性较地主为大，有危险性。

彻底取消封建地主土地关系，照群众意见，彻底把地主弄完，群众要搞地主的商业，就搞掉，如果群众不弄光，就可以不弄光。

《在六地委报告中关于工作和土地部分的摘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工厂商店一般以不动为好。如果是化形地主(不是正式作生意的)搞掉算了。这对商业沒有什么损失。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五) 工厂、商店。

乡村——由乡农会清算接收。

大城市、大市鎮，由县农会决定，县政府可以不接收。领导机关去接收，不要清算。有的可分，有的不分(如药铺)。(即对生产无妨碍，如工具、机器、原料不分好)

地主逃避财产、转入工厂商店，不是清算，交出就是。

土地兼工商，一般经营工商不动，要作解释，只分地。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正式营业的工厂商店一般要保存，化形的除外。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地主剝削农民，在城市中兼营工商业，他的土地、财产和工商业，要让农民搞他的干干淨淨。

《晋察冀讲话纪要》(一九四七年)

地主杀我们的人，他杀我们一百人，我就杀他一千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杀干淨。

同 上

人民法庭。……公开审判，收集罪状，布告、枪毙。上边多给几个干部"杀人权"就是。搞对几个，威信就有了。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故党內有两条路线，且普遍的，无情的进行斗爭。一条是代表地主富农的，一条是中央的，如华中、冀鲁豫，邓与薄就是代表贫雇农的。坚决反对农民，代表地主的，如冀东。

…………

华中、晋冀鲁豫，完全驳斥了地主富农路线，也拒绝了调和路线，并采取了许多组织办法，撤换一些干部，并提拔一些拥护农民要求的干部。因此就达到了"基本上消灭封建的目的"。

同 上

〔按〕邓小平、溥一波在晋冀鲁豫所实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綫。起初，他們推行了一套"肉体上消灭地主，經濟上消灭富农"的极"左"政策，造成了乱打乱杀乱分的形势，"不到十天，杀人逾万"，地主富农則利用机会杀我基本羣众，大批貧雇农被地富杀害。在分配土地时，对地主实行所謂"先掃地出門，然后由羣众民主評議，贈送一些坏地坏房以示寬大"。"五四"指示以后，則又提出"七大禁令"，不发动羣众斗爭，強調照顾献田发展农村資本主义，強調联合地主反蔣，有的甚至联合地主进行土改，規定給地主留八倍于农民的土地，不动内財，只分出其土地房屋，強調照顾抗屬地主，因而使地主生活依然优裕于貧雇农，广大貧雇农没有翻身，或只翻了一个半身。刘少奇却把邓小平、溥一波所推行的这一套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說成是"代表貧雇农"，大加吹捧。

基本上是两条路线，主要是右的，因此要彻底肃清右倾。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三) 取消党的領导，宣揚"自发运动"，鼓吹"由农会来篡党篡政"

土地问题的普遍解决，必须而且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运动，应加以鼓励、促成。

《给××的信》(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们不赞成，群众还要办，还不赞成，一定要办，就让办，就让群众犯个错误。凡是大多数群众犯的错误，不会伤害群众情绪，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就了不得。群众犯了，我们还不赞成，但我们还是要服从群众。有了教训，会改正，以后会相信我们，如果我们搬出政策，泼冷水，就不对。

《在六地委报告中关于工作和土地部分的摘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群众自己走自己的路解放自己，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去做，不要怕错误，不要群众一做，我们就去纠正，大胆提倡干部服从群众，不是要群众服从干部。

同 上

代表会、农会在斗争中即准备建立。最好干部、农会主任，推为第一等，第二等党。翻过来，将来派工作团即由农会派。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农会是中心组织，不要怕农会代替政府、代替党，统治了乡村的一切。因为农会没有地主，农会统治一切，就是农民统治一切。……农会的人当区长、党委书记，由农会来篡党、篡政。政府还是有权，以后地主投降了，个别的拥护贯彻土地改革的地主，还可参政。

《在六地委报告中关于工作和土地部分的摘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长期要农会，贫农(组)这个方针是长期的，不变的。即共产党在乡村只有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但怎样依靠法？什么样组织形式？看情形再说。本来乡村支部就应是贫农组。(即无产、半无产的先进分子)现在乡村支部成分复杂不行。如支部一百人，全村贫雇农才八十人，吸收二十人参加党也不占优势。这样支部无法领导贫农组，如何解决？大家讨论、讨论。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如果群众犯错误，我们去阻止他们，不服从他们，咒骂他们，那就要伤害群众情绪。冀东人民讲：美国人我们不怕，蒋介石我们也不怕，地主反攻我们也不怕，就只怕你们(干部)纠正偏向。这话对我们教育是很深刻的，你们应该少去纠正一点群众，土地改革是群众教育了我们，领导了我们。

《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我们劝告同志们不要怕群众犯错误，群众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主张这样办，那就这样办，即使是错了，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的，而且有好处。百分之九十的人错误了，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负责，我们怕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要这样办，假若我是县委，我就只有服从之义务，沒有反抗之权利。

同 上

农民有了土地沒有錢，我们就贷款帮助他们生产，为了这个目的多印票子膨胀也是好的，对生产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这就叫作财政服从经济。膨胀就膨胀，越膨胀人民越富足。

《晋察冀讲话纪要》(一九四七年)

(四) 誣蔑农村党組織，排斥、打击基层干部，用“搬石头”的办法把广大革命干部一脚踢开

再就是党的问题。……

有些地方还是不纯洁问题。是地主党、富农党，变质、官僚主义化的党，破坏了的党。一不小心，就被人强奸、诱奸、篡夺了的党，要经常警惕。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整党的两个步驟中，一定有逃兵，不要怕，政治上开小差，不要害怕干部党员出党，凡是想讨便宜的都出去，这些人迟早都要出去，不要害怕村干部躺下不起来，怕要不到粮食，怕要不到担架，许多人这样讲是吓我们，不要怕。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不怕，怕你这几个人。方式搞不好可能发生问题，附近这几个村子打了人，死了两个就闹翻了，我们主张尽可能少打，在群众运动中有许多干部要挨打的。领导上可能动摇，包括高级干部。

《在全国土地会议结论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发展不注意成分。今天证明，不强调阶级成分，阶级教育是错误的。反对阶级成分为“唯成分论”，那第一个“唯成分论”就是列宁！……贫农在我们党內沒有优势，特别在领导机关！相反，县以上地主富农子女接近一半，一半以上或绝大多数。区乡两级也有地主富农，也不少。政权中最多，职员一般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故实际上非三三制，为地主富农所占据。加以干部內战时与家庭无联系，现在衣锦还乡（秘密工作，二万五千里），也都有了亲戚、朋友、老婆、经济联系。因此，区乡干部与地主办合作社。因此，党內的中农成分，必然接受地主富农影响。所以，党不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地主；而是依靠中农，压制贫农，反对地主，而中农又受地主影响，因此，贫农孤立，在党內受压制，受排斥。因此，我党组织领导机关，与地主富农有密切联系，受包围，甚至被篡夺。……因此，土改中我们犯的有些错误，就是“类似陈独秀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沒撑农民腰，撑了地主腰。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要派出工作组，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

《在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上讲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

要群众起来说话，共产党不好，干部不好，可以讲，……凡群众要撤职的，统撤职。

《在六地委报告中关于工作和土地部分的摘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共产党在乡村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但怎样依靠法，什么组织形式？看情形再说。本来乡村支部就应是贫农组。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附录：刘少奇的地主阶级反动本性的大暴露

你家过去主要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你不能骂人，说他们是小子会、棍子队。不，他们是养活你们及其他许多人的大恩人，你应该尊敬他们。

《给他地主分子七姐的信》（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你现在退不起租押，人家要你吃点苦，也是应该的。你知道乡下的贫农雇农吃了多少年的苦，你现在吃这样几天苦，又算得什么呢？……现在你们吃苦了，再来找我，已经迟了，我也无办法了。……

我回这封信给你，还是为了你们好，……否则你们还是要讨苦吃的。……

同 上

敦傧（地主分子——编者）眼病，可到长沙去医治，长沙有好医院，不要来北京。湖南省政府主席×××同志已来京，他已有条给省政府和秘书处×××同志，介绍他去省立医院或湘雅医院治眼。敦傧可速去，保险可治好。

同 上

××同志：

我的七哥刘作衡由北京回家，路经长沙，請你招待数日，他即自行回家。据他说乡下

征粮有一些是过重的，交不起，这恐怕不完全是地主们的叫嚣，有加以考虑之必要。又我六哥家中因无劳动力，他儿子出来参加工作，十余年不能顾家，现家中老小数口要吃，亦交不起粮，不知有无办法减少。又我七哥有一个孙子想到长沙学校读书，不知是否有免费的学校给他入学，望给以帮助。麻烦之处，望予原谅。

《给湖南人民政府主席×××同志的信》（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已决定今年秋后分田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七哥大概要算富农，所以他家土地和财产可以不动，不会受什么损失。六哥家过去也主要不是靠收租吃饭，而靠雇請工人种地吃饭，他自己也劳动，所以大概也算富农，所以他家大概也不会动。

《给他地主分子七姐的信》（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如果你们退不出，可以請求乡农会允许你们等到今年秋季收租时再退，你可打一个借条给农会，請求农会原谅你们去年沒有减租的错误。如果农会要罚你们去年未减租的错误，你可以請求他们罚一点谷，在秋后交给他们。大概今年秋收，你们还可以收一年租，是合法的。但今年秋后乡下如果分田，明年就不能收租了，如不分田，明年还可以收租一年。

退押的事，你们已退出一些，如再无法退，可請求农会免退。中央已令各地停止退押，退不起的可以不退押了，到秋后，你们把田山屋宇交给农会分配就是了。

……今年如果佃戶和农会愿意让几亩田给你们作，你可請求佃戶和农会让出一点田作。如果农会佃戶不肯让，你们只有揽零工作，或将家中的肥料送给佃戶，帮助佃戶伙种，請求佃戶把多收的粮食多分点给你们，作为你们肥料和人工的报酬。在今秋分田后，农会还会分几亩田给你们自己作的，以后你们就作田吃饭。

同 上

作衡七哥并殿邦、秀林：

你们的来信都已收到了。乡下土地改革，正进了高潮，这是很好的事，你们应该赞成，不应反对。同时，你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被地主欺骗。你们家的成分应由农会大家评定，不要和大家爭吵。听说三家都定为富农，这也是有道理的，殿邦家因不种地，出租土地，虽生活不好，人家亦评为富农，但以缺乏劳动力为理由，或可請求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六嫂和四嫂家如不定富农，亦应定为小土地出租者，而不能定为中农或贫农。这些事，你们应完全服从农会决定。

七哥说到长沙开窑厂，如老实作这种事，是可以作的。但绝不要掩护乡间地主到城里住，到厂里作工，不要替地主藏一点东西，也不能接受他们一点送礼，如不注意这些，农会就会来找你的麻烦，你如有这些事，立即认错，把东西全拿出来。秀林家的情形，我完全不清楚，如果也是小土地出租者，可請求农会留给你一些土地和房屋，如果不是，那就难说，总之，也請求农会公平决定就是。张宏闓在天津听说不安心作事，和别人吵闹，要去学习。但他有许多小孩，不作事，就不能养孩子，所以不能去学习。我很不赞成他。又刘允良来信要来北京，我不知他读了多少书？他读书太少，不能来北京。以在乡间参加工作，参加农会或合作社为好。

七嫂、六姐、七姐问好。小孩子们在读书的都很进步，都是最优等，你们放心！

《给他地主分子七哥等的信》（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最 高 指 示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三七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四号第一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转摘自《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册第三四七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四页

六、妄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頑固地坚持走資本主义道路

編 者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自此以后十七年来，在中国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資本主义？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我們国家命运的根本問題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之間，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分歧和斗争。这些分歧和斗争，在建国初期，首先就集中表现在怎样对待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七屆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了把中国建設成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基本政策和主要途徑，并且批判了在这些問題上的各种"左"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又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混进党内的資产阶級代表人物刘少奇，在七屆二中全会后，特别是四月間在天津的一系列講話，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等問題，却提出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綱領，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

刘少奇通过美化資产阶級的"进步性"和私人資本主义的"积极性"，妄图調和工人阶級同資产阶級的矛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黑綱領。他百般頌揚資本主义制度的所謂"进步"和"光荣"，宣揚"剝削合法論"，把党的又联合又斗爭的統战政策歪曲为"与剝削者"結成"联盟"，認为社会主义"还是相当长久的將来的事情"。刘少奇頑固地站在資产阶級反动立場上，坚持走資本主义道路，要保存和发展資本主义，反对將民主革命迅速地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对抗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

依靠誰的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主席曾經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批判了党在城市斗爭中依靠資产阶級的謬論。而刘少奇却說什么"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級是沒有問題的"，"也可能是不能依靠的"。在农村中，刘少奇也不是象毛主席一貫教导的那样，坚定地依靠貧下中农，团結中农，而是主張依靠富农和富裕中农。

在国营經济的領导作用和限制資本主义的問題上，毛主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而刘少奇却說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长期合作"、"互相配合发展"，以此否認国营經济的領导作用。还說什么"不要限制資本家賺錢太多"，"賺多少錢都

合法”。同时，他还极力鼓吹“长期”保存和发展富农經济，鼓励富裕中农的自发傾向，同毛主席“**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英明指示相对抗。妄图使城乡資本主义不受限制地自由泛濫。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指示，說什么“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否則就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他伙同邓××，大喊“反冒进”，揮起右傾机会主义大刀，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正如毛主席所說：“**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都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刘少奇攻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謬論，为骯脏的資本主义剝削制度所唱的颂歌，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販卖的一系列右傾机会主义的黑貨，充分暴露了他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權派的醜恶嘴臉。这是党内两条路綫的斗爭。刘少奇拚命要走資本主义道路；但事实証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怒濤，冲走了一切妖魔鬼怪。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冲破阻力，以实际行动响应了毛主席的偉大号召，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完成了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一）极力頌揚資本主义制度的所謂“进步”和“光荣”，鼓吹“剝削合法論”

1．胡说剥削有理，美化资产阶级

现在剝削是救人，不准剝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剝削，要欢迎剝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內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剝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

《对安子文、王甫的口述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

雇难民劳动，买马，雇人，开油坊不叫剝削，他增加了社会財富。因为，现在是私有制社会。

同　上

以后作富农，雇請工人种地，自己也种地，这是可以的，合法的，不会受到大的斗爭的，所以你们及其他的人家还可以雇长工短工作事，以帮助你们进行生产。六嫂今年雇人种田是好的。四嫂亦可雇人种田。这样乡下找工作的人才有工作，你们也可过活。七哥家要雇人也是好的。因为允许雇人种地，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故可告诉乡下的亲故们：为了进行生产尽可雇請长工或短工，讲好工錢，订好合同，以后按合同待遇工人，就不会有问題。

《土改前给他地主姐姐的信》（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今天资本主义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剝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剝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剝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沒有人剝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剝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至于谈到剝削是否有罪，剝削不只是沒罪，剝削是有功的，剝削范围越广，剝削工人愈多，功劳愈大。现在，失业工人要求的是复工，是請资本家剝削一下，以免不致失业。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资本主义工厂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资本主义不仅可以存在而是还可以发展。工厂扩大是有好处。因此，即需扩大剝削的范围，这对工人有利，工人是反对你们不剝削他们的。因为工人要求复工，如工厂现在剝削一千工人，能剝削二千工人更好，能剝削二万工人最好沒有。沒有人剝削工人，工人会更痛苦，工人剝削虽痛苦，但比较好一些，吃不饱比沒有饭吃好些。开四个厂不是罪恶更大，而是功劳更大，这是劳资两利，你能赚錢，工人不失业。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有一个资本家是比较诚恳的，就是启新洋灰公司的经理周叔弢……他承认自己是剝削。他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錢又开了新华纱厂，一直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迪化还开了一个洋灰厂）。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发展私人资本，我又想开第四个厂子，但是有一个苦闷，如果我开的多了，剝削也就多了。我还想开第五个、第六个厂，那就剝削工人更多。资本大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清算起来就该枪毙了，但发展资本又对国家有利。"他总是这样苦闷。我向他解释这个问题，你想开第四个厂子是剝削工人多了，这算不算罪恶呢？这不但不算罪恶，而且有功劳。多剝削几个工人好呢，还是少剝削好呢？还是多剝削几个工人好！失业的工人要求复工，他们想到资本家的厂里做工，也就是说："請你剝削我一下吧！"他们要你剝削，能剝削我们倒舒服一些，否则我们倒觉到痛苦。今天东亚毛织厂剝削一千二百个工人，也不算少了吧！但是你们能剝削二千四百工人，多上一倍，也就更好！周叔弢的思想是错误的。我说剝削得愈多，功劳愈大。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在年青时代是有历史功绩的，"我说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们很喜欢听这个话。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但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允许剝削。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达，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性的，今天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你们剝削有功，剝削是进步的。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资本家的剝削是有历史功绩的，沒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煞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展他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剝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今天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你们剝削有功，剝削是进步的。他们听了这些话很舒服。我说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其进步性的，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功，是建立过历史功绩的，这一点马克思是从来不否认的。……今天正是中国资本家建功的时

候，是青年时代，不是老年，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资本主义剥削我们是不反对的。……你们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但又剥削工人，故是被剥削者又是剥削者。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有人说有人剥削比沒有人剥削好，沒有人剥削工人就会失业，所以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所以还应使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即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启新洋灰厂经理）他说曾到希腊文中去找“剥削”二字的代替字眼，最好不用剥削二字，我说剥削还是剥削，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这种剥削是进步的。我们还希望你们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只剥削一千工人，我希望你剥削两千工人，二万工人。股息就是剥削而来的，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政府现在号召生产，你们响应政府号召，就必须进行剥削，这是社会制度问题，不是那一个人要剥削。……你们办了工厂，增加生产，国家还可以抽税，那又是国家剥削你们了。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剥削不剥削由你们（指资本家）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剥削你，你不剥削不行，这不是你的意识来决定，问题是非如此不可。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无产阶级的解放，工人的解放，是政治上的解放，但在经济上还要受一点剥削，今天不受剥削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怕资本家不来剥削你，资本家能够剥削很多工人那才好，有人剥削总比沒人剥削好，有人剥削还能吃个半饱，这总是好一点。

同　上

今天的解放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不准许剥削，现在还办不到。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剥削是不好的，但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今天有很多失业工人想找职业。……东亚（指东亚毛纺工厂）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沒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沒有剥削好。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是不是你们（指工人阶级）还要受剥削，如果客观上不允许，还是有剥削的。……现在工人解放才是第一步，而他只能走第一步，不是不做，而是做不到。以后还要走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彻底解放。就好象女同志生育，本需九个月，但六、七个月就要生下来，这就叫早产，生下来也不会长大。今天的解放，还只是政治上的解放，还不能不受剥削。

同　上

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不要怕资本家得利，不要限制资本家赚錢太多。就是说资本家有利可图了，他们发财了，工厂开多了，临时工就可变成长工。今天吃稀饭固然沒有吃干饭好，但吃稀饭总比沒饭吃好。

同　上

资产阶级“也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他们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出日用品，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赚錢了。这件事好不好呢？这是好的。如果不懂这个，有‘先打倒他们再说’的思想，这将犯错误，这就是不懂政治，政治觉悟还不够”。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资本家办工厂，要多办几个，办得大一点。这是不是剝削呢？当然是剝削，但是这个剝削有进步作用，剝削得好！现在人民不是怕你剝削，而怕你不剝削。他叫你剝削多一点而不是叫你剝削少一点。我到天津的时候曾讲过，说你这个资本家，现在有几百工人在门外等着，要到工厂做工。问题就是“资本家先生，我们請求你剝削一下，我要到你工厂里面做工，剝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剝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工人要你剝削，請求你剝削，你剝削人家许可，不剝削人家就苦得很，所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带有进步性，它也能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时期，它能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致，与国家利益一致。现在资本家不是这样讲吗？一个大私商，你跟他讲话，他总说我做生意原来是沒有饭吃，因此开一个铺子，我才找到饭吃。你开铺子，什么东西卖给人民，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在学干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有些工商业家向我提出过，“剝削者”、“资本家”这些名字是不是可以改一下？……我说：好，改一下，那么改成什么呢？剝削者、资本家也很好，很进步嘛！现在大家要請你剝削。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故意这样讲，因为这是眞理，眞理就要宣传，不能隐蔽。向大家讲清楚了，不怕人家误会。

同 上

现在大家一齐来搞，为中国工业化而努力，当将来收归国有的时候，资本家的贡献越大，就越光荣。有些工业资本家问：“国有化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以为工厂是个负担。他说：“我多开一个工厂就多剝削一些工人，将来罪过更大。”不是的，那是贡献更大，不是罪过更大。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讲话》

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它沒有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也沒有跟蒋介石走，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沒有理由剝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我们比十月革命条件好，条件之一就是资产阶级不是坚决反对我们。由于它不是坚决反对我们，再加以教育、爭取，才能使大群的知识分子眞心为我们服务，比起十月革命，这是很好的条件。

《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全体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马克思主义眞理有这一点：个人、少数、部分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一个民族的利益要服从全人类的利益。……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不管你过去是那一个阶级出身，过去的生活情形怎样，实际经验怎样，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一条，那就证明你不是站在那一个阶级考虑问

题，决定问题，而是站在眞理的立場，社会进步的立場，来考虑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经常教育我们的党员，就是这样：当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牺牲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为很多的共产党员还不能做到，不是共产党员的能做到这一步，那么，他就比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现在还有很多工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工人，也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按指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能做到，那就比他们更高明，觉悟更高。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到了一定的时候，资产阶级它要反动的。但在目前这一个时期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它的进步作用与革命作用，它还可以参加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滿清政府、反对封建主义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这时是革命的。现在呢？还有革命作用，进步作用。……我们那时搞“实业救国”，就是指的资本家为人民服务。现在资本家还可以为人民服务。资本家也是这样讲：“我开个工厂，我是为了提高生产呀！”有些人是不一定这样的。实际上他开工厂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赚錢，他不管国家不国家，生产不生产。这样的资产阶级今天有沒有呢？有的。但是，有些资本家他开工厂，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富强，多搞一些工厂，跟帝国主义爭一口气。……这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时候，他这种思想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与人类利益一致的，所以还有他的进步作用。

同　上

处在中间状态的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半心半意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着他们原来的政治面貌。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现在感到“形势逼人”，必须继续进步，不能停留在原来那种中间状态了。他们开始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面性，承认必须改正自己的许多错误观点，并且表示决心改造自己，向党“交心”，爭取成为左派。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地参加了整风运动，表示决心要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红色专家。……

《“八大”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有些（指资本家）是很能够作事的，甚至他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超过我们的同志精明干炼的人，懂得技术的人不少。如果把他们说通了，他也不用资本主义办法来管理工厂，他也用我们的办法，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管理工厂，如果管理得很好，那为什么不可以呢？把资产阶级说通了之后，改造之后，他比共产党员管工厂管得好一些，这种情形是可能的。

在资产阶级中间，在资产阶级的老婆中间，在资产阶级的子女中间，有一批积极分子，赞成共产，宣传共产，这种积极分子很可宝贵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斗爭，对于今天的阶级斗爭形势是很有帮助的，他们有功劳，等于在战爭中打一大仗，他们是战斗英雄一样。

要夺取资产阶级的堡垒，需要资产阶级里面有些人起义，起来赞成共产，而且是积极分子，……资本家的老婆，晚上回去一座谈，就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要这样看他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中国，除了买办资产阶级以外，民族资产阶级是跟我们走的。他们愿意接受改造。

在打日本帝国主义时，民族资本家跟我们合作。

在反对蒋介石卖国贼时，民族资产阶级不跟蒋介石合作，也不同美国合作，而是跟我们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跟中央人民政府合作，并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

我们搞社会主义了，他们又跟着走。他们说：

——我们愿意走社会主义！

——我们愿意接受改造，进行生产！

——我们愿意拿出自己的工厂跟国家合作。

这样，我们就沒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就沒有理由硬来沒收他们的财产。结果只有答应他们合作。

但是，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是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家又表示愿意接受。

我们也给资本家一些好处：

第一，给他们选举权；

第二，给他们一部分利润；

第三，给他们工作和工资。

这样，资本家就要想一想，有三条好处：政治地位，利润，工作，就可以干下去。

不干吗？资本家自己也明白，他是不能反对的。如果反对，三条就沒有了，并且还要受到审判。

…………

工作在私营工厂，生产不积极，磨洋工，更不节约。一旦公私合营以后，非常努力，也很节约。

…………

全行业公私合营并不是我们要这样作的，是资本家自己要这样作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只有几户公私合营，顾客就会全部到合营的商店里买什么，不去私营商店买东西。这样，不公私合营的企业就沒有生意可作。商业是这样，工业也是这样。所以资本家开会说，要合营大家一起合营。

《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这个政策（指利用、限制和改造）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做到的。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的同志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教育，把"资本家剝削""工人翻身"都讲了，对劳动纪律却讲的很少。我们对工人的政治教育愈深入，资本家愈害怕，愈恐慌。有些资本家把我们的书都买了去，看马克思、列宁的书，看毛主席的书，有些比我们干部读得还熟。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出国代表团原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去埃、印等代表团中，资产阶级代表更吃得开，更受欢迎，共产党的代表还不那么吃得开。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资产阶级已经沒有什么生产资料，沒有工厂了，而且多数依靠工人阶级吃饭，当然还拿定息，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说法可以用，因为现在还有定息，再过五、六年，定息也不给了，就不好再讲资产阶级了。

中国资产阶级还要有一个时期。

同 上

再过十五年，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死了，青年人长大了。……坏人是会有的，那时的坏人不一定是资产阶级及其子女，干部的子女也会有坏的，现在资产阶级的子女沒面子，他们好好努力反而会好，恰恰我们干部的子女，认为自己沒问题，反而可能出右派。

同 上

2．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叫嚷剥削阶级可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我们讲"人民立塲"是有阶级性的。现在资产阶级立塲跟人民立塲还有一致性，但是将来就不会一致了。……因此，我们从现在培养起，到将来就会有很多人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塲，跟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有很多带勉强性的，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塲。也可能有少数人一定站在他那个阶级的立塲，站在反动的立塲，现在还不到那一天，还不要伤害它，到那一天国家决定了，法律颁布了，就一定要这样办，不照办不行，所以到社会主义时，资产阶级有可能站在人民立塲，而站在人民立塲就是拥护眞理，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代表社会主义进步的利益，因此也就可以跟无产阶级一致，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可以认识眞理，用得眞理。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我们将来要进入社会主义，只要我们现在的合作搞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因为还有多少年的合作嘛！在多少年当中，就可以摸清楚。资产阶级摸清楚了，共产党摸清楚了，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也摸清楚了，到那个时候就可以不需要采取激烈的斗争，可以采取说服、法律、开会表决……的办法，甚至可以给它一点代价，用各种方式，采取社会主义步驟，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我们从现在就培养起，到将来不仅使之成为可能，而且使之成为现实，我想是有希望的。到那个时候，如果资本家赞成国有化，基本问题就沒有了。但是，也许有少数人反对国有化，怎么办呢？就消灭它，很简单。因为有这种被消灭的可能性，那就只好站在这边，赞成国有化。眞赞成了，也就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塲上，与无产阶级立塲一致了。

同 上

在你们学习报告会上，讲一个“人民的立場”，这话也可以讲的。现在是有阶级的社会，人民中间是分成阶级的。人民是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现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也能一致，但是在这中间，资产阶级是勉强的。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领导统一战线，团结各党派，使他们服从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与我们各地党员的觉悟程度的高低密切不可分。搞得好的话，可以使资产阶级，以至从反革命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分子，都心悦诚服。我们看戏，看红拂传，虬髯客看见李世民，便打消了夺取中国天下的念头，就因为他觉得李世民的觉悟程度比他还高，所以他不做皇帝了。中央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搞得不好，他就要称王。

《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全体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就个人来讲，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也可以不革命。基本问题是一个想头，“一念之差”的距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个人讲，可以这样认识。可以彻底改造，那就相当困难，因为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搞惯了，一个人作地主作了好久，从来沒有劳动，从来沒有跟农民在一块，生活习惯、讲的道理都不是农民的。但是可以“一念之差”，地主不做了，问题就解决了。彻底摔掉地主阶级，站过来，站在劳动人民方面，拥护土地改革是认识了，但是站在这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劳动起来手疼，讲起话来也不同，你讲的话，我觉得不好听，我讲的话，他们觉得不好听，搞不好。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甚至可以说是要经过一个痛苦过程的。但是，立場的改变，站过来，站过去，那并不是困难的。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人，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认识这个眞理。但是到了那种时候，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你要拥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要离开你那个阶级。对个人来讲是可以离开的，而且并不困难，只是“一念之差”。(生活习惯的改变，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要搞好就要经过学习，经过斗争，经过痛苦，经过生活方式各方面的改变。有这样一些过程，但是立場的变更，并不困难的。

同 上

只剩下一个资本家拿定息，我看就让他拿一下也好，越拿就越脱离群众。……问题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彻底的孤立起来，把他的政治资本剝夺干淨。这个话是不向外面讲的，在那里也讲得少。就是故意让他吃好一点，他越吃得好，越穿得好，就越孤立，政治资本就越沒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它的知识分子，要把他的政治影响夺干淨，有什么办法？就是用这个办法，给他选举权，给他政治地位，给他高工资，给他定息，让他这样做的时候，于是他的影响在全国人民中间就逐步缩小，搞得沒什么影响。

《在江苏、南京市和驻宁部队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3．歪曲党的统战政策，对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只团结不改造

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地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自由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今天（对资产阶级）重点还是团结，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內，这个重点还不会变。

《对天津工作的初步意见》（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

“用统一战线的办法，以利用、限制、改造资产阶级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多数化过来，这个路线是正确的。再过十五年可以化过来，坚决反抗的死了，其子弟也忘了工厂被拿的事。他们和地主阶级不同，地主土地被沒收，有杀父之仇，再过十五年，他们的小孩长大了还会要报仇，这是阶级仇恨。我们对资产阶级沒有杀父之仇，对他们的财产也不是一下沒收，还安排他们，给饭吃，给定息，总要好一些，要从长远的利益看。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统一战线就是要这样统下去，把资产阶级统得干干淨淨，将来资产阶级也变成劳动者了，有些成为体力劳动者，有些成为机关干部，同我们沒有区别。

同　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劳动部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说：要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资本剝夺掉，不降低他们的工资，不取消定息，他们放弃定息也不行。……如果把资本家的工资减了，定息取消了，他们到处叫嚷，爭取很多人的同情，对我们不利。

劳动部大字报：《刘少奇是苏修物质刺激钞票挂帅的积极倡导者和鼓吹者》（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与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爭。……但重点在那里呢？在今天来说重点是放在联合上的，将来是不是会把重点变更呢？可能的，但把重点放在联合上的时期是相当长的，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一道发展到社会主义。我和东亚毛线厂经理宋棐卿谈，我问他：“二十年后你办到八个厂的时候，那时我们也许要搞社会主义，那时如果我们再给你八个厂，共十六个交你办，因为你能干，薪水不减，还要加你的薪水你干不干呢？”他说：“大势所趋，为什么不干呢。”所以今天重点主要是放在联合上，特别是在经济上要和它联合。联合的方法就是从原料到市場，要和他们有一个适当的分配。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爭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但以那一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爭。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爭，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爭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减低，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所以要打倒民族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所以要和他

们联合，同时进行适当的、恰如其分的斗争。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但工人和资产阶级利益又不能调和，故又有斗争又有联合，但重点是在联合，不是斗争。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小，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多万，而共产党员只有三百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联合农民，联合各民主阶层，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其中包括过去跟我们打过仗现在觉悟过来脱离了反革命阵营的分子如傅作义、程潜等。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是不应该动摇，不应该怀疑的。

《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全体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革命还沒有胜利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大喊大叫，人家不那么听，听的不多，只是先进分子听，效果不那么显著。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了，现在他的后代，继承者，跟他有关系的人去做这工作，效果就很大。所以，那个时候做的工作，现在才发生效果，现在的效果是那个时候来的，不要以为我们的本事那么大，好象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样子。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一些工作，能够有效果，不只是现在的共产党有效果，而且同历史上一切优良品德都有关系。过去马克思讲话就沒有人听。列宁讲话的时候也是大喊大叫，听的人不多。现在不同了。沒有马克思、列宁，我们就讲不出这么多话来，听的人也沒有这么多。所以，这是历史的结果，历史的发展。又说：也可以讲，台湾总还有些比较好的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里面，就有很多好人，……你说台湾沒有好人？那不见得。他现在不大好，还可以变好的。还说：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可以调动，民主党派可以调动，所以，我们合起来有好处。我们沒有你们，我们的力量就小一点，有好多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当然，你们如果沒有我们，单纯去调，也调不了很多。我们能够调动一些，你们能调动一些，合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孙中山先生在世时看得很清楚，沒有共产党帮忙，他自己调动积极因素也能够调动，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共产党加上去，共产党调动一部分，孙中山调动一部分，合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后来蒋介石就不要我们去调动，他单独去调，一个人去调，把我们一赶，结果他就调不了很多。统一战线，合作，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取得的成绩就是合作的成绩。我们不合作，成绩就不能这样。如果不合作，闹分裂，就要抵销力量，损害力量，不但有一部分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还要损害一部分。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们有两个联合：一个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联合剥削者，即联合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还有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宗教界等。为了对付敌人的残余，为了克服落后，我们不仅需要联合劳动者，而且也要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和劳动者联盟，党内认识是一致的，沒有争论的；对联合剥削者的问题，党内有些同志还有

不同认识，还有问题。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苏联革命后也提出过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残余。不是去反对小商、小贩、个体劳动者、地下工厂，而是去反对思想残余，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不能解放在其他各阶级之前，而是在其他阶级之后，对资产阶级也是一样，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要赎买，给六年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把资产阶级安排好了，工人阶级才能顺利地领导我们国家的建设。

《召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志对团的"三大"作的重要指示》(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

如果只要工农联盟，不和剥削者联合了，怎么样？如果这样，我们就可能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破裂，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也可能和我们破裂，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也可能和我们破裂，可能反对我们，可能造反。这就可能使我们发生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麻烦，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陷于被动，而且很难解决。……全国私营企业的工人有××××万，如果发生大批的关门失业，我们的困难就更大了。

经过统一战线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地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就省了大麻烦。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要保持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在经济上，……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从消灭剥削阶级来讲，统一战线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剥夺的方法可能是辅助的方法。所以，统一战线工作对党的总任务、总斗争来讲是配合的，对于消灭剥削阶级来讲则是主要的。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现在对用统一战线办法可以消灭资产阶级这一点大概沒有人怀疑了。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的若干问题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资产阶级大部分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一定会有一小部分坚决反抗的，不估计到这点是要犯错误的，但总的来讲是可以和平过渡，大部分不坚决反抗才能和平过渡，做到大部分不反抗或不坚决反抗，实际就是减少了反革命，统一战线的效果成绩就在此。

同　上

毛主席说过："我们不怕资产阶级造反。"问题是在于有沒有别的方法使他们不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会坚决反抗，这是一定会有

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而跟着我们走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这样对于我们和他们双方有利，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会使他们感到跟着我们走对他们也是有利的。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其实，他们（指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要求并不很高，不是很难满足的，只要我们稍为大方些，稍为不怕麻烦一些，对他们的工作稍为做好一些，就不会有问题。他们中有些人是只要求有吃有用，有些人还要求榜上有名，有些人则要求与闻政事，也有的人要求有实权。我们对前三条尽可能予以满足……但如要有实权，则需要有条件，即要他们有做好工作的能力，眞心同我们合作，并能按我们的政策办事。当然我们应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建立功劳，做出成绩，但也要靠他们自己努力，这就要有条件。因此，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就必须恰当。

《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三年）

交公债、完税、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等就替社会主义作了许多事。但那时沒有讲，他们不自觉的为社会主义作了许多事情，他们要求的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他们最高兴各得其所，要新民主主义万岁。我们那时沒有讲，模糊了资产阶级，麻痹他们一个短时期有很大的作用。军事上兵不厌诈，军事上只要能欺骗敌人几个钟头能起很大的作用。政治上麻痹他几年就很好了，等他知道上了"贼船"但已到了河中间，已是进退两难了。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从革命胜利以来就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就是那时的统一战线，党派未变，阶级未变，人事关系也沒有变动，纲领也沒有变。不过，在总路线宣布以前，我们沒有讲搞社会主义，那是有意不讲的。天津资本家怪我们为什么不早讲，要等他们上了"贼船"才讲。就是要等你上了船到了河中间再讲到社会主义去，看你去不去，不去只有跳河。

同　上

（二）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誣蔑和攻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頑固地坚持走資本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我们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要搞社会主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讲话》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保证劳动人民的天才和创造力得到发扬。

《在全国战斗英雄、工农兵模范代表会议上报告》（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

沒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万岁！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制度万岁！

《在北京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时期，待十年建设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六月)

将来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百分之十，要发展到百分之四十五十，那怕你跑的怎么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因此，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把工业收起来，对人民沒有利益，而且人民也不愿意这样搞。如果搞，就要伤害工业生产的积极性。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说到用和平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指资本家)很有兴趣，他们要我具体讲，到底怎样的和平方法，我说这个事很难具体讲，到底怎样的和平方法搞社会主义，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资本家问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是怎样一个转法？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我说几十年后的事，我也不能具体讲，时间是会很长的，十年、二十年或则更长。我举了个例子，譬如东亚毛织厂经理宋棐卿先生很能干，从一个毛织厂起开了几个，如能在二十年中开八个厂，便够你管的了，如果到那时候搞社会主义，八个厂都收归国有，那时怎么办？因为你能干，管理得好，所以收回国有后还归你管，甚至加八个厂，十六个厂归你管，薪水再加你的，你干不干？他说那当然干。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现在资本家情绪很多不安，小资产阶级也不安，农民也不安、动荡，不晓得怎么样，不能掌握命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来改变两种所有制：要把小生产的私有制——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所以牵涉的人很多，所有的农民牵进来了，小手工业者牵进来了，小商小贩牵进来了，所有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牵进来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不加紧宣传，不说清楚的话，或者我们自己也犯错误，共产党在政策上犯错误，再加上反革命分子一鼓动，就可能发生大问题。……

全国除工人阶级之外，全国人民都动蕩不安。因此，同志们要紧张起来，谨慎小心。

《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自由市場有的时候涨，有的时候落……整个的问题是，我们的步子跑快了一点，明年要稍许慢一点，稳当一点。慢一点就发生了很多问题，高中学生考不了大学，初中学生考不了高中，沒有技术学校进，小学生也进不了初中。

《在人大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刘抹煞阶级斗爭，说："搞合营是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困难，因为是集体的，不能采用沒收，为减少将来麻烦，还是合营的好。"

刘在一九五三年在听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汇报时说："手工业资本家加入合作社，可以考虑……把小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方面拉过来，就要挤垮小资本家。北京糖果业资本家已经挤掉一个。生产合作社发展，跟资本家竞爭，挤垮资本家是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又说："要提倡互助精神，发扬合作思想，有饭大家吃，不要搞垮人家。用社会主义经营方式，不要与人家竞爭，搞资本主义独占思想。"

第二轻工业部大字报：《蕩涤刘少奇在手工业方面的流毒》

（三）抹煞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区别，鼓吹发展城乡資本主义

1．胡说国家在工厂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要依靠资本家和资本家的代理人

如果除开国外矛盾不算，单就国内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尚不能互相脱离，我们可以拖一下，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搞社会主义了。那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因此，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还不能搞破裂。

《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但工人阶级在一定的时候，也可能是不能依靠的，你看英国的美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依靠呢？搞了三四十年，共产党员才有三四万人，他们赞成马歇尔计划，你怎么能去依靠，……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是沒有问题的。

如已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指天津地区)为共产党员，然后就可以说这个工人阶级是可靠了。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国家现在接收官僚资本的工厂，管理后还不如资本家管理好，何况再接收几十几百个小工厂，那怎么管理呢？那更管不好，也沒有那样多干部，就是将来你们大家(指工人)能够当厂长，但是因为经验不够，搞不赢资本家。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领导同志中间沒有懂技术的和以前长期专业的人员，只是打过游击的班子，当然这是骨干，对组织决定方针、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我们有不自觉的宗派主义。解放后已五、六年，可说时间已经不短了，资本家的代理人，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已不是资本家了。我先提出一个问题，請你们考虑一下，不要以为那些人提拔起来一定比你们差，可以共同商量问题。他们百分之九十几政治上是可靠的，其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思想上有资本主义残余，就在我们这些干部中也有嘛，只是个多少的问题，只要我们加强教育就会好的。

《对交通工作指示纪要》(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

我切切实实的负责的向你们说，希你们考虑这个意见。……使资本家、工头能够管理工厂，为了生产的需要，使资本家有雇佣工人和辞退工人的权力。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城市讲生产，资本家的知识比我们多，比工人知道的多，在城市生产方面，他们占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必须和他们合作。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报纸说资本家坏话，我们承认错误，承认有些偏向，应该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报纸上把资本家放在什么地位，有沒有地位？谁前谁后？我说如果讲政治、讲革命是工人第一，资本家是不能摆在第一的。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小资产阶级，你们是第四，第四也有地位，但讲生产讲建设你们行，我们外行。

《在北京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我到天津以后，对他们讲，禁止工会和工人接收资本家的工厂，为什么呢？因为接收了之后，就把生产破坏了，如果资本家要办这工厂，还可以保证开下去。因此我们为了将来利益起见，就要使资本家的工厂不关门，工人不失业。如此少一点工资，资本家就能把工厂办好；当然工资降低，就要使生活不好，吃不饱。我说："吃不饱，吃个半饱也好，吃半饱还比全沒吃的好一点吧？今天吃个半饱，明天勤劳一点，发展生产，将来就吃饱了。"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你们是国家在工厂的组织者。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

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

《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职员是什么人呢？也是工薪劳动者，是出卖劳动力的，这一点职员和工人是相同的，也是无产阶级。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有些工厂有几十年的历史，有三朝、四朝、五朝的元老，工厂的年龄，比你们出生的早，不要轻视他们的各种制度，各方面都有很多的经验。现在我们接收以后，有一点是新的，即不压迫工人，其他许多经验都要用，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现在我们对这些经验轻视，一去就想搞一套新的，但一搞便垮，敢于否定人家的制度，是很错误的，引起工人的不满，这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以人家为老师，我们一定要向国民党工程师学习，向老工人学习。

《在赴哈职工代表各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四八年）

过去在国民党的统治利用之下，一部分职员对工人做了不好的事，打过工人，尅扣工人工资，开除工人，甚至强奸，这种情形我想是有的。今天工厂变成了人民的了，工人要提出说一说，我想是应当的，但是不是过去你打了我，今天我也同样打你呢？工人同志们应当有思想，脑子应当会想问题，要分析一下这些事，过去职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不是应当负完全责任呢？仔细想一想是要蒋介石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负责的，是他们要职员们这样做的。官僚资产阶级、战犯是不能饶恕的。但他下面的人至少还有一半的责任，但应当原谅。今天打他也好，骂他也好，判罪也好，但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工人应当采取"既往不究，……以观后效"的态度原谅他们，……但我们不要着急，今天反省不好，就再等他一个月两个月反省好。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最近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劳资关系问题，经过这几天之后，资本家高兴了。情绪算是安定下来。有的资本家说，一年之后，天津就变了。这就是利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是成功了。资本家沒有生产积极性是一个社会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工人不高兴，干部的思想沒有搞通，以消极的态度来抵抗。不作声就是有问题，需要我们好好说服。

《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工人诉苦在原则上是允许的，不过先召集职员、工头解释清楚，最后工头、职员也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不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可以调换到另一个厂里去工作，太坏的也可以撤职。

《对天津工作的初步意见》（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

2. 鼓吹公私企业合作发展，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

这矛盾(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先就是经济竞爭，而且是很长时期的和平经济竞爭，在不断竞爭中资本主义经济就让位于社会主义经济，……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经济问题》(一九四八年九月)

民主政府主张目前阶段必须的政策是：国营、合作经济、私人经济都要发展，但在发展进程中须要逐步适当的和平经济竞爭。

同 上

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是已经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爭，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并不反对那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暂时的，有长期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得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的。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同 上

资本主义今天不能消灭，因为今天是进步的，所以不但不消除他们的剝削，而且还发展他们的剝削。这样才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这样有好处，资本家可以赚得錢，工人也得到了好处。这样才能劳资两利。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內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錢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錢都合法！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他竞爭呢？这也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爭！就是学的你们的么！不过贸易公司统治原料、市場，是普通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場，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

同分配，这叫做“有饭大家吃，有錢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们的党、政府、公营企业必须主动的去找私人资本家，和他们合作。公私企业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个的经济体系，……在原料市场价格等问题上都应当和私人资本家商量合作和共同分配，使公私企业互相配合的发展。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工业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是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錢的时候在后头。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接四月三十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致宋棐卿函》（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按〕宋棐卿，天津有名的大資本家、大吸血鬼，东亞毛紡厂总經理。解放前以残酷剥削工人著称，工人把該厂比做“文明地獄”。解放后，刘少奇到天津，曾亲至該厂参观，对宋倍加贊賞。以后又將宋棐卿塞入全国政协任常委，幷担任国家财政委員会委員。在刘少奇的縱容和支持下，宋棐卿明目張胆的騙取国家外汇，大搞投机倒把，幷在为国家加工訂貨中偷工减料，牟取暴利，仅在一九五二年“五反”时揭发，非法利潤卽有四十亿元。最后在刘少奇的包庇下，終于携带孩子老婆和价值二百万美元的資产叛国跑到香港、南美。此信是当宋棐卿写信給刘少奇，大談其发展資本主义工厂計划时，刘少奇的复信。

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听到的消息很不好，要斗争他们，我去以后，找他们谈话，他们也要求见我，首先找大资本家说清楚了，那些不大不小和小的资本家就会这样想：“大资本家沒有问题，我比你还小，更沒有问题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首先找了几家大资本家，给他们讲好的消息，说我们实行公私兼顾，……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国家贸易和你们私人资本家大做生意，有錢大家赚，有生意大家做。我们的工厂少，也需要你们去做，大家分营，大家去卖，你也去卖一点，国家的貨物也推销，私人的貨物也推销，都能够销售。至于价格，可以规定一个相等的价格，大家可以研究办法。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到搞社会主义的时期，工厂收归国有，你们资本家怎么办呢？我说：“只要你不反对社会主义，或者你还赞成，又因为你能干，管工厂比我们干部管得好，那么这八个工厂还叫

你当厂长，如果八个工厂少，再加上八个给你，十六个厂的厂长，你的薪水不但不减，而且还会增加，这样你管不管。”他说：“那当然管了！”他又说：“我管是管，我这毛织厂的股东怎么办呢？”……我说：“这个股东是有办法的，到那时候（社会主义）工厂收归国有，因为国家财政经济困难，沒有錢，这个股金一下子退不起，慢慢的退，分期退，十年退完，十年退不起，二十年退，二十年退不起，那就要动员一番了，那就应该把股票献给国家，政府就向你恭喜一番吧！这是不是会有人给呢？到社会主义那个时候，工厂收归国有，人人都有事做，都赚了好多薪金（几十块，几百块），就不靠这几张股票的利息来吃饭了（现在利息很高，一股十多分，到那时工业发展了，那会有这样高的利息，一股不过是几厘），这就可能把股票的问题解决了吧！”这些资本家听了这些很舒服，于是他说：“往前共产党的问题，一点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了。”我说：“我给你们摸着，你们要摸什么样的底，我给你们什么样的底。”又跟资本家这么一谈，他们即清楚了，各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于是他们的情绪就改变了，就安心了。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东亚经理）谈，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了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沒有錢，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将来国家发展了，就是实行工厂国有化，私有的收归国有（首先是大工业），在那个时期，就可以保证把工厂交给国家的资本家，保证他的生活至少不至降低，保证他的工作（地主今天还要分发给土地，让他自己去搞），或者还可以给一部分代价，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我去天津曾经讲过，现在你有几个工厂，你又会管理，到那时你的工厂缴给国家，国家是不是会撤你的职呢？不会撤你的职，你会管理工厂嘛！国家还会把几个工厂叫你管，现在你只管一个，将来叫你管五个，管六个，你管的不是更多了吗？既有了工作，又保证了生活，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监督资本家现在还无经验，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不要提出监督资方的条文。而且只说监督，也不一定要资本家签字同意的。

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可能只不许有五毒及賬目公开。

《对全总党组批转××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我昨天同许涤新同志谈话，说资本家中间有这样一种抱怨，说资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难当，负担很重，要带头违法……有些资本家外边有很多活动，公股代表总是抓着他，让他

参加厂内的工作，外边总是要他参加外边的工作，两头不讨好，负担很重，带头违法，安排不当，现在资本家中间有这么一些抱怨……。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公私合营后，企业中，资方代表照规定不应加入工会，如加入工会，他就不能很好地代表资方。他不加入工会，并不损害他履行副厂长的一切职权，工会方面也不应该使他这种职权有所损害。

《批改的〈全总党组对化学工会关于永利宁厂合营后工会工作问题的答复〉》（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斗争不要过分……，如果不这样，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就是工厂关门、倒闭、生产降低，工人失业或者是工人孤立，农民和职员都是你们不对，到那时候你们很痛苦，到那时候要政府救济，政府是沒有力量的。你们把资本家捉来枪毙了，他便不能办工厂了。有些工人说："资本家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社工厂"。开了合作社工厂沒有呢？开了很多，但是沒有一个搞好的。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接收资本家的工厂或商店，由工人开合作社的办法，肯定的要禁止。

《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我在工人代表会上曾号召工人要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沒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后，同意了，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一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

《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3. 鼓吹"长期"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

将来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沒坏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加限制。……

现在限制是过早的，现在能单干是好的。

…………

这不是自流，现在流出点富农来好。

什么是放任自流？

让雇工，让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马一犁。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则不能放任。对干涉有三马一犁的不能放任。

《对安子文、王甫口头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

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場，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沒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作到的。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有人问："雇人耕种的土地是否有限制？"我们的答复是：沒有限制。无论雇长工也好，雇零工也好，雇十个八个甚至一百个也好，只要是自己耕种或雇人耕过自己经营的土地，我们就应该加以保护，不得侵犯。

《在政协全委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讨论的结论》（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

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因此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驟，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发展。正由于这个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所以中共中央提议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不受破坏。因为富农经济的存在及其在某种限度內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四）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

1．鼓励发展个体经济

在农村我们曾经宣传过劳动致富。什么是劳动致富呢？就是劳动发财，农民是喜欢发财的。……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破坏作用，这是反动的，就是所谓"左"的错误，因为它破坏了生产积极性，妨碍生产力的提高。所以马克思说："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错误的。"我们曾经反对过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下过这样一个结论，说它的性质是"反动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以现在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违背进步的。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什么是富农？有三四马、一副犁、一挂车的农民算不算富农？这不是富农，是中农！东北这样的农民有多少？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十的戶口。而东北农村的富农戶口，所占的比例，则必然更少。

这种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戶所占的比例，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有百分之十应是富农，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沒车马的贫农。

这种中农，应该大大的发展。

《对安子文、王甫口头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出

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对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一年七月)

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什么基础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个不好的基础！不是眞正的个体经济。

东北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戶参加了变工互助，就是在于说明个体经济的破产，不得不变工。

将来发展的结果，是恢复个体经济。

要发展成有三匹马还可以变工时，才眞正是自愿了。

因此，现在占百分之七十农戶的变工互助不能再发展，将来要缩小。

《对安子文、王甫口头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不要以为反对单干的都是集体主义者，因为他不能单干，他们都是不能单干的贫农。

同　上

总之，将来变工队会缩小，这是好现象。它是证明经济发展了，许多农戶成为中农了，能单干了，这是应有的现象。有了百分之七十三匹马的农戶，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

同　上

现在东北的互助变工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看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历史阶段的问题，要防止急性病。

集体农庄要使用机器，是大规模的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一般地说，一个村落要成立一个集体农庄，……

到那时，他家使用机器生产，他还硬要单干，是不会有的。

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

正因为两个阶段上的事，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

沒有机器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时也有过沒有机器的集体农庄，但它已订了貨，一、二年机器会来，所以也能巩固，但若无此情况，三、五年的巩固(马和犁)，是巩固不了的。

现在的变工互助与供销合作社组织，有教育农民的作用，这可以敎育农民的集体观念，将来加上机器再搞集体农庄。

同　上

几个初级合作社，不能算社会主义的萌芽，要合作化，必须象苏联一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要搞合作化，条件不成熟。

《在马列学院学员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

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农村要实行社会主义，如果沒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六月)

2．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

五三年到五五年二年內，全国合作社由四千发展到五十万个。当时邓子恢主管农口。他认为合作化快了(合作社沒有章程)，五五年四月底，向刘少奇汇报，少奇第一句话便说："斯大林有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你看过吗？"幷要邓"好好写一篇文章反一下冒进!"五月初，少奇主持会议，邓提出三点：(1)停：合作化发展太快了，领导跟不上，暂停发展。(2)缩：社的领导不是贫下中农的，有的社太大(万戶大社)，要收缩，要砍掉十万个。(3)整顿：(阶级基础)合作社不要地主富农，富裕中农慢一步缓入。当时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幷正式批准(有文件)。结果砍了二十多万个。直到八月，主席回京召集各省市书记会议，才挽救了农业合作化。

摘自《邓子恢谈农口的刘邓路线》(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

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许多遗留问题，或者还需要调整现有的组织形式。……许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错误地忽视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

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沒有认眞地加以提倡和研究，这是不对的。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按〕这个假檢查隱瞞了在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的两大错誤："先机械化，再合作化"，"长期发展富农經濟，再合作化"，仅仅説成"要过一些时候"再搞。

只有少数富裕中农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都准许了符合于一定条件的地主和富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富裕中农看到富农和地主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也就要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了，因为他们要走在地主和富农前面。

《同某国大使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

最 高 指 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五二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五二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六五——三六六页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七九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五五页

七、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論，积极主張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爭，反对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編者按

我們偉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毛主席在这部偉大著作中，总結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历史經驗，第一次全面地、系統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級和阶級斗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英明論断，天才地、創造性地繼承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学説，为我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路綫、方針、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在这部光辉的文献中，我們偉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級斗爭幷没有結束，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單有經济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夠的，幷且是不巩固的。必須还有一个政治战綫上和一个思想战綫上的徹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与此相反，刘少奇却步苏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叛徒集团的后塵，大肆宣揚阶級斗爭熄灭論，叫喊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阶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誰胜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决了"；幷胡謅什么"当前主要矛盾在于人民羣众中物質分配不平衡"，在于人与自然界矛盾，"今后十年'要'以主要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等等。他极力歪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否認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否認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刘少奇販卖这一套修正主义的破爛，居心极其險毒。

他鼓吹阶級斗爭熄灭論，为的是取消无产阶級专政，"縮小""国家专政的机构"，以便向无产阶級实行資产阶級专政；同时又把旧社会遺毒和資产阶級的法權殘余，説成是社会主义制度自己"产生出来的"，"統統是領导上搞不好"，以此煽阴风，点邪火，妄图在取消无产阶級专政的情况下，策动資产阶級右派大肆向党进攻，一举而顛覆社会主义。事实証明，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在資产阶級向无产阶級作反革命复辟斗爭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一）叫嚷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級已經消灭”，“阶級斗争基本結束”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搞阶级斗爭，他们的想法无实现的条件，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有条件了。……这样，只等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在劳动部关于劳动工作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內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为了实现这个总路线、总任务，要做很多工作，就是说：要进行很大的工业建设工作；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工作；进行手工业集体化的工作；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排除资本主义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做好了这几大项工作，中国就是社会主义了，沒有资本主义了，消灭剝削阶级了。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消灭资产阶级，决定的一着，就是这个全面的公私合营，这是起决定作用的。

到了最后要宣布国有化的时候，所有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沒有好多斗爭，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不是把斗爭摆在宣布国有化的时候，说那个时候是个严重的斗爭，而是要把现在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斗爭，把公私合营看作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斗爭，淮海战役。

我们跟资产阶级斗爭，到底是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胜利呢？……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了，农业合作化了，手工业合作化了，胜负解决了。

《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解放以后，又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斗爭，现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以说，在我国，我们已在阶级斗爭中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爭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要进行破坏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

《同某国大使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

现在农村基本已合作化，私人工商业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地主沒有了，资本家也剩下一点尾巴了。

同　上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被消灭了，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被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总而言之，这些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这些矛盾在过去曾经是表现为敌我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是阶级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现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在的先进与落后，表现在人民内部，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这是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这个情形变了，所有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同 上

今天农民是新的农民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新的资本家，今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跟农民是新的了，是合作化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已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今天来讲农民阶级，这阶级两个字已值得考虑了，他已是集体化了的农民了。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

在以前，我们考验干部，鍛炼干部，用什么办法？当革命沒有胜利的时候，我们用革命斗争来鍛炼；革命胜利后，我们有社会主义改造，可以鍛炼，可以考验，以后革命斗争也沒有了，土地改革也沒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沒有了，在什么地方考验？在什么地方鍛炼？那就应该在劳动生产中间，特别在体力劳动中间以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中间，来鍛炼我们的干部。就是以前曾经参加过革命斗爭，参加过土地改革，也参加过社会主义改造，年纪还轻的，但是那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那些事情闲着用不着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沒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被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经验熟悉的事情闲起来沒有用了，而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做，就是要领导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资产阶级公私合营了，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反革命已解决的差不多了，他们闹不了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改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

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的思想，讲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地主阶级的思想是讲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阶级存在的时候。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阶级，有条件了，例如房子如何盖法，都可考虑，石景山工人既做工人又种地，那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一样，工农、城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都消灭了。

《在劳动部关于劳动工作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现在的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资产阶级？当然是包括资产阶级的，但是资产阶级已沒有什么生产资料，沒有工厂了，且多数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吃饭，当然还拿定息，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这个说法还可以用，因为现在还有定息，再过五、六年，定息也不给了，就不好再讲资产阶级。现在称也可称为“原来资产阶级”。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社会上有无产阶级的进步力量，还有旧社会的力量，而后种东西很快就会过去。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您来信说中国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眞理，事实经过就是这样。

随着我国面貌在今后进一步改变，他们的认识也会有进一步提高。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主要是进行了革命的社会改造，即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它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在过去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也同时进行建设，但人们的注意力，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精力，主要是放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而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建设问题上。另一方面也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还沒有积累足够的、必要的经验，因此，过去十年建设虽有很大成就，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沒有充分显示出来。至于谈到今后十年，情况就会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扫清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今后十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十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地在人民面前显示出来，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将逐步地在基本上改变过来。现在还多少保存旧观念的工商界人士，将要为今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改变，他们的认识会继续提高，他们的旧观念会进一步为新观念所代替。只要他们采取老实的承认事实的态度，就会如此。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如果他们主观上能够加以努力，认眞学习马列主义，那么他们的旧思想就可能早日地改变，就可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至在大风大浪中坚定地站稳自己的脚跟。我们希望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在新中国的第二个十年中，能够

做到这一点。

《给黄炎培的信》(一九五九年)

希望你们到那里搞好关系，学好一门技术。革命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都被打倒了，只剩下个资产阶级，对它是有办法的，可以教育改造。要你们去不要你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建设，是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这比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统治更艰巨。我们那时在苏联只学了八个月，因为那是学搞革命，但学技术八个月就不够。

《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的讲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十二年来，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处理敌我矛盾要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致使矛盾的对方被压倒消灭。如果我们处理内部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起来，激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面，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

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缓和，人民内部的事情应当妥协解决，处理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它原来就是同一性。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什么叫过渡时期？苏联就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这个过渡完成就是社会主义建成，内容就是工业化和集体化。这叫过渡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六〇年)

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种对立状态基本上改变了，管理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同群众之间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一般地开始建立起来了。

《"八大"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二) 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取消阶級斗争

当前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民群众中物质分配不平衡的矛盾关系。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分配是一种生产关系。分配得不公平合理，就要阻碍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所以，生产

关系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分配得公平，大家都高兴，生产热情就提高了，生产关系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分配得不公平就要闹，闹的大家都不安心，生产情绪就不高了，就会使生产力下降。要提高生产力，就要分配得公平合理。……分配得不公，我看还是要闹的。因此，分配问题的矛盾，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当中产生出来的。

《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是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在河南省委、部长、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

鉴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

《"八大"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按〕刘少奇在这里别有用心地歪曲毛主席关于"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的指示，妄图否認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历史，生产者的历史。

《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五月）

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的发展生产力，尽可能高速度的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是一切工作的任务。现在我们所作的一切工作，是如何尽快的发展生产力。

《在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的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过去几年中，党的领导力量主要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从现在起，已经可以而且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了。

《"八大"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三）抹煞无产阶級专政和資产阶級专政的区别，妄图取消无产阶級专政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组成了。这个国家机构有两条任务：一条是实现专政，另一条是组织社会生活。第一条任务愈来愈少了，不是愈来愈大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

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

《在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改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沒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我看是有这么一点，实际上有这么两院，不过宪法上沒有根据，沒有规定。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上谈到代表视察问题时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把天津打开以后，帝国主义的势力，就是有一些外国人也很小心，就是一些调皮的也不敢调皮了，国民党也沒有了，看不到了，找不到了，官僚资本的工厂，我们也沒收了，也沒有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家跑掉了，消灭了，沒有了。

《在青代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四）为右派进攻煽风点火，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

要读书，要整风，党校要把整风和学习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好。要力求两不误，既读了书，又整了风。整风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检查党和各方面群众的关系。这个方针就是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主观上沒有必要先强调斗爭。故意的人为的使斗爭激烈化，使斗爭紧张起来，似乎要来制造斗爭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象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懂得的，你们就要在这次整风学习中，运用辩证法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记录》（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人民闹事，准不准闹呢？你不准闹，他已经闹起来了，恐怕是不能不准闹。宪法上写得很清楚，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是合法的，反对闹，就违犯了宪法。宪法上沒有写可以罢工，但是也沒有写不准罢工，我们不提倡罢工，但罢工是不能禁止的。

《在河北省委干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

领导机关是不能不犯错误的。去年冒进了一下，因为沒有经验才犯了这个错误。这是人民闹事的一个因素。

《在河北省委干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

最近一个时期，人民内部有很多问题，天天闹事，农民有闹退社，工人有罢工的，学校有罢课的，有游行、示威、开会、請愿等等。各地都有。闹就闹，叫他闹够，群众闹事是宪法上写过的，准的，宪法保证了的，宪法上写了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沒有罢工、罢课的自由，但我们国家沒有任何法律禁止罢工。就是说罢工是允许的，不是不允许。罢工是合法的，不是非法的，沒有一个法律说罢工是非法的。一准闹，闹够，草草收兵将来还会闹，所以让他闹够，罢工、罢课、游行，让他多游，多罢几次，直到他们不愿意闹。……我们不提倡罢工，但是有了这种事情，工会、党员还应该参加，不应不参加，不参加就脱离群众。

《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

闹事的都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反革命鼓动群众起来闹事，他只能利用群众的经济问题来挑动起闹事，他不可能用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起群众来。

《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人民内部矛盾，更确切些说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上不了学也好，生活苦也好，统统是领导上搞的不好，……我们领导上也确实有那么多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如果沒有这些官僚主义，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完全可以调和的，缓和的，达到团结一致过日子，积极发展生产。

同 上

关于选举，外面攻击我们一条，说我们选举不民主，是形式主义。叫形式主义，也有那么一点，也不好不承认这一条，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受攻击，而且攻击起来不好防御。我看协商还是要协商的，是不是对这种形式可以接受他们的意见，他说不民主就民主一点吧，候选人多几个，使他有所选择。他说无选择余地，攻击我们，说我们选十个提十个，是不是可以多几个。你说一个也不能多，这样好不好讲？不好讲，就不能以理服人，你的道理也是不多的。这个问题已经到处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最近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我看一定说一个也不能多，理由也不多，协商还是要协商的。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讨论选举代表问题时讲话》（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

有人说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差，相差太远了，……工人生活是苦的，工作八小时，空气不好，劳动紧张，寿命也比农民短。

《在湖南的讲话》（一九五七年）

所有城里人下乡去都持这种态度，下乡也是这样讲，写信也是这样讲，沒有一个城里人讲我在城里艰苦，睡的是双层铺，吃饭也是餓肚子，排队买不到东西，城里人下乡都不大讲这些东西。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这个经济基础，反映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让大家讲话，要大家满意，才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为了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就一定要过问工资、住房、吃饭、坐车这些事。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的积极性高了，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来的。过去农民从来沒有过问这些问题，可是现在全国农民都在过问这个问题，过问你国家干部、工人为什么比我收入多，生活好？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有我们农民一份，为什么你们生活好，我生活不好？所有制最后是要表现到消费资料的占有上的，你分得多了，占得多了，这是不是侵犯全民所有制？这要大家好好想想，我看这个地方来点平均主义是有必要的。

《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按〕这里，刘少奇丧心病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破坏工农联盟。

党內不重视与党外人士合作，清一色观点是不正确的，要批判，右派批评我们不都是错的，如批评我们"宗派主义"，说我们沒有友情、温暖，不和人家谈话，错了也不讲，客客气气，这是有的，要克服。

反右派以后，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这是我们的失败。

《对参加统战部长会议一部分人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讨论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雄、錢端升、费孝通、錢伟长、宋云彬等的代表资格和工作职务的问题时，刘少奇说："在沒有结论之前，大家要相信他们，他们是知识分子，是教授，否则他们就不好办事了。"

《在第一届人大四次大会第三次主席团会议上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

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错误缺点，这点不能否认。错误中有右的，但是否只有右的沒有左的？有右的也有左的，一个时期有右，一个时期有左，但从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数量看来，左的错误多些、长些。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是左的错误更容易犯。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不搞全民所有制就是毕不了业，升不了学，沒有好房子住，沒有车子坐，都沒话说，反正因为你有錢，我沒有錢，可是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切问题就都来了。……正因为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谁也想多分一点，可是谁也不能多分，……稍微分得不好，就闹起来。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

最 高 指 示

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关于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八页

八、瘋狂反对三面红旗，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绩，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

編 者 按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連續不断地取得胜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空前解放的形势下，毛主席和党中央总結了国内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制定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在总路綫的指引下，实現了全面大躍进的局面，并且出现了农村人民公社。总路綫、大躍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

必然产物，是广大劳动人民偉大决心与智慧的表现，是我們偉大领袖毛主席对馬列主义的創造性发展，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法宝，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几年来中国人民高举三面紅旗，在各个战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一直沒有停止对三面紅旗的誹謗和誣蔑。他們做了各式各样的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權派，認为有机可乘，立即伙同邓小平"桴鼓相应"，配合国际国内阶級敌人的猖狂进攻，在党内党外大肆攻击三面紅旗，在全国范圍内大刮翻案风，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妄图取消三面紅旗，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航向，为复辟資本主义制造輿論准备，其用心何其毒也。

其实五八年大躍进时，有的人大刮五风，大搞高指标，給三面紅旗抹黑，給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損失。这个总根子是誰？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

然而，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却以"正确"自居，肆意夸大缺点，攻击三面紅旗，他誣蔑总路綫有"盲目性"，人民公社"办早了"，不是大躍进，而是要"大倒退"，"低指标比高指标好"，公然叫囂取消三面紅旗。充分地暴露了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臉。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反对三面紅旗、妄图篡党篡政、大刮翻案风、妄图取消社会主义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謀。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风发，高举总路綫、人民公社、大躍进三面紅旗，排除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一）歪曲三面紅旗，大刮"五风"

搞共产主义大家好。英美不算什么，要超过美国。我们人口等于四个美国，工农业发展起来也要等于几个美国。等十五年看看，那时大家生活都比较好了，将来每人少做一点工作，多学习点。共产主义搞好了，做四小时五小时的工作就够了。

《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

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很久了，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报上不讲二、三年赶英国，七、八年赶美国，是因为帝国主义一听十五年赶英国就害怕，等我们搞起来再讲有什么不好呢？

同　上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要超过三千万吨。

同　上

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农业社不能单搞一门，要多种多样地全面发展。……可以搞农业，多办一些地方性的

小厂子；搞农业抓住水利、肥料、工具改革、优良品种；产量要一跃再跃，不要认为它到了顶；还可以搞商品——社会主义商业，把信用社、供销社、农业社联起来；还可以搞教育，文盲帽子都要摘掉，儿童都要上学；还要搞体育……。总之，就是工、农、商、学、兵都要发展。……中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我们现在不要十五年赶英国，在很短的时间內就能赶上。我们一定要往共产主义前进！现在不要认为共产主义是很慢的呵！只要我们好好干，实现共产主义就很快了。

《在火车上的谈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

我们努力，不要花好久时间，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国家过了关，那时欧洲就沒有我们进步了。不是说西方进步东方落后吗？那时就是东方进步，西方落后了。

《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要有人做饭、带小孩、洗衣服、理发、做鞋……可以一家家干，也可以合起来干。家家做饭、带小孩，浪费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就可以节省很多人出来。出来干什么？参加生产，参加学习。有事劳动，沒事读书，学点文化不好吗？沒组织好的，要认眞组织起来。搞一批人围锅台转，也可以弄先进经验。做饭、切菜用机器，洗衣服、做鞋也可以用机器，大家做，大家学习。只有合作起来组织起来才办得到。

同　上

苦干三、五年就可以过关，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同　上

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在粮食这一点上实行各取所需。尽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吗？又不要錢。在这么一点上……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

…………

一切人要参加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不应该有闲人。这是各尽所能。什么叫“各尽所能”？各人都有一定劳动，你就尽嘛，就尽你所能嘛。……你看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各尽所能，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各尽所能，都要“尽”，你到底有多少能力，是不是搞尽，是不是搞干淨吗？

《在江苏省、南京市和驻宁部队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种得少，种得好，但是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

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賬，认眞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视察江苏城乡时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听说北京用不上十五年，可以缩短，只要七、八年。这有道理，因为北京条件好，知识分子多。全国那能都象北京一样，北京七、八年不能普及，那么要全国十五年普及就困难了。

《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五千个大企业，这些企业多半要设在农村。要逐渐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十五年后，可在全国范围內普及大学教育。

《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

同志们精神很好，你们每天做很多工作，不是八小时，是十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有的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五十六小时，计件工资取消了，不要加班费，都很好。大家这样做都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共产主义。超过英国，超过美国。今天看来，只要大家这样干，工人、农民这样干，车间主任、厂长这样干，大家都这样干，建成共产主义时间就会很快。今天看来，超过英国不要十五年，明年就可以了，(鼓掌)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热烈鼓掌)。这句话不要登报，登了报以后，帝国主义要害怕，让他睡睡觉，我们在这里干。共产主义会来得很快。

《在江南造船厂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政社合一，乡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社员代表大会，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委会……现在正这样作，明年可全部完成，县以下政权已开始消亡，因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搞经济、文化革命，……只有一小部分是对付地、富、反、坏、右的。

《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

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凡能劳动的，都能吃饱……，明年城市也可能作到这一点。明年全国平均每人口粮可有二千斤，这已经是共产主义因素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作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事实上就是到共产主义时代，也不可能无论什么每人都要有一份。都是相对的。主要是在主要生活资料方面作到“各取所需”就可以是共产主义。

同 上

现在多做一点，将来可以少做一些。将来可以做六小时、五小时、四小时。将来东西都够了。粮食够了，还有多；衣服够了，也有得多；钢也够了，也有得多；造船也造得多，也够了。(大家热烈、欢跃)将来要不了那么多东西，那时就可以减少工作时间。现在多做，将来就要不了那么多东西，那时就可以减少工作时间。现在多做，将来就可以少做，现在不多做，将来仍要多做。现在都是为了六亿人民的需要，一般需要到某个时候就会满足。一个人总吃那么多粮食，六亿人民总是吃那么多粮食，一个人不会吃二个人粮食。将来粮

食等多了，人民生活更富裕，标准提高，生活更好。一般需要先要满足，现在还不够满足。粮食不够，布也不够，一人只有十八尺，钢也不够，拖拉机也不够。不够怎么办呢？大家努一把力，多造些，过几年，就会满足，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超过美国。不但要超过一个美国，而且要超过四个美国。中国人口有四个美国，美国一年生产一亿吨钢；我们要生产四亿多吨钢，这样每人平均数就和美国一样。大家努力做，就会得更快些实现。

《在江南造船厂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谁打击你，（指犯五风错误，被撤职的总支书记×××。——编者）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给你，在北京吃、住我出錢。

只要你们认为对的，你们就写，写眞实情况，不要作假，反映眞实情况，可能受别人打击，打击也不要退却，你这个人活得还不够硬，别人一追问，你就不敢再写信了，以后有人说你们告状打击你们，你们就告诉他，我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北京，那他就不敢打击你了。

《同×××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上午）

〔按〕刘少奇是刮五风的总头头，怪不得他如此关心因刮五风而撤职的干部。

（二）攻击总路綫的提出有"盲目性"

看来现在提倡比、学、赶、帮的办法，比过去只抽象地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方法好，盲目性会少一点。如果提倡得过分，也可能产生盲目性。

《在薄一波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这几年在总路线的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不注意好省，或者注意的不够。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上面跃进。我们要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要单纯地追求数量。今后数量不一定要增加很多，要更多地注意品种、质量，注意配套，使我们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能够自力更生。这件事的重要性，英国人懂得，日本人也懂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许多同志执行总路线的时候，沒有注意使全国人民眞正自觉的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不是由人民群众切实地去力爭上游；而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去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又只注意多快，而不是同时注意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同　上

（三）誣蔑大跃进是"一轟而起"，造成"比例失調"

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轰而起。有些幷沒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

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有人说比例失调，这也沒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失调。

《在东北地区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

三年大跃进，有些地方就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打击了那么多人。基本制度有了，具体制度也有了，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他可以不顾那一套。

《在华东、东北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的现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五八年跃进，就是增加人，那时劳动力还有剩余，妇女还沒全部参加劳动。五八年和五九年是依靠增加人和延长时间实现跃进的。

《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但是劳动力沒有了，物资也不够了，又要跃进，又沒有人，那有什么办法？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靠技术，搞技术革命。这是社会劳动力已经全部利用又要跃进的产物。

同　上

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劳动力、物资不足而来的。……五八年大跃进，农村劳动力还有剩余，广大妇女还沒有参加劳动，大跃进劳动力用起来，甚至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依靠这些来实现的，这在当时是对的。庐山会议还要继续大跃进，但农村沒有劳动力了，物资也不够，依靠增加劳动力不行了，依靠增加劳动强度也不行了，还要劳逸结合，这唯一出路，只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这条办法。这就是六〇年为什么产生这个运动。

《在机械工业上海现场会议接见各省市代表团团长时的报告》（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

过去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沒有经过上级批准，沒有说废除，就不执行了。这恐怕要反也是自由主义吧！当然，这也与上边有关，如号召敢想敢干，大破大立等。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都废了，我们上面同志很长时间不了解这个情况，这是吃了亏的，国家吃了亏，党吃了亏，你们吃了亏，老百姓也吃了亏。这件事应当接受经验教训。今后决不能这样搞，规章制度不经請示批准，决不能随便废除。

《在伊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修建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失，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耽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过去瞎指挥，二十四小时不休息，损坏了机器，也得还赈，要全面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搞设备更新，继续简单再生产，而后有余力，再扩大再生产，不是首先扩大再生产，而后有可能搞设备更新。应该说，扩大再生产也是首先放在老企业，不是有重点地进行更新，而是全面的。

《在薄一波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过去群众运动搞得太猛，出了毛病。当然现在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今后还要努力。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土改时期对地主扫地出门，不是群众要求；大跃进时白日黑夜地干，起先有热情，后来就不干了。

《群众运动的规律》，《在河北省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大跃进的一些缺点，就是中央、省委领导干部沒有蹲点，只听汇报。

如果不参加斗爭，孤立地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过去我们光听汇报，大跃进有的数字假的，我们也信了。

同 上

大跃进为什么出那么多毛病？就是由于我们自己沒有直接蹲点，沒有摸，人家说亩产四万斤，到底有沒有？沒有去摸。大跃进时对那么多虚报浮夸，我们发现得慢了，所以改的慢了，错误拉得很长，造成损失，脱离了群众，群众不高兴嘛！

《在济南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

(四) 叫嚷"人民公社办早了"，有"瓦解的危机"

有意的整一下干部。要彻底算赈，要退赔清楚。退清了还要写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什么东西多少多少，刻一块石碑在这里。

这个賬要一戶一戶的结，这个賬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个大单子，用鏡框鑲起挂在公社里。不这样搞，老百姓不得底。不要搞得半途而废。不要赔几个錢马马虎虎了事，麻胡子，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賬，算得疼一下，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子子孙孙要传一（下？），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

《接见工作队负责人、县委书记、工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炭子冲大队和四个生产队干部、部分队员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现在有些地方的集体经济已经散了，已经包产到戶了，这还是一部分，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虽然还沒有散，但也准备散。这就是说集体经济有危机，有散的危机、瓦解的危机。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大二公"还要不要？我们说，这个口号用不着取消，还是留一下过若干年再看。……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人民公社有一点"一大二公"……也作了一些事情，但是作用不很大，"一大二公"还不大明显，还看不大清楚。

同 上

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实行评工记分，土地沒有报酬，对五保戶、困难戶有补助等等，从这方面说，初级社的优点我们有了，高级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能搞多少优点就搞多少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也搞不成。

同 上

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对我们自己说来也还是一种试验。

《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地、有步驟地、有秩序地、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幷且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样，就会比较好一些。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有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戶或包产到戶。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原因很多，有集体经济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五风、天灾、价格政策有毛病，国家征购过多，这是外部原因。干部作风不好，队长、组长多吃多占，特殊化，经济组织不好，评工记分不合理，责任制沒搞好等，这是內部原因。另外，国家对集体的支援也不够，虽然花了不少錢（二百多个亿），但用的不好，效果不大。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五）胡說三面紅旗使經济临近“崩潰”，造成“漆黑一团”

“对于困难我们还沒有认识清楚”，“目前財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工农业生产“还要继续下降”、“比例失调”、“貨币贬低”，“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相反的，不愿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有十分，只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就容易解决问题，对于困难不是认眞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不是眞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列宁主义应有的态度。”

“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

“从去年到今年这一年中，从中央来说，对严重形势估计不足……对目前的严重形势估计的够不够？沒有估计够，再估计一下！”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的讲话》

“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无虛假？”我们党“不懂装懂”，“就是沒实事求是”。大跃进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是“戴帽子，乱斗爭”，“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革命。”这是因为“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不要欠賬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

《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

你们省比较好，过去比较稳，破坏的也比较少。①

《对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汇报的插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工作会议时困难情况揭露还未透底，有些同志还不愿揭，我们对困难还未完全认识。

《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所有假象，都要揭露，揭露后会出现光明。有人说，揭露，怕说成漆黑一团，如果确是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

同 上

有些困难情况可能还认识不够，或可能沒有提出来，要继续揭发。现在看法还不那么一致，不要怕揭，要彻底，可能过一点，也沒有害处，如情况不那么好，更好。揭底，怕丧失

① 这是刘少奇在听汇报山西某地区“生产力破坏一般的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破坏比较严重的，原来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时的插话。

信心，有可能，但还不会躺倒不干。怕漆黑一团，总要讲点好情况，使工作不能前进，情况还不能明。

各部要说明这一点。现在多数人实际感到情况严重，不讲，怕吓人。

《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现在有的还没有认识清楚，有的不愿意揭，大家还没有完全认识，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三天又揭出很多问题，是否都认清了，我看没有。

讲清了，采取措施，可以讲的。

同　上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夸。……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同　上

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

同　上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同　上

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实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同　上

这样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那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同　上

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

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一定会比现在总结的更好。

同　上

银行、财政制度，搞文件条例，限期交卷，……三面红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不写，只写什么许办，什么不办，写好送中央。

《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当前的经济情况很复杂，问题又多，经济失调，大量物资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原因主要在上面，是计划安排和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你们要向厂内的同志讲，向他们承认错误。按照我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陈云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转的财政预算报告去讲。

《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说大好形势，目前国民经济沒有什么大好形势，还是很有困难，经济上总的来讲是困难的形势。

现在局面是打消耗战。如果这样继续消耗下去，会吃亏，会拖垮。

对困难是否估计够了？一般讲够了，但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对困难估计过了些头，沒关系，问题最怕对困难估计不够。

(总路线、大跃进是)懵懵懂懂往前闯。

《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讲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各方面都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困难相当大，要克服。你们去的地方都有困难。我们整个国家的困难，就是由各方面、各地方的困难凑起来的。要克服国家的困难，就要到各地方去克服，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项一项地去克服。地方情况不好转，整个国家的困难是不会好转的。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七千人大会(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编者)时，是讲一个指头两个指头，还是三七开，那时，碰到困难，讲一个指头不行。现在看还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那时，就讲过，缺点错误估计的多一些也可以，以后证明沒有那么多，很好么，再检讨“右倾机会主义”嘛！

七千人大会，缺点错误讲多了，讲迟了。我的报告中的四多，也讲多了。

《在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对困难的估计还不够，看来问题更为严重。对困难估计过头不好，对困难估计不足也不好。现在的问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往年夏收以后，粮食问题就解决了，今年夏收了，粮食问题还沒有解决，可见问题严重。

《看炭子冲报告后的讲话》(一九六二年)

(六) 叫嚷"非常时期"，实行生产大倒退

(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单干的社队已占三分之一左右。

低指标比高指标好。……以后不准说低指标就是右倾。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五月)

票子回笼多点。估计错了好，这叫愉快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吴波汇报财贸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二年)

现在不同于五二年，情况复杂得多。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采取非常办法，我们虽然不同。非常时期要有非常办法。

《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现在方向不是搞十年计划，老老实实克服困难，否则方向不对。现在调整很困难，不采取非常办法不行。我提现在是非常时期，非统一集中不可。……钦差大臣满天飞也不怕，只要把工作搞好了。

同 上

昨天陈(云)提现在是恢复时期，是否如此，估计一下，现在和四九年不一样，我看总不是平常时期，可否说这是类似非常时期。为了解决天灾人祸，要有紧急法令。现在我们的确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要搞点非常措施，同意搞财经小组，有时××抓，小平抓，我抓，硬是要搞独裁。

同 上

基建，除了某些必要的外，都停止，两三年踏步。

减少基建，騰出材料搞市場……，要把市場放在第一位。

同 上

总的说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目前说长远服从暂时，不然过不去。①

同 上

物资要留有余地，这样计划才能够兑现。过去指标高，缺口大，不好办，今后指标降

① 这是有人谈到生产要首先顾吃、穿、用时刘少奇的讲话。

低，就比较容易办些。

《对物资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物资管理上发生的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生产指标过高造成的，……今年的计划又高了……你们注意，明年的计划，能高也不要太高。

《在贾步彬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

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谦虚谨慎的，搞的还稳当，试点完成以后，也不要急于全面铺开，还是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的，以免犯大错误。

《在国家经委党组汇报时对物资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

(七)攻击廬山会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

庐山会议我们批判彭德怀的反党宗派活动，但是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继续反“左”，不应反右，结果反了右。本来庐山会议开了十几天是反“左”的，后来彭德怀搞了这么一封信，把大家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了，引到(导)中央犯了个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就改嘛！

《在济南军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

庐山会议后反右是不对的，搞得全国后遗症，中央要负责。

《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

庐山会议后，不适当地在农村、企业和学校的干部中，甚至在群众中也展开反右倾斗争，在许多地方、部门发生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现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都不敢讲话。不敢讲眞话，也不让讲眞话。这样就严重的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同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同　上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应该怎样进行？……大家耽心的是怕一棍子打下去，又弄出一大批分散主义者。这次一定不要这样搞，以后也不要搞。过去那样搞也是错误

的，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同　上

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

只要本人提出申诉，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

同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沒有组织反党集团，沒有要篡党。

同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最 高 指 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在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三九页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五——五一六页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一九六二年九月）

九、大搞資本主义复辟，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航道

編 者 按

一九六二年前后，两个阶級、两条道路的斗爭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赫魯曉夫現代

修正主义集团大肆反华，制造边界事件；印度反动派在西藏边界挑起武装冲突；蒋匪帮瘋狂叫嚣竄犯大陆；国内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紛紛出籠，从各个方面向我們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猖狂进攻。一时黑浪滚滚，烏云滿天。資产阶級向无产阶級发动了一个遍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中国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權派刘少奇。

在此期間，这个中国的赫魯晓夫認为时机已到，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进行全面的复辟資本主义的阴謀活动，妄图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江山改变颜色。他伙同邓小平等一小撮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權派，抛出了全面系統复辟資本主义的綱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

他打着"統战"的幌子，公开向資产阶級屈膝投降，跟資产阶級大搞合二而一。他力图全面恢复資本主义的經濟制度，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經濟中，他极力鼓吹"包产到戶"，大刮單干风；在国营企业中则大力培植私有經濟；在全民所有制的工矿企业中，则妄图推行壟断資本主义經濟体制，鼓吹利潤掛帅，大搞物質刺激，并力图用刘記合同工、臨时工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从利用剩余劳动力、利潤掛帅的目的出发，在工矿企业中全面推行这个制度，使工人大部分都变成合同工、臨时工，而只有一小部分是正式工人）来改变我們整个的工人阶級队伍，等等。刘少奇伙同邓小平利用他們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大力推行上述这些黑貨，为資本主义复辟鳴鑼开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掀起了一股逆流。正如我們偉大的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如果"**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以我們偉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同国内外一切敌人，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进行了最坚决的斗爭，經受了最严峻的考驗。一九六二年九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級斗爭！**中国人民在偉大統帅毛主席的指揮下，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开展阶級斗爭、生产斗爭和科学实驗三項偉大革命运动，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打着"統战"的幌子，向資产阶級屈膝投降

(1)工商界总的情况是好的，大多数人愿意改造。现在他们是在改造中，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有了改造。……对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改造，我们要有信心。

(2)既然，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就向他们靠拢一些，我们就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这样我们在政治上就更为主动。至于他们还犯错误、做坏事，应该整的还是要整。总之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待这个工作，把他们化掉。只要他们接受改造，靠拢党，我们总是要包下来，包到底，不会把他们丢掉不管。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

信任问题：

工商业者中有一些人在解放以前就同共产党合作，解放后合作的人更多了，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是同共产党合作的，在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过某些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总的来说合作了十年，同十年以前相比较工商界的人已是大有进步，相互信任也已建立了一些。黄炎培老说，十年工商业界对共产党经三个阶段，畏服——信服——悦服，你们开始是畏服，心中是不信任的，是否其中有少数人信任，慢慢地信任的人数多起来了，我们是否一开始就信任你们，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相信工商界大多数人可以合作，可以改造，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定出一系列的和平改造方针政策，但是共产党和群众中有些人是不那么信任的，现在对你们信任的人多起来了，建立相互信任是不容易的，一要时间，二要事实，经过十年有了许多事实，相互信任就进了一步。现在工商业者对党的信任增多了，悦服的人是否那么多，可以研究，悦服的人肯定有，但还不是那么多，所谓悦服，包括感情，包括世界观，世界观一改感情也就改变了，对国家的进步就会感到高兴。这是十年来的经过。

《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顾一头，一边倒的问题，现在可否劝工商界的朋友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不要先想个人利益靠不住靠得住，不要顾虑国家对个人利益会不会包下来，这方面我们包下来了。个人有困难我们一定可解决，六亿五千万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困难我们这样的国家是沒有问题的，是靠得住的。

…………

不要顾两头，要奔改造服务这一头，要一边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的利益就会来。有了这一头就有那一头，沒有这一头，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个人的利益也是顾不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利益的人是搞不到个人利益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会有个人利益。只顾一头反而会有两头。因而应当一心一意一边倒，顾一头，不要三心二意顾两头，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信任共产党，往这个方向奔，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一头我们照顾，如照顾不到你们提出来，这样坚持为人民工作，做了多少年总会有好处的，总会有前途的。

同　上

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同共产党合作，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不论是老病或者有其他的困难问题，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一点請各位放心，具体办法还要商议，总之是照顾到底，不要担心。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亿人民的国家，不会小气。首先你要对得起国家，跟党走，这是第一条。这样人民会对你们负责到底，不会亏待你们。

现在的问题是向前看的问题，学习问题，继续进步问题，这不是小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工，你们看一头，叫所有的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跟着党走，思想进步，改造世界观，为国家作事，这一头你们包了，对工商业者的照顾我们包了，那一头的工作做得不够可以互相提意见。我们来定一个口头协定。

同　上

只要工商业家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党合作，不论青年、老年、生病

的，一定包到底，负责到底，……請大家放心，照顾到底，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是一个国家，照顾一下，又不是我拿出錢来，又不是毛主席拿出錢来，是国库拿出来的，国家收入不少，国库有几百亿，几百元錢，几十元錢，国家不会小气的。

《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六二年定息取消后，是不是阶级就化过来了，这些人搞在工会里十红夹一黑，是否危险？定息取消后，会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总是要包下来，包下来对我们有利。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

高薪问题。高薪不变，调职不减薪，如果因为调职而降薪的要改过来，恢复原薪，补发。

同 上

高薪问题：

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界是否会照顾到底。一个是政治照顾，政治照顾要继续下去。一部分人的高薪在定息取消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过去讲过，还是继续下去。原来拿高薪的不减，恐怕也不好再加了。由于调动工作或下放而减薪的，恐怕是极少数人。不管调职或下放，薪水应当照旧，已经减了的要补发。总之，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减，调职不减薪，减的补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靠得住的，你们诸位如看到有因调职而减薪的，可以通知统战部转告有关部门补发，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退职退休问题，年老不能工作的可請病假，工资照发，仍在编制內，编制可多几个人。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

年老退职问题：

工商业者接受改造，为国家工作。同共产党合作到了一个时候，年老了需要退职、退休，现在还沒有规定的办法。一句话，国家是照顾到底，将来总要订个办法。目前临时怎么处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工作，就不一定去上班，請个假，薪水照发。暂时按这样办。

請假工资国务院曾经有过规定，就照那样办好了。将来要改再商量。

《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同样是凭考试成绩入学。……考不上的要给与适当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

他们的子女入学在定息取消后，助学金也可以包下来，使他们的子女与家庭不密切，不依靠家庭，这样对统一分配有好处，也可以调动积极因素。

总之，这三年要采取积极态度对待这个工作，三年后有一系列问题，统战部现在要有所考虑和研究。

同 上

不要三心二意，要一心一意同大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努力，打主意，搞工作，你们这样做也可能群众一时不了解，以为有什么企图，你也不要顾虑，要坚持下去，今天不相信，总有一天会相信的。这个问题同每个人都有关，要很好地搞一搞，就是世界观改变的开始。

《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我们的国家还要从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当然不会很快，但是看得远，想想也好，有的人越想越怕，其实沒有什么可怕的，解放以后，我们过社会主义生活十多年了，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将来到共产主义那就只有更好。但是，也不需要提得过急，例如参加体力劳动是好的，但是搞体力劳动多了，也不一定好，要自觉，不一定搞得很多。

同　上

我们党提倡所有党员和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参加生产劳动，因此不在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改变群众的观感。党员、干部参加劳动，扫扫地、鏟鏟土，群众的观感就改变了，相应的关系就改善了，生产就提高了，灵得很。工商业者和家属凡有可能的也要这样做。工作不在乎多少大小，只要力所能及就全部拿出来。不要选择工作，这也不作，那也不作。这一部分工作不作，就会引起做这一部分工作的人的反感。提倡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对你们会有好处。……

同　上

你们看会不会变天，又回到旧社会？变天也很难讲，那也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光英（王光美之兄，大资本家。——编者），你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看是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要这样的资本家，才提出你来。

同　上

有些人看得比较远一些，是有远见的人，他的主观世界走在前面，这种人是少数，客观世界沒有改变，他的主观世界就看到了，提出意见，提出方针，提出纲领，要照这样变。……工商界论文化水平比其他各界高，讲世界观有可能的；如果思想工作做得好，主观世界想得远一点，对改造是有好处的。

同　上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政治、思想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也有了新的进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国际，国内的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二）縱容資本主义自由泛濫，推行資本主义經营方式，破坏工农联盟

此外，还有私人雇請工人者，都以签订个人合同为好。其中有两类性质的雇請工人：……另一种是资本家雇請工人。我们现在还不禁止私人雇請工人进行生产，允许一些私人生产事业发展也有好处，这类工人也以签订个人合同为好。

《对马文瑞〈赴苏劳动考察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

□有□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二百万、几百万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如果要盖工厂，是否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

有人要开私人工厂，可以不可以呢？……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一个补充嘛。……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自由市場，你在这里有地下工厂，地下工厂开开赚錢太多的，国家也可以经营，国家经营与他爭一下，使他的自由市場缩小一些，……苏联有危险，苏联的计划是实行了，但把灵活性、多样性搞掉了，搞得很少，也很简单，呆板，……要利用自由市場，一方面可以辅助我们当前经济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搞多样性，灵活性。商人怎么办，私人怎么办，自由市場怎么办的，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跟上去照样办。让自由市場包括一点私商、资本主义的市場、资本主义的活动余地，让他们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就照样来填补空子，尽它钻，他钻了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样，结果我们就塡它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样，结果我们不只有计划性，而且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他们眞有錢嘛，组织房屋合作社，他们积些錢，每个月交多少，房子还是国家替他盖，他要几间房子，要多少平方米，盖什么格式的房子，盖起来之后，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他可以永久不交房租，他这一生就可以不交房租了。房子的所有权属他，他自己不住可以出租，可以出顶，可以出卖，他调动工作调到远地方去，可以把房子卖了，卖几百元錢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买几间房子，这是青年工人，还有薪水比较高的人，他自己有能力盖房子的，我看现在就让他们把房子盖起来，将来结婚，对他们将来的生活也是个照顾，等于存款到房子上面，并沒有蚀本而有好处，可以永远不交房租，使得他们将来结了婚以后生活水平不致于那么低得快。

同 上

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因而搞得很呆板，沒有多样性，灵活性。社会主义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性，沒有灵

活性，沒有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要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場，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不止商业有自由市場，还有工业的地下工厂，另外还要利用农业上的家庭副业、自留地，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要允许他们钻空子。当他们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也跟上去，搞他几十万样。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

……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能买到。

《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也很好，这批人积极得很，很会钻空子，他们可以补我们的缺陷，甚至有的开地下工厂也好，他们生产的东西，除了骗人的以外，都是有用的，他们钻空子发財，恰恰是发现我们计划上的缺点，把我们的空子补起来。他开一个，我们也开一个，这些人有商业技术，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向老店员学习，甚至向老批发商学习。

《在禁止商品“走后门”会议期间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自由市場还是要搞下去的，农村自由市場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一些暴发戶，有些小商贩会变成暴发戶，这无非是多了几个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也不可怕，无非再搞一次。如果国营企业变成资本主义，那就绝不允许。至于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但是在国营商业內部发生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如果有人要搞资本主义，請他出去搞。

同 上

投机的人可发照，替他运，收费高点，否则他走后门。

《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更接近自由市場。走单帮的，让他远途贩运，可以征税，可以管。

同 上

消灭赤字办法，把方向变一下，尽量多增产一点。此外，还可以考虑进口原料，回笼貨币。凡是大困难的时候，总有投机者，外贸可大赚錢，并可多换农民物资。

同 上

汇报者说：对一贯小偷小摸的人，采取退脏和赔偿损失的办法；对投机倒把分子要实行重税、重罚的办法。对这两种人，总的是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实利。刘少奇说：对投机倒把，要抽所得税，让他干不成。美国垄断资本对漏税的要收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五的税。自由市場，是不是要加上所得税，不过要可靠，要弄清楚。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富裕戶，他们种自留地比较多，卖鸡蛋，卖菜等每年拿工人的工资三十亿元，对这些人也

抽他点所得税，看看有沒有办法。

《对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农民在粮食问题上卡住我们的辮子，我们也要卡住农民的辮子，如布匹、盐、煤油、火柴、农药、化肥、农具、电子等等，我们要卡住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和农民交换农产品。农民按人配售的方法要考虑取消。国家用来交换农产品的工业品，只卖给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人，农民不卖给你农产品，你就不卖给他盐吃。现在你们把主要商品按人分配了，只用次要商品是卡不住农民的。斯大林说："工农联盟是各自为本阶级利益打算的联盟。"你们考虑一下，你们抓住农民什么辮子沒有？打算盘用什么武器去打？

农民自由市場的价格很高，我们卖给农民工业品价格很便宜，今后除和农民进行交换的工业品以外，卖给农民的工业品也可以高价出售，这是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对农村自由市場进行领导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可回笼貨币，又可稳定农村市場价格。基本思想是和农民交换以高价对高价，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同农民交换，高对高、低对低，两不吃亏，毛病就在农村干部多占。

《在吴波汇报财贸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二年)

有人谈到在城市组织消费社搞来搞去时，刘少奇插话说："你们搞消费社，又要试点，可否让国营商店先搞。"大家说，国营搞，怕带头涨价，影响不好。有的主张国营商店挂两块牌子；有的主张拨出一些商店换牌子去搞。

《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对农村生产的三类物资，现在不要用票子去买，应该以工业品去交换，价格要低对低，高对高，等价交换。你们在石家庄或石家庄附近，设立个物资交换站或收购站，就能够换回大量的农副产品。

《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谈话》(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三) 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培植私有經济

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

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戶，单干。

《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讲话》

落后队的问题，一个是国家要得多，一个是干部不随心，多吃、多占，一个是捣蛋鬼。勉强搞下去，农民是担心的，群众沒信心，你今年搞不好，明年还搞不好，你不让单干，不行嘛，今年不单干，明年要单干，你不让他单干，他暗单干。

《对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刘少奇)同意重灾区可以包产到戶。

摘自《田家英一九六二年在湖南调查时的传达》

那些要搞单干的，一个时候让他去搞，他既然是单干，就会两极分化，参加集体的会逐漸多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不要性急。

《对吳波等人谈话》(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买房子也要由大队帮助，群众买房子不仅要买房子，还要在房子(边?)买一块地皮，这样才好盖个朵屋，经营屋前屋后的生产，不能让社员一出门都是别人的地皮。

《在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汇报会上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上午)

把远处的荒土包给戶，等于自留地一样，小片的另星的山土包到戶。

同　上

零碎的土地也可以包到戶，让社员讨个便宜，小块的零碎的土地包到戶，社员多了就好办，包给他就能种起来，要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留给他，你不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留给他，他就不种了，土地还是荒着。

《在炭子冲大队工作队汇报会上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晚上)

刘少奇：你们看荒土(地)包给戶行不行？包给戶，收的东西百分之八九十归戶，交一部分给生产队。

×××：行是行，就是人们还不大相信，怕不行。

刘少奇：等一些时候会行的，现在人们对政府还不那么相信。为什么还不大相信呢？就是所有制不能肯定。……以后就不会再乱拿了。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下午的一次谈话》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戶？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戶不行，还是集体生产。分食堂不是分田，田不能分，仍归大队所有，也不是包产到戶，这条要肯定，有些零星生产也可以包产到戶，如田塍，可以包产到戶。……田塍包产到戶，收稻草时常常把田塍上的豆子拖死，谁种豆子，那一段的草可以归他收。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戶？(群众：包产到戶要好些)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了。

田塍的产量也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少交一点，一百斤交十斤，多了，交五斤也可以，要交生产队一点，因为田塍是集体所有的。把它包死，包死好。①

《与工作队负责人，县委书记、工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炭子冲大队和四个生产队干部和部分社员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人工更新，可以采取由林場，工段、工组、家属包栽、包活，包抚育，包成林的办法，包一

① 在五月四日上午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汇报以及五月四日晚上炭子冲大队工作队汇报时，他也讲了类似的话。

块，给多少錢，过三、五年后，活一棵，一百棵，一千棵给多少錢。发动大家栽，给錢，或先给一半，过二、三年成活了再给一半，会更有把握些。

《在伊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你们要总结栽树经验，栽不活要想办法栽活，要有专业队伍，采取包栽包活包成的办法。工资也可按栽活多少树来计算，如栽活一百棵树，当年给一部分工资，第二年检查再按活多少给一部分，第三年检查后付清工资。

《在海拉尔市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国营农場取消农工的等级固定工资制。……凡是从事一般农业（包括畜牧业、园林、橡胶）劳动的，实行定额记工分，按工分付酬的办法。不能实行定额记工分的，可采取计时折工分的办法。

《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宣传讲话材料的批示》

国营农場对生产队实行"三定一奖"的办法。"三定"是：定产量、定上交利润、定工资总额，"一奖"是：超产奖励。……利润超过计划指标的，超额部分按照五、一、四的比例处理，即百分之五十上交农場，百分之十留在生产队作集体福利或扩大再生产使用，百分之四十按工人的出勤天数和劳动工分分给个人，分给个人部分也要有限额，一般不得超过本人平均工资三个月的水平。

同　上

农場职工，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可以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职工的自用地和自有畜，应当低于当地人民公社的数量，数量过多的应当减少一些。

同　上

国营农場应当积极鼓励职工利用农闲时间在指定的地点自建住房，并给予帮助和支持。

同　上

（四）提倡学习中外資本家的剝削經驗

关于干部问题：

吸收进出口商的职工人员，包括资本家在内。这是无产阶级接收资产阶级的遗产。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是好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骨干，有少数人还可接收入党，也有一些人是专家，这些人是宝贝。要作一个全面规划，加以教育、改造、审查、训练。除反革命分子不要外，均可使用。

你们要加强旧人员的工作，用我们的作风去影响他们。……对旧人员可用的地方估计不足，这方面有保守主义，也有宗派主义。

我们对私商的一些高级职员，可以吸收他们当参议和顾问。

《在外贸部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場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我们不会做生意，应该承认资本家比我们在行。我们应该比资本家做得更好。

《在吴波汇报财贸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二年）

鲜活商品如何经营？一面总结自己的经验，一面学外国的经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地方比我们进步。

同　上

你们要找师傅……资本家，开过洋行的，当过买办的，他们有经验，也要向他们学习。

《对物资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

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资供应，有几百年的经验，也无非是那么些公司。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好，难道我们办不好？我们要比他们搞得更好。

同　上

要向外国学，苏联、东欧国家是否还可以学一点，不能学，向资本主义国家学……学不到就买，资本家就是要錢。也要学朝鲜，朝鲜的维尼隆工厂就是自己搞的，……缺不锈钢，他们自己也炼出来了。到资本主义国家学，要会钻，舍得花錢……可以考虑向资本主义国家，向日本、英国、法国派一些留学生去学。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五）贩卖修正主义黑貨，取消党的領导，推行壟断資本主义經济体制

要组织托拉斯，综合性公司，联合经营。公司组织，有两种形式：一是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是一个公司，石家庄正在试验，有些工厂放在公社。还有一种，按行业组织联合公司，以一个行业为主。这些都是生产关系的改进。

《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问题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组织托拉斯，实行多种经营也是生产关系的改革。各搞各的是私有制的残余，今后的公司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人民公社，一个公社也就是一个大公司。如石家庄，他们把七千多人的铁路大厂就放给公社了，很好。……另一种，按行业的……以某个行业为主，如闵行几个厂，……组成一个公司。

《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要组织托拉斯、综合性公司，联合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改革。不能很好合作，老死不相往来是不行的。公司组织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公司，石家庄组织了三个人民公社，包括国营企业，铁路大学，这样好处很多。过去有的设备利用率很低，现在都可以利用了，福利设备也发挥了作用，完成计划也更好，我看将来都要走这个方向。发生问题是人民公社干部和大厂不协调，市委领导干部去就管得了；还有一种，按行业组织，以某行为主，几个厂合作起来搞，重庆九个厂联合组织起公司，这个也要，这些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要围绕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的改革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机械工业上海现场会议接见各省市代表团团长时的报告》(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內建立许多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样，就使得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的讲话》

商业，这几年要搞垂直领导，不要怕这个，列宁就搞过，搞得很好。

《在西楼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二年二月)

这个时期多搞些垂直领导，不要怕地方党委。银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财政、商业、物资也要集中，抓在手里，会快些，否则得罪人会更多。这样搞，会出些毛病，任何事情都会出毛病，至少要搞三、五年。

同　上

有人谈到财政、银行、商业正在搞制度时，刘少奇说："现在立即要完成组织任务，要搞垂直领导，制度要快些立起来，沒有新的，就恢复旧的，否则六亿多人民饭碗都交给你们，搞乱了怎么办？"

同　上

到一定时期，物资部门也象商业部门一样，搞加工定貨，企业生产听你们指挥，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就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对物资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

在解放前，上海的大洋行，要新加坡的东西，打个电话就送来。资产阶级能做到这样，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得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好。

《在国家经委党组汇报物资管理试点工作时对物资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

现在是行政机关管工业，而行政又不是经营企业的机构，可以考虑由企业性机构管企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管得好，他们內部是有计划的，这样工业就和商业配合起来了。

《在吴波汇报财贸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二年)

以后统计数字要由统计部门负责，不准地方党委干预，统计部门要实行自上而下的垂

直领导。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九六二年)

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银行、邮政局、托拉斯、新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资本主义在企业内有计划，企业外无计划，在垄断公司的有计划，在垄断公司外无计划。社会主义有此好处，是计划经济。公司可以全统起来，但有一些工厂和修理厂之类也留一点给地方。各部的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变成业务机构。

同 上

重要的工厂、交通都要统一管，用行政机关管，不如用企业管，要认识这个问题。资本家怎样管企业，资本家管工厂总算管得好的，垄断公司内部很有组织。我们的管理方式应该比他们进步，……不能比他们更坏一些，差些，成本更高，矛盾更多，比他们还落后一些。

同 上

你们有局、下面有厅，要全国统一，不受地方干扰。地方政府只搞监督，可以收附加税，搞市政建设，这个问题，已有资产阶级成功的经验。

同 上

我们的组织更接近企业，接近群众，不应当只用行政机构办。我们现在的办法是省、市的厅、局，中央各部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

同 上

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部，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经营农业机器的事业费也归公司管。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给他(它)。

同 上

都成立部，各省成立厅，都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恐怕不会适合。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管企业，资产阶级有几百年的经验。……组织企业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

同 上

成立汽车总公司比汽车局好。制造零件也可以包括进去，它专搞专业，钢铁也可以成立公司。开矿，除煤炭部专管外，其他各部也都开矿，各有各的管法。……统一管比较困难。有些矿可归企业管，如鞍钢。有些矿也可考虑成立采矿公司，试验一下。将来各种公

司成立后，物资局只管仲裁、调剂、儲备。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农机部不仅要管制造，还要管设计，研究适合中国农业机械，如果汽车和拖拉机成立一个部，谁管这些事情？是不是要有一个专门机构管农业机器的研究，订貨。现在农机部就是只搞制造，恐怕不行。农村中也不要又搞拖拉机站，又搞排灌站，只搞一个农业机器站，排灌、加工综合利用都包括在內，要更好的为农业服务，还要考虑搞托拉斯的方式，管制造也管经营。

同 上

企业內部的管理，如"七十条"之类，是否组织一个有色金属总公司，管矿、冶炼、加工，中央成立有色冶金部，下面势必组织有色金属厅，有些地方，工厂少，不能成立分公司，怎么办？或者由总公司派代表管，或者一个大厂管两个小厂，××只有两个化工厂，就不要成立化工厅。可采取母子公司，中心厂或派代表的办法。现在的办法，你们管企业通过省的厅、局，他们说你们管的多，你们说他们分散主义。

同 上

几条大河的航运，也组织统一大公司。现在长江航运就是沒有统一。沒有垄断，就沒有计划。

同 上

在部之下，组织总公司，这个方式值得考虑，各行各业全国只有一个总公司，沒有几个总公司，是垄断的，可能有缺点，沒有人互相竞爭，但也可以和外国比较，內部也可以互相比较，这样，省的工作也可以划出一部分，由公司承担起来。搞公司更接近企业，业务会钻得深，也可能出毛病，搞资本主义，南斯拉夫的经理，不是名誉很坏吗？问题在于作法，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

同上（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一机部不是很难管吗？你组织几个总公司，垄断这一行。比如电气，美国有通用电气公司，它还不是完全垄断，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垄断得更厉害。

同 上

上海可以搞分"托拉斯"。①

《在华东局、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资本家的银行、邮政局是很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可以拿过来为自己服务，一改变所有制，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

① 这是陈丕显讲到建立托拉斯后地方工业管理问题时的讲话。

中央党和政府，地方党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作当事人不好吗？有的厅局长、工业书记、商业书记，煤炭书记都滚到里面去了，不看全局。自己不滚进去，不是聪明的办法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否则也成了局部观点。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总还有一些地方工业，中央不管的公司，由地方管。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和工业会议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矿区政府以后就归矿管，一切为矿服务。如果不是这样，机构搞得很庞大，增加很多官僚机关，对发展生产很不利。

同　上

美国石油有几亿吨，在国外也有，也是几个垄断公司管。中国由石油部统一管。石油部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司，下面沒有石油厅，很好，如果有石油厅就不得了。煤炭部也是一个大公司。地方煤炭厅、局管地方煤矿，不能取消。煤炭部管几十个矿，也是个大公司。按公司来搞，同按部来搞，观念就不一样，铁道部也是这样。轻工业部行业多一些，就不行，纺织比较复杂一点，有棉、毛、麻，一个公司就不行。

同　上

统统组织公司，有的部要组织几个公司。部主要搞点平衡监督。……过去，部、厅、局，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这样搞的，证明不行。统统改成公司，无非几十个、百把个，有的部可组成几个公司。这样，部就轻松了，检查、监督、平衡，帮助公司搞好。……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酝酿酝酿，当作一个意见。能试更好了，大概必须试验。石油部就可以当作公司搞，不要搞石油厅了。外国托拉斯还管销售哩！将来石油部也可以搞点销售，商业部可以分一二个商店给他们，叫他们去与市場和消费者接触。

总而言之，我们要解决这问题。……现在一讨论就是“条条”，“块块”。如纸烟，中央一决定，还不是统一哪！这样，它就可以收购烟叶子。棉花也可以由纺织公司收购，主张按生产需要分级。机械可以包作、包修、包用。收购烟叶子，商业部门就不懂得这个技术，也是商业观点，缺乏生产观点。

同　上

（当讲到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搞“四代一调”和联号业务时）它就是皮包公司，就只要一部电话、一个皮包，代人服务。过去上海英国人就是这样搞的。有人要买一些零件，上海沒有，就打电话给新加坡，貨就来了。

《汇报物资管理改革问题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当讲到万人订貨会议要改革时）搞十几年了，就是开万人大会。这个大会，一年开一次不行，两次也不行，实际上天天开，不然就接不上头。什么万人大会，还不是交易所。

同　上

封建时代设专门的诛官——御史，就是专门讲"闲话"的官。每个企业都搞那么几个人，专讲"闲话"。不可能完全正确，经过检查，讲错了，可以不算，不可能都讲对。这些"诛官"也要联系群众，到车间找工人座谈、开会，吸收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专门找人讲"闲话"。

《在薄一波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企业是生产斗争的最前线，接近工人。干部不行，影响工人。公司可搞一些吃闲饭的人，如董事之类。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六）鼓吹利潤挂帅

在城市你们说沒有錢，那里有錢呢？每个工人投一个工的錢的义务工就可以盖一所电影院，电影院盖起来，可以卖票，可以赚錢，商店盖起来，可以出租给商业赚錢，开理发馆、澡堂也可以赚錢，盖了服务的，结果赔本，那怎么行呢？如果不募捐就纳税。盖商店、修马路、工人宿舍收税，厂房也可以收税，就是地方政府你在我这里住，我收地方税。你们就给工人讨论两条，一条工人募捐，一条不募捐也可以，但要收税，这样工人是全赞成的。到城市里看电影要花錢、理发要花錢，工人会算这个帐。

《在河南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

工厂过去太单打一，不知道搞副业，只知发电，出铁。搞点副业好不好？正业还是要的，不要正业不行。但是不搞别的不好，单打一不好。应该搞多种经营，发电厂又搞洋灰，也可以搞石油，硫酸铵，还可以制造发电设备。这样赚錢就多了，利润就多了。正业其实不赚什么錢，副业赚錢。

《在石景山发电厂与干部座谈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有些大企业经过认眞抓，工作改进了，产品提高，利润增加，说明潜力很大。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借款"。

我们的国家可以兴旺起来。有的地方，大有文章可做，关鍵是领导问题。领导干部即要有业务知识，（又要）懂得发动群众。一个大企业工作搞好，即可增加几千万元的财产，这是基础。几千个企业，都这样搞，国家就兴旺，前途就光明。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还有个经营管理问题。如果机关、学校、工厂经营管理好，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好，群众热情就会高，工作做好了，生产也提高了，就可以多赚錢。如果经营管理不好，办事人员精神不振，群众热情不高，就会赚錢少或亏本。我们的经验大概就是这些，沒有什么秘密。我们人民还吃的饱，穿的也可以，不那么好就是了，可是人民也满意了，剩下来的就是努力工作。

《与某国副首相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七）打着"亦工亦农"的幌子，大念資本家剝削經

总工会就是要把临时工转正。我历来就反对转正。他们说，临时工当了十几年了，不转正，沒有道理。我说不能转正，以后还要有临时工。采取这种办法，工业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农业事业费也可以大大减少。家属也可以不进城了，劳保也可以减少了。现在单一的劳动制度搞下去，固定工越搞越多，越多越被动。

《在江苏负责干部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

工业劳动可以广泛利用城乡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这种人横竖要吃饭。现在劳动力多，沒有事做。因此，除开现在的劳动制度以外，还应充分利用城乡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的劳动力，到工厂去做几个月工，农忙回到农村去。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工厂，如面粉厂、轧花厂、碾米厂、制烟厂等。现在我们把这些厂的工人都搞固定工了。可以搞季节工，或者搬到农村去，在城市也可以，做几月的工以后再回去。现在要把固定工变成临时工，把固定工大大减少，一样的工资总额，甚至还可以减少一些。

同 上

工会要把临时工转正，才能入会，什么"临时工做了十多年，还不转正，实在沒有道理"。我历来反对。用这种制度，国家也节省一些，成本也低一些。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招收很多工人。……因此，我想了这个问题，是按照老办法还是按新办法。老办法有很多不合理，今后，……老工人按老办法，新工人按新办法，增加二千万人，是县以上的工厂，县以下的小工厂不算，这些工厂就要实行新办法。今天要你就来，不要你可以回家生产。

新工厂新工人实行新办法，老工厂老工人是否也可以实行新办法？不要急，慢慢改，能快改的就快改，不能快改就慢改，实在不能改的就等一下。但是新招收的工人要实行新办法，一刀两断，进行到这里，以后就不再实行老办法了。

新办法在工业上大体有三种：

1.固定起来，这是少数人，大部分是老工人，技术复杂的工人和干部；2.长期合同工；3.短期合同工。三种都是正式工人，也是固定工人，什么都得作，作这样工作，也要作那样工作，沒事作闲起来不好，沒事扫扫地挑挑土也好，你们看有道理沒有？

合同工，有事就干，沒事辞退，是工人也是农业社员，家安在农业社。

学徒工算编制，按新的办法订合同，学徒合同，招收初中毕业生时就谈好到大学毕业，订十一年合同，学徒自己走不行，到那个工厂，就把大字报送到那个工厂去贴，工厂之间不准挖墙脚，那是无组织行为。

《在天津召开半工半读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两种劳动制度，很多工业部门思想不通，厂长思想不通；不通，就采取组织措施。思想不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消灭三大差别。

《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

大体上，工人、农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大提高一步，管理水平也大提高一步，官僚主义也要减少，对当前普及教育，发展生产都有作用。可是有些人说办这些学校妨碍生产。可能开始办的时候，一两百个学生不做工，还是学徒，那时会少生产一些。但从四年或四年半的时间整个算起来，工厂还是赚錢的。这个期间，你不给工资，只给饭吃，或者第三年加两块錢，第四年加两块錢，其余时间只给饭吃。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

在新工厂，对新工人办四小时做工、四小时读书的学校，上四年，不给工资，最好接着上大学，除管吃饭外，再给几个零花錢。工厂不发工资，你还划不来呀！这办法工厂高兴，学生也高兴，又能做工，又能读书，精神也很好。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

还有一种劳动制度，就是亦工亦农制度。现在我们农村里面有一些季节性的工厂和农村的一些什么站。……现在我们国家人口多，农村有剩余劳动力，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对国家有利。……办工厂除了就原料产地，销售地以外，还有个就劳动力的问题，哪里有劳动力，哪里劳动力最便宜，就到哪里去办。日本有很多小工厂在农村，而且可以造很多东西，甚至可以造拖拉机。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

城市也可以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生产。美国也是这样，他的煤矿就是在农闲时，雇用临时工打洞子。

还有临时工问题，我历来反对把临时工转正的。多少年这个问题就是讲不通。什么叫临时工，就是正式的一种劳动制度。……

可不可以这样，固定工少，国家负担也少。具体办法：农闲时农民进城做工，要经过生产大队批准，交一点公积金公益金，对集体经济有利，对国家有利，对个人也有利。这个问题，将来要订出制度。

《在工业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尽管的用临时工，利用农民的农闲季节，从城里也搞一些临时工，……农民多嘛，充分利用。国家的劳动制度应是两种，不是一种。……

还是两种教育制度……要正式建立两种学校制度……自己生产，自己吃饭，不吃国家的饭。……这样，又读书，又做工，国家不拿担负了，家庭也不拿担负了，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都有好处。……

将来会这样消灭三个差别，又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

《在天津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

劳动制度要改为适合这样学校制度的。使用这种学生，毕业后工厂可多赚錢。

《在听中央学制小组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

还有一种劳动制度，就是亦工亦农制度。……

农村这样办，城市这样办，好处很多。对国家有好处，对家属也有好处。家属可以不进城，可以学到技术，可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有好处。个人做点工有收入，交点公益金之类给集体。国家不要那么多固定工。过去临时工转正，我是历来反对的。……依我看，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长期不转正的，而且是在农村种地的临时工。过去就有，比如解放前，煤矿常常是这样的：农忙的时候他们回去了，农闲时到矿上来，拼命开坑道，把坑道开好，农忙时工人走了，留下一小部分人挖煤，煤炭还是出那么多。过去资本家也懂得的，他们就这样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在苏北打过游击，那时正是日本人占领着上海。苏北农民历来在上海当临时工，种地时回来种地，种完地把门一锁，带着家属、小孩和收的谷子，一家子一条船都到上海去了。大概刚解放时，上海每年大约有几十万临时工，现在减得沒有什么了。这样改，改得不好，改得使我们背上很大的包袱。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

苏联招进来可以辞退。我们招了不能辞退，免得影响社会秩序，这是对的，但只有包下来不能退，就会陷于被动。当然苏联和东欧国家和我国不同，他们劳动力少，特别是煤矿与建筑工人辞退后，容易找到工作。我国劳动力多，情况不同。应该说：劳动力多也好办，基本条件是好的。

《在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找煤炭部徐达本副部长谈过一次。向他提出：不要招收附近的农民作固定工人，只招收他们作临时工人，学习三个月，临时工的工资可以高一些，但不实行劳保条例。需要十个临时工，我们训练三十个。可以讲清楚，需要时請你们来，不需要时，你们回去，或者三十个人轮流作工，这实际不是临时工，是相对的固定临时工，是长期分班轮换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完全是附近的农民。有人提出，这样作合作社可能不同意。这可以和合作社讲清楚，订合同，这样对国家，对农业社，对企业，都有好处。这就是劳动后备力量。要使工农合一，不要使农民完全离开农村。矿山的劳动后备力量大约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就够了。这样不脱离农村的劳动后备力量，工厂要的时候到工厂作工，不需要时，可以回农村种地，这样很机动。煤矿可以这样作，其他工厂可以这样作。你们雅安县农代工的办法就很好。这样农忙时，工厂工人可以回去支援农业。山西叫长期合同工，不叫临时合同工。煤矿可以这样作，其他工厂、建筑也可以这样作。

同 上

劳动制度要改革，只有现在才能改革，条件问题、所有制、政治思想战线问题解决了，大家思想通了。如何改？把过去老的一套挡住，搞新的一套。……老企业、老人搞老办法。

说话活一些，老的是暂时的，还要整顿。……新企业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工无劳保，加付工资，也可交农业社保险。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劳动工资时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

搞农业要靠集体合作社去搞。每月拿五、六十元工资去种马铃薯，如按成本算，什么人也吃不起。这些只能搞集体的。

亦工亦农搞颠倒了，让林业工人拿工资去种地是会赔本的。还是让农民亦农亦林好，农民冬天沒事搞木头是划得来的。亦工亦农就划不来。

《与正在哈尔滨开会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有东北三省和內蒙参加）的领导小组同志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同志关于林业问题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亦工亦农是不行的，工人搞农业划不来，亦农亦工还可以划得来。

《在海拉尔市內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国家不要那么多固定工。过去临时工转正，我是历来都反对的。许多方面总是讲沒道理，说临时工做了十年，十几年了，还不让他转正，实在沒有道理。这是我听到的一定要转正的理由。依我看，就是这样一种长期不转正好，而且是农村种地的临时工。过去就有，比如在解放前，煤矿的是这样的：农忙时候他们回去了，农闲时候到矿上来，拼命开坑道，坑道开好，农忙人走了，留下一小部分人挖煤，煤炭还是出那么多，过去资本家也懂得的，他们就这样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概刚刚解放时，上海每年大约有几十万临时工，现在减得沒什么了，这个改，改得不好，却给我们背了很大的包袱。……以后大约固定工人不增加了，或者，增加很少的，要控制起来。但是，不能固定工也不减少，临时工又要办，那可不行。要减少固定工，增加临时工。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

我们有些工厂，原来（指解放前）就是季节性的工厂，烟厂、榨油厂、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历来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做就来，沒有工作做就回家。

我们开工厂厂址的选择，要就原料、就市場，还要就劳动力。……日本很多小工厂是在农村里面，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不只是乡村的工厂，城市里的工厂我看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城市里的纺纱厂，农忙时开一班，农闲时开三班。……从前那个唐山煤矿，我是知道的。唐山那么大一个煤矿嘛！历来到农忙的时候工人自动回家了，走啦。秋收完了，他又到矿山里面来了。工人增加很多。……农闲的时候，他就拼命开坑道，临时工走了，剩下一部分工人去挖煤炭。……

那么大的煤矿都可以，我们现在这么大的煤矿就不可以吗？所以都可以。大城市、大煤矿都可以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

《在广西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再有一种劳动制度，即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即亦工亦农。四川的办法是采用合同工，这是一种正规的制度嘛！在煤矿、钢铁中都可以实行。……今后有些纺织

厂，可以采用长期固定合同工，也可以农忙时开一班，多数人回家生产，农闲时开三班。机械制造厂，可以不可以这样办？也可以嘛！矿山更应该这样。总之一切企业都可以试办！

《在昆明召开的云南、贵州两省地委书记和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减少合同工是个方向，但要有长期打算，要有计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半工半读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以后所有的学徒，包括艺徒学校的学生都签订个人合同。这就是说使以后的工人包括新从农村来的工人，都实行个人合同。

《对马文瑞〈赴苏劳动考察团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

群众有很多困难，我们国家和工厂也有很多困难。群众进了我们的工厂就不想出去了，不需要他们时不能辞退，还得留下来。这件事我看可以订合同，合同期满就可以辞退，辞退后，可以再招收新工人，苏联就是这样的。

《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尽可能利用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扩大城市就业面。今后工厂开始时，除少数固定工人外，大多数为临时工，有的工厂应该用更多的临时工人。现在大家都搞机械化，摊子一摆，就是多少人，中国过去的传统都丢了。如糊火柴盒的，过去都是利用家庭劳动，但现在则要盖车间，招工人。应该少搞机械化，多搞临时工；不要摆摊子，要多利用农闲剩余劳动力；辅助工作，少收正式工人多利用家属做临时工，商业也是一样。这样至少可以少带家属。

摘自《李富春同志传达刘少奇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印发）

森林、建筑、矿山、地质等部门要以大部分的有合同的临时工为主，加上少数的国家工人，必要搞正式工时，需要经过一定机关的批准，才得从临时工中转正。

同　上

可以在工人中展开辩论，不要把机关、工厂多余的人员没有事放在那里，可以让这些人去作临时工人。……是否可以轮流去，除了特殊有技术的以外，大家都可以轮流的去，……实行以上办法。至少打破工人养老院，铁饭碗的观点。一定要告诉工人，多学几样手艺。现在青年工人只能作一样工作，是否能多学几样手艺、会作工又会种地。只要能耕地，我们一切都活动了。只会一门，将来国家和自己都为难。

《在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现在不要随便招收工人，可以到农村招收年青的、有文化、思想好的，调皮捣蛋的不要，可以象挑女婿那样找工人。在六亿人口中，挑选几百万人是可以作到的。除了老工人、技术工人可以固定，其余限制在几个主要地区招收工人。在招收工人时，合同上要写清楚，学好手艺，有工作就作，没有工作暂时回家，或担任其他工作，有工作时，优先

录用他们。

《在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陶鲁笳提出在产棉区的乡鎮办小纱厂，我同意他的办法，纱厂女工到四十岁不能作细纱工人，工厂可以在附近周围吸收临时工，事先签订合同，不实行劳保条例，不脱离农村劳动，年纪大了，可以让她们回去。允许她们的女儿来代替她们作工，不给退休费。也可以采取每年放两个月的假，放农忙假，不给工资的办法。

同　上

合同工，有工作你就来，沒工作你就回家，保险(劳动保险。——编者)一条，因公负伤，给他医好，残废了发抚邺金，生病、生小孩有农村保险，临时工沒保险，可以比长期工高一点，加百分之五吧！平时把錢拿到手，有了病，生孩子就不向工厂和国家要啦！这样也比较合理。

《在天津半工半读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七月)

总之，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有的说作临时工作了几年，十几年，什么时间转正？我就不同意转正这个说法，临时工可以作几十年，作一辈子。问题是待遇问题，搞平均就是了。同样的工种，临时工可以比正式工待遇稍高一些，这样他就愿意干了。

《在天津谈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八)反对突出政治，鼓吹技术第一、专家第一，大搞物質刺激

你们的领导，什么叫进步，什么叫英明，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工时得到充分利用，成本降低，材料节省，质量更好，造林成活率更高，政治上大家心情舒畅，这就叫作先进，就叫做领导水平高。

《在伊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还有一个任务是搞好农业技术改造，从工具改革到机械化。农业技术改造完成了，机械化、电气化了，集体经济才能最后巩固，要散也散不了。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只要能学好，花点錢并不算什么。今后搞什么都要专门知识，专门技术。……每人要学好一两门技术就行，并不要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送你们去的话，五年可省四千二百万卢布，大约二百多万美金。……这几个錢不能不花，花了也只等于一个大工厂的零头。如果有五千个从苏联回来的学生送到工厂里去，就会使工作少犯错误，提高生产，本錢就捞回来了。无论干什么事都得打打算盘才行。

《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的讲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是有錢，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

基本可解决)，就是沒有工程师。

《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的讲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不管你(指刘允若)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如果别的工作不能干，可以干自己的专业。而如果沒有一个专业知识，则可能无论什么工作都难于干好。你现在学完(只要五年)你的专业，不独不会妨害你将来干别的工作，相反只会有帮助。

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干别的什么吗？不会的，只会有帮助，不会有妨害。

《给刘允若的信》

应当按劳取酬，不能因为他的政治条件好，就加他的工资，业务不行也加工资。

《在郑州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

工人学习优良的，可以调提出来，个别培养。

《在北京宣武区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

当部长历来都是政治家，法国当部长的是政治家，专家是司局长、副部长，部长常常换，但下面专家不换，英国也是，工党当财政部长的是专家，他也是政治挂帅。也有专家当部长的那也是政治挂帅，但是少数。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工人做多面手的问题提出来了沒有？工人高兴不高兴？前几年是前途问题，成了多面手就好了。

《在石景山发电厂与干部座谈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继续努力，在技术上力爭第一。

《刘少奇主席来我省视察》(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河北日报》)

为了培养专家，可以不让他们入党，不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苏联培养李森科就是这样做的。

《同安子文的一次谈话》(一九六〇年)

每个林业局应当有机械工程师和林业工程师，要建立工程师负责制，林业局副局长至少应当有一个林业大学毕业生，林場应当有个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的任副場长。工段很重要，实际权力操在工段长手里，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工段长也应当分批训练一下，使他们懂得林业技术，或者调林业大学或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生做副段长。他们负责技术，建立技术责任制。

《在海拉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仓库管理要有內行，要有一定数量的识貨工程师、技术员和理貨员，旧中国时代各

码头仓库都有这样的人员。

《对物资工作指示》(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过去，我在武汉工作时，理貨员罢工，有怡和、太古、日清洋行的。我很耽心，但他们一点也不怕，要求条件很高，结果胜利了。因为他们有专长，帐是他们记的，东西是他们放的，资本家不敢解雇他们，怕把仓库搞乱了，要罚他的款。

同 上

今年要分配一批大学毕业生给你们。不然，物资到你们那里，就搞得乱七八糟，那就成问题了！

同 上

还有一个任务是搞好农业技术改造，……你们首先下去做组织工作，着手搞起来，搞些改良农具。但不要随便搞，要讲究质量，县、地的工厂不要搞，要省的工厂，有经验的工程师搞。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我们这些人都是革命的，讲革命，我们是熟悉的，工业我们不熟悉，技术我们更不熟悉。有些搞技术的干部，在我们看来，可能有大毛病，在懂技术的人看来，可能是小毛病。……所以你们既然要管这些人，就要找一些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工作。

技术干部将来很多，全国要有几百万人，高级的要有几十万，……组织部要有新的成分，也要换班子，不然你们又是一帮子。将来你们死了，高级知识分子来了，不会搞组织工作，就会出乱子。

每年有多少万大学毕业生都是需要的，厂矿企业的技术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大学毕业一个，就顶走一个。说顶也只是顶那些不懂技术的科长、科员，就是非生产人员。现在的厂长并不是工程师出身，相反地应该有一些工程师出身的人去当厂长。

《与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正副部长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有些技术人员要提级，要把他们放在一定的负责的岗位上，技术上要他们审查、签字、负责任。……要提拔一批工程师，放手使用。……这几年財政上有困难，沒有提，以后要提，有些制度要改变，大学毕业两三年可当工程师。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要发挥地方、部门、企业的积极性，要有点小自由，要有奖励制度，不一定奖产品，奖錢也可以。

《对物资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

我想，这矛盾主要重大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工人农民分配不多就要闹事。人民为了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就一定要过问工资、住房、吃饭、坐车这些事，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积极性了，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来的。人民內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

题上面。如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就是说分配关系适合生产力，……你分多了，我分少了，大家不愿意干，生产力就受到阻碍，在分配问题上就表现出来。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青年人多劳动些，少得些。青年人将来老了，也得养老金。国家要积累，将来还是你们享受。我们老了，享受不到。现在把錢花光了，将来如何办？按劳付酬不能那么绝对，劳动多少应得报酬多少，很难算清。按劳付酬一直到现在，工资有高有低，不能划分得分毫不差。

《在劳动部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对国家有功人员应有奖励制度是很必要的。如科学的发明和创造，现在还沒有奖励制度，听说科学院正在拟稿，其他如文化部门、教育部门都应注意这件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为爭取革命战爭的胜利而斗爭着，国家不能沒有一点奖励，尽管过去有一些临时奖励办法，但是不全面的，所以规定了勋章奖章授予条例是很必要的。……

当黑帮头子彭眞说到在苏联凡是代表都有补助后，刘说：“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了，而省市沒有，那下面会有意见的。但是现在还是从人大代表开始，請大家考虑一下。每人每月津贴五十万元（旧币。——编者），大家都有，要他们反映意见。”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落后企业赶上先进企业者有奖，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者也有奖。

《对全国总工会生产部“关于今后开展厂际竞赛的意见”的批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厂的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錢，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公社可以这样作，那么按这办法办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

《在视察河南人民公社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小组办卫星厂有什么所有制？”“有奖励沒有？奖励多少？”“物质刺激还是要一点啰！为什么小组爱护设备、工具，节省费用呢？主要是核算了成本。”“你们小组管理有了发展，比两参一改三结合进了一步，有政治思想，有权力，有核算，而且还有奖励。”

《在参观成都量具刃具厂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

现在砍大树和砍小树都按立方米算錢，砍一棵大树就是四、五十立方米，而且容易砍，省工，砍小树四、五十棵还沒有一棵大树大，因此从林业局到工人都不愿意采伐小树。砍树不愿搞小的，集材、运输也都不愿搞小的。我看了许多树是适合做矿柱用的。但砍的很少，矿柱满足不了需要，因为他不愿砍，砍了又丢在山里不集，不运。什么原因？砍小树划不来，费力不讨好，砍大树容易，顶任务多，划得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林业采伐，满足需要都是很不利的。我看了有成批的林子可以做矿柱，但就不采，不运，就是因为价格低。应该把大木头的收购价格降下来，因为它容易砍，省工嘛！不是讲按劳付酬嘛！小木头的收购价格应该提上来，因为它费工嘛！越小越费工，价格越高些，当然太大的木头价格也

应该提高，太大了砍伐也费工，而且不容易往外拉，不然拉不动就丢在山里了。

《对正在哈尔滨开会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参加）的领导小组同志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同志关于林业问题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大家都不愿意砍“大屁股”木头，因为它费工，又出材少，是否可考虑在工资定额上砍“大屁股”树多给錢，使大家愿意砍。

《在海拉尔市內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在工资方面，大小木头的采集、运、装的工资应当分别计算，搞小木头的定额低一些，搞大木头的定额高一些。以刺激大家既愿意生产大木头，也愿意生产小木头，有利于生产，符合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山上小木头很多，就是不愿砍，即使砍了的也不愿意拉下来，主要原因是工资制度和价格政策问题。因此是不是把工资和价格调整一下，使工人对小木头采的愿意采，集的愿意集，装的愿意装，运的愿意运。

同 上

汇报人说：提高社员的技术水平，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技术水平，是保证农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翼城县和侯马市杨谈大队的调查，回乡转业和休学的青年，……这些人生产技术相当差，……不好好学技术，这些人做活质量很差，群众意见很大。刘少奇说：很多青年对农业不熟悉，农业这一套本领学会很不容易，犁地、搖耧播种一年才有一次嘛，十年学会农业这一套本领就算不错。现在有些人不会还不学，你沒有奖励制度，他为什么要学？有技术的工分要高。

《对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汇报的插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汇报人说：生产责任制主要是对农活质量负责，我们的责任制是连质量，不是连产量，保证了质量，就保证了产量。……

杨谈大队提出，保证农活质量就是最大的增产节约。刘少奇说：是最大的增产节约，沒有质量就沒有产量，沒有产量，工分就不值錢，工分不值錢，大家越不干。

同 上

“辅助这个名字不好，工人们赞成不赞成？有沒有讨论过？”“我知道许多工人对这个名字不高兴的，搞修理的就叫修理车间，叫修理工人，工人们会高兴。为他们提高身价嘛！”

新华社记者：《在未来的重工业城市》，(见上海汽轮机厂)《汽轮机工人》第三三八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搞那一行的人，对那一行的东西，可以允许他多买一点，比如说，卖热水瓶的人可以允许他多买一个热水瓶，卖粮食的人，每月可以多买斤把粮食；卖水果和卖糖的，也可以多买一点，但只限于这个行业的人自己用，你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制度。

唐山汽车司机给商业部门送煤，经常要点东西，可否给他们开点前门。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十月)

领导人对一切浪费现象感到痛心，……对节约的给以奖励，造成风气，长期坚持下去，这才是搞社会主义建设。

各部管工业，就要抓这个问题，无非是提高质量，增加数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

《在薄一波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前次我出国访问，要作衣服，找了北京的一个老裁缝。据说北京现在作旗袍手艺好的老裁缝只有两个人，会做扣花的只有一个人，还退休了。这里有工资问题，做这些活，费工多，工资少，青年人不愿学，技术可能失传。你们要注意找这些有手艺的老工人谈话，派青年人去学。这就象唱戏的马连良一样，他就是有技术，要传下来。……现在我们还沒有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机器产品，但是有自己特色的手工艺品。这些东西不注意，会搞掉。我们给自己的国家当家，不能把这些东西搞掉。资本家很注意这方面，反而到社会主义沒有人负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些方面，一个行业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们当了家，如何能不注意这些人呢？应想法子让他们传授。要派人跟他们学，他们自己可以少动手，工资可多一点，照马连良的样子给他工资。

《听工业情况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现在手工业工人生产不积极，铁匠的工资不比农民高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以至一倍，就沒有人学徒。铁匠、木匠、泥水匠都是重活，轻活的也要高出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四十。……

手工业工人，怎样才能满意，铁匠每月二十八元的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要赶快提高。你不让他提高还是农民自己吃亏。一个泥水匠说，他过去一天搭一个灶，现在三天搭一个灶。……

手工业工人的问题还要很好地抓紧解决，很需要他们，他们不积极就要出问题，他们不积极主要是待遇问题，原料问题，劳动定额和计件工资制问题。

不要随便说计件工资制是落后的。一个泥水匠过去一天搭一个灶，现在三天搭一个灶，这叫落后还是叫先进？我看是落后了几倍。成本低，产量多，质量高，节省原材料，品种多，这才是进步的。质量降低了就是很大的浪费。

《在整社工作队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

（九）在文化出版广播事业中鼓吹資产阶級自由化，为資本主义复辟制造輿論准备

如果审查起来是很繁重的问题，牵涉到宪法上规定的言论、出版的自由。事前审查当然保险一些，但先要审查批准，宪法里沒有这个规定，国家也沒有这个法令……，出版以后，也沒有规定图书杂志都要审查。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图书杂志审查处理暂行条例〉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

你们说，新华社发的消息，各报采用得很少，各报的消息很贫乏，那末，你们可以创办一种独特的报纸，创办一种每日新闻报。

…………

你们办的这家报纸可以公开宣传和《人民日报》竞赛，看看能不能胜过《人民日报》；办得不好，也可以取消。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

你们这家报纸最初可以少印一些，愈少愈珍贵。第一个月免费赠阅，纸张由中央赔。以后一律收费（至少收回纸錢），一张也不赠阅。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你们要认眞地讨论一下：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

同　上

今后不要强调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比如说，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虽然已经写入宪法，但并不常常强调，只有在必要时才写一句。

同　上

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眞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眞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場，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

同　上

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

同　上

你们要在尖锐的斗爭中鍛炼出几十个成名的记者，他们不造谣，讲眞话，不仅对帝国主义讲眞话，而且对共产党的错误也讲眞话。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广播跟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需要，要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情况下，人民会关心一定的问题。譬如说，北京最近有很多人很高兴时装的问题，你们就应该抓住这些问题。……特别是地方的广播电台，有关粮食、鱼、肉的问题，都可以广播。到广播公司去的人太多，太拥挤了，你们也可以告诉听众，让他们慢点去。

我平时听广播不多，几次病了都听，老是政治大题目，听了沒有什么味道。

《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过去北京有一些电台播广告，现在取消了。是不是怕搞广

告？报纸也要登广告。我看有些城市电台可以播广告。

《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资产阶级通讯社新闻能搞得有兴趣，难道我们就不能搞得更有兴趣吗？我们应该比他们更有本领。资产阶级所能达到的水准，难道我们达不到吗？你们是先进的无产阶级记者，应该能够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准。如果资产阶级能达到的水准，我们不能达到，我们无产阶级就不能算是最先进的阶级。关于兴趣，要引起注意。新闻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只强调政治性——立場，还应该强调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在新闻前面把记者名字写上去，让记者有名有利。

同　上

记者是单独劳动的，要让他能同群众发生联系。应该要记者在稿件上署名。记者各有个性，各有风格，有些人就喜欢某一记者的报道，只要是他的报道就愿意看，在稿件上署名，这是给与记者名誉，也是给以压力。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最 高 指 示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〇——一四九一页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十、在国际斗争中販賣修正主义黑貨

編 者 按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死敌。它伙同現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瘋狂鎮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时把矛头指向我国。在这种尖銳复杂的斗爭中，中国人民要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就必須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不断革命，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偉大导师、偉大領袖、偉大統帅、偉大舵手毛主席領导下，执行了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取得了偉大成就。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与苏联修正主义一唱一和。他吹捧苏修二十大，“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張”，“具有世界意义”，妄图改变我国的外交政策。他在一次接見南斯拉夫新聞代表团时，竟然狂妄地公开宣称：“在外交方面”，“我們（和南斯拉夫）是一致的”。

刘少奇与赫魯曉夫一样，也説：“美国統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腦比較清醒的人逐漸認識到战爭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

刘少奇美化帝国主义，就必然仇視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他誣蔑西歐、北美的工人和农民，説他們“拥护帝国主义”，“贊成殖民地”，説“他們不革命，有什么办法”。还叫嚣什么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左派和右派“一切人友好”。

非常明显，刘少奇的这些言論，同現代修正主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一九六〇年去苏联的时候，竟无耻地三呼“赫魯曉夫万岁”。这充分表明，苏联的赫魯曉夫与中国的赫魯曉夫是“一丘之貉”。

（一）吹捧現代修正主义，販卖赫魯曉夫的“三和”、“三无”

总的说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

同 上

我们现在搞了一些国防工业，到底有沒有用处，值得怀疑。我们搞了许多飞机、大炮，花了很多錢，费了很大的力气，将来沒有用处，那么，我们就犯了错误嘛。将来有用处的，我们却沒有搞，要用的时候，却沒有，所以不如早打主意。我们现在沒有的东西，原子能、导弹这些东西，搞十多年还是搞得起来的。仗，也许十几年还打不起来，到了打仗的时候，我们恰恰又有了。现在不搞将来要用就沒有，或者搞起来了，将来沒有用处，很可能犯这个错误哩！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世界各国人民都是反对战爭、要求和平的，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到处受到欢迎。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和平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广大的运动，人类持久和平已经有了实现的希望。

《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再过十五年，……那时苏联年产钢一亿二千万吨，我国年产钢四千万吨，天上的人造卫星更多了。如十五年內不打仗，那时中国的情形、思想变化如何？青年资本家的思想如何？会有很大不同了。那时再要打仗就很困难了。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沒有危机的事实，淸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前途。

《“八大”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全世界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要求实现苏联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禁止使用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

同　上

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和平，一切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都应本着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贯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和平的要求，正在一天天深入各国人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开幕词》（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们主张和平解决国际爭端，而不诉诸武力。我们一贯支持苏联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以及其他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倡议和行动。

《在欢迎某国总统的国宴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目前，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伟大任务。

《在白俄罗斯党中央部长会议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我们赞成裁军，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消灭核军备，常备军也不需要这么多，我们本来就不要发展核武器，其他武器最好也不要搞。

《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编者)我们希望世界其他国家不要妨碍我们，如能在互利的条件下援助我们，那就更好。我们就是这个目标，我们别无其他目标。至于外国是否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干涉人家內政。

同　上

行政国防经费把经济文化建设的费用都挤掉了。我们开始时有五、六百万军队，现在减少二、三百万。行政机构实行精简，一部分人到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开办国营农場，工厂吸收他们参加劳动。行政机构人员减少了，军队也减少了。国家机关就是这样，三、五年不減，人就自然的增加了。所以要二、三年减一批。现在我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入主要搞经济建设，另一部分搞文化建设，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恐怕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不减少国防行政费用，就不能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你们国家人口少，军队不能不要一些，按人口比例，你们军队数目的比例要比我们国家大。

《与某国副首相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你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困难，国家要发展势必要遇到困难。头一条就是沒有錢。中国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办法就是减少行政国防经费，增加经济、文化建设经费。我们在革命胜利时，军队就有五、六百万，国防费用大，行政费用高，把国民党的人员包下来，很多人吃饭，每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给军队、行政人员吃掉了。经过三四年调整，达到国防行政经费占百分之十九，现在由于美帝扩大战爭，我们要备战，增加了一定的国防经费，所以国防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不到一点，百分之八十几的收入都用于经济文化建设方面。

同　上

有的书因为时代不同而出现了错误，我看到我的儿子在看一本书中，有一篇是批评南斯拉夫的，在今天如果让它继续流行，就有碍中、南两国的关系。象这种书是否查禁，也是个问题。

《在第一届人大常委第二十一次会议讲话》(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

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很多，差别和不同的地方很少。我们的党都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利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消灭地主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都是一致的。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都在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斗爭，我们也是一致的。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各有各的特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也各有各的特点，各自不同。这些不同，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在实质上即阶级实质和社会经济的性质上却是共同的。只要我们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一致，大家就能团结起来。

《与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比南斯拉夫还迟一些，很多事还未办好，现在正在办，有一些进步，但缺点很多。整个讲，在经济、文化上是很落后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克服这种落后状况，还须几十年。我们比南斯拉夫落后，我们在文化和经济上是落后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任务，要向你们学习。

《与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

我们同苏联搞好团结，学习苏联经验，是肯定不够的。学习社会主义的经验，只有苏联一家。

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搞不好关系，有理无理三扁担，这是政治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漠视这个问题。

《在高级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七月)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帝国主义说苏联好，那就要警惕了。很多人去过苏联，写文章说苏联正在自由化，欣赏苏联物质刺激。说中国才是马列主义，说我们是革命的马列主义；苏联是保守马列主义。这就需要注意，他们在挑拨我们和苏联的团结。

《和王光美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作为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的苏联，四十三年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苏联已经是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头等强国。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苏联已经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的七年计划。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方面，在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为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

《在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六日)

你们的工厂供应了很好的设备给中国，帮助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我们的技术干部也在你们的工厂进行过实习，学习了技术，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万岁！

同 上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万岁！

《在明斯克车站上的致词》(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及其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万岁！

《在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苏联政府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国家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爭，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这对世界人民是有益处的。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爭取普遍彻底裁军，为爭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提出的各项倡议，获得了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员会和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四日)

你们的城市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你们为我国生产了许多成套设备，提供了大批的设计资料，派遣了优秀专家，并且还为我们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和建设人才。这是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援助的一部分。請允许我在这里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你们这种国际主义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①]

同 上

在象基洛夫工厂这样的工厂、矿山、农村和部队里，树立了优秀的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你们工厂培养出的大批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工作，把这种优秀的作风传播到各地，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部队的工作作好了，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希望你们不断发扬列宁式的基洛夫工厂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工作作风。

《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伟大的苏联一直是良师益友……

现在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在胜利地执行着宏伟的七年计划，开展着全面的共产主义建设，以新的成就吸引着全世界各国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在参观访问中，到处看到苏联人民劳动热潮的高涨，看到爭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广泛展开，看到共产主义劳动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一切情形使我们深信，七年计划一定能够提前完成，苏联一定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在工农业生产的总产量方面占据世界的首位，并且进而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水平方面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苏联以一个接着一个的创举震动了全世界，显示了苏联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中国人民衷心祝贺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你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我们为此而充满着自豪的

---

① 一九六〇年七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撕毁协议，撤退专家。

感觉。

《在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苏联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履行着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和合作的义务，积极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一贯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所实行的这些政策。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了新的有益的努力，来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和战争的政策，揭露丑恶的殖民主义制度，苏联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禁止核武器等建议，获得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中国人民要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因为他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坚决地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严正的驳斥了美国对于中国所作的无耻的诬蔑和诽谤。

同　上

我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明斯克，参观了工厂和农庄，观看了优美的艺术表演，同苏联各界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你们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联各族人民亲密团结、欣欣向荣的情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经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预祝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更加光辉的胜利。

《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在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保证。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越是团结，世界人民就越高兴，越是受到鼓舞，越是能够增强对自已力量的信心。

《在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世界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命运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同我们相反，修正主义者相信帝国主义当前的统治是稳定的，他们有一个说法，叫作"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按〕 我們和現代修正主义者在世界問題上的分歧主要是：資本主义世界的人民要不要进行革命的問題，社会主义陣营的人民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問題。

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斗争目标和亲密的同盟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正象存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是世界上最良好的国家关系。无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中，或者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我们两国始终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互相支援，互助合作，并肩前进。……在这个临别的时刻，我愿意以

整个代表团的名义，再一次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感谢你们对我们这样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它们所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普遍裁军、停止核试验和缔结对德和约等和平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中国有句俗话：朋友不怕多，敌人不怕少。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同志和兄弟，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是要同你们团结的，要同苏联团结的，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你们也是一样，要同苏联团结，要同我们团结，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苏联也需要同我们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沒有苏联不行，沒有中国我想也不好吧！有些意见不一致可以內部商量，讨论解决，不要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现在有很多党通过了决议譴责中国共产党，如法共、美共、英共和其他党都这样作了。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公布对我们的这些譴责，要不要告诉我们的党员，要不要答复。……我们答复了捷共和意共的批评。

《与某国驻华大使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印之间的冲突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

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上，帝国主义不插手是不可能的。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插手将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插手已是现成的事实。……我们抵抗印度的进攻，直接意义是打印度，间接意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印度的后面是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所有亚非人民都赞成的。印度后面有帝国主义，中国后面有沒有帝国主义呢？沒有。即使苏联也不赞成我们与印度发生武装冲突，我们自己也不赞成中印冲突。

《与某国经济代表团团长及夫人并代表团全体团员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苏联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赫鲁晓夫同中国闹翻，同美帝国主义表示好感，美国就不见得给他们什么好处。他们在有关基本利益的问题上取得妥协是不可能的。

《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主席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尚且是不可调和的，难道帝国主义就那样喜欢修正主义。美苏在一些不关系到当前利益的问题上，例如不上月球去，可以作些妥协；在关系到当前利益问题上，基本问题上，取得妥协是不可能的。在次要问题上，可能取得一些妥协。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美国现在主要的敌人，主要的对手还是苏联，他们第一个怕的还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估计苏联新领导，比以前有三十度的转变。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月)

第三国际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修正主义时，有一个缺点，即沒有与他们搞联合行动，而是过早与其断绝了关系，这样就沒有能通过"联合行动"的宣言或声明，在实践中来揭穿其言行不一，来争取教育修正主义各党的下层群众。

《与某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由来已久，不是偶然的。在斯大林时期，党的领导就不正常，"哥别乌"实际上就代替了党，成为最高形式。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已经不执行，现在赫更是违背集体领导。过去苏联內部搞追踪人们不敢讲话，现在赫搞得更厉害。……修正主义是赫的，斯大林也有右的东西，但是零零碎碎的。如果沒有斯大林那一套残余，赫一万个也搞不起来。

《在华东、东北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吹捧美帝国主义

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

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

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

《"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听说美国工厂里厂长、工程师和工人很难分别，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在苏联我看到就更难分别。所以，我们工厂里也应该如此。

《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要发展农业，使粮食过关，只能靠大农业，不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或者反过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这是个历史经验。全世界农业过关的只有美国，它是大农业。苏联也是大农业，但农业还沒有过关。

《对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美国每人平均产两千斤粮食，百分之八十五是喂牲口的，每人口粮是一百余斤粮，一百多斤肉，三百多斤牛奶。

《关于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向刘少奇的汇报和刘少奇的插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不打帝国主义国家，只搞冷战，所以这个矛盾不突出。

《与某国一代表团谈话》(一九六三年四月)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风尙，它受压迫，要奋斗，大概是明治维新以后养成的，有那末一股干劲，发奋图强的风气。德国过去也是受欺侮，以后才有那股干劲，铁血宰相俾士麦提倡的。当然，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全民族的。

《听工业情况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们这些国家要取得巩固的独立还不很容易，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独立还不这么巩固。

美国是有强大力量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与某国友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三) 在反美统一战綫中推行右傾投降主义路綫

在战争期间，帝国主义统治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力量，有了极大的削弱。当时，帝国主义者为了取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于他们的帮助，曾经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后选择自己愿意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所以，在战后时期，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强烈发展，完全不是偶然的。

《亚洲各被压迫国家工人运动的任务》(在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的会议上的讲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据说印度的监牢很舒服，也不杀人，所以那些国家的人就不想革命。尼赫鲁坐牢时，生活水平就很高。现在印度共产党人坐牢的生活也很好。监牢里那么舒服，他们就不会革命了。

《与从巴西胜利归来九位同志谈话》(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国人一二百年前也骄傲，看不起欧洲人，结果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打了一百多年败仗，就认为中国人不行，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说西方人行，中国的不好。后来我们向西方人学习了，一学就有了进步。

《与某国篮球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现在西欧、北美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他们不革，你有什么办法？而且他们拥护帝国主义，他们赞成殖民地……剝削殖民地，工人可以得到一点好处……。

《某次和外宾的谈话》

驻外记者要搞好关系很不容易。例如，驻印度记者，要报道对印度有利的消息，也要报道一些对印度政府看起来不一定有利的消息；要交朋友，取得新闻来源。通讯社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很好地掌握它。驻外记者既要斗争，又能站得住脚；不要因为斗争得不

好，被驻在国政府赶回来。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亚非学生会议有个特点，就是会议不是中国发起的，也不是国际学联和世青发起的，而主要是印尼发起的。这里就有一条经验，凡是要团结中派、右派，使群众来，就要让中间派发起领导。如果左派发起，人家就不来。我们的领导不在形式上而在实质上。许多国际活动如果由我们发起就不能包括中派、右派工会，如世青发起就不能包括各国的中派、右派青年组织，如国际民主妇联发起，就不能包括中派和右派的妇女组织。因此，如果要团结中派、右派，我们就要想办法推动中间国家、中间团体出面号召。政府的运动也是这样，要所谓第三势力，如尼赫鲁、吴努、苏加诺起来号召才能召开亚非会议，我们发起就不可能。……如果我们坐在第一排，人家就怕了，我们就要失败，实际上这是一种分裂世界群众运动的做法，这是有害的。……总而言之，世界工联、世青、国际学联、国际妇联要退后一步，不要太积极，要消极一些。退后一步是否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进行革命是要积极的。现在要消极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只是改变活动方式，实际上是更积极。

《与苏联青年代表团谈话》（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中国有句俗话："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我们愿意和所有的人做朋友。

《与某国首任驻华大使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印度不结盟是表面的，实际上已经结盟。保持不结盟的幌子，实际实行结盟政策，这样对他有利。印度有人说尼赫鲁要放弃不结盟政策，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赞成，劝他不要放弃，保持不结盟政策，对英美也有利。……他保持不结盟的外表，可从两方面得到援助，在世界上可以欺骗人。一丢掉这东西，这个作用就没有了。……××××是同西班牙结盟的，因此，它在亚非国家中受孤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家不了解它。要尼赫鲁把自己放在××××那样的地位上，他是不干的。他要保持印度现在的地位，印度现在的地位比××××有利得多。如果要我作印度的总理，我也要这样。如果要你作，你怎么办？象××××那样，还是象印度那样？

所以印度是不会放弃不结盟的，尼赫鲁也不会倒台。

《与某国元首谈话》（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四）攻击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人不能不犯错误，但不能在普遍性问题上犯错误。斯大林骄傲自满，这就是在一个普遍性问题上犯了错误，所以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错误。……

《与北大历史系同学谈话纪要》（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

《修养》原版：（一九三九年）

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好的学生

《修养》新版：（一九六二年）

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按〕砍掉了恩格斯和斯大林。配合了帝、修的大反斯大林。

《修养》原版：（一九三九年）

但是有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本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来做为我们的模范，作为我们修养的准绳。

《修养》新版：（一九六二年）

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鍛炼和修养的模范。

《修养》原版：（一九三九年）

而我们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生，就是这种思想意识最高的、模范的具体代表者。这一些是现今人类社会中的正气，共产党就是表示人类正气的。

《修养》新版：（一九六二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就是这种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最集中的、模范的具体代表者。这些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共产党就是代表人类正气的。

〔按〕用"創始人"一詞砍掉了斯大林。

最 高 指 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读》（甲种本）第四七二页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转引自《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人民日报》社论（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国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原。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查，吸取经验回去试办。

《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

十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編 者 按

毛主席所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一条无比偉大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針。按照这个方針貫彻执行，我們将造就和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对于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防止資本主义在我国的复辟，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刘少奇对于这一偉大方針却千方百計地加以抵制、割裂和歪曲，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抽掉社会主义的实質，代之以资产阶級的黑貨。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必須实行教育革命，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針和方法，彻底改变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現象。而刘少奇所鼓吹的两种教育制度，实質上就是資产阶級教育的“双軌制”。所謂优秀的上全日制，次等的上半工半讀，

要把全日制学校保持“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这就充分暴露了其抵制教育革命的反动实質。半工半讀的教育方針是毛主席早就提倡的，而刘少奇則貪天之功，大吹半工半讀是他的发明，是完全“符合馬克思的話和列宁的話”的，妄图以此来貶低毛主席对于馬克思主义教育理論的偉大貢献。事实上，他混淆了社会主义半工半讀与資本主义半工半讀的本質区别，抽掉了社会主义半工半讀的政治思想内容，揚言要把半工半讀搞得“蠻舒服”，以此来引誘广大青年追名逐利，为資产阶級培养得心应手的接班人。因此，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必須彻底批判。

（一）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宣揚資产阶級的反动教育思想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教育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问题还沒有解决，你们教育部是否研究一下。

《对蔣南翔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底）

全日制学校的改革也要抓这个问題，毛主席在去年春节就提出来了，还沒解决。請高教部、教育部准备。如何改革，再开一次会。看不准，千万不要瞎指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同　上

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九五八年视察河南时讲话》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别的阶级不搞，只有我们才搞。要搞好，如果不细心，也会出毛病，犯错误，要看到这种可能性。

《在团中央举办的輔导员联欢会上的谈话》（一九五九年）

最近关于半工半读学校，在报纸上大登起来，宣传得嫌早了一些，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一登报，大家都办，大批地办起来，势必大批地垮台，因为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对全国妇联党组同志的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

谈起教育问题我们比你们问题大得多。……我们一直到现在有百分之三十的学龄儿

童不能上学，也即在一亿二千万学龄儿童中有三千六百万不能上学，有九千万小学毕业生，百分之五十不能上初中，百分之七十的初中毕业生不能上高中，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不能上大学。人民对此不满，有人还骂我们，我们在农村中搞扫盲运动，有的农民说："你们一方面消灭文盲，一方面又制造文盲。"上不了学的学生们说"你们要我们读书，现在我们要读书又上不了学，政府为什么不多办些学校让我们读书"。我们说："你们都要读书，国家负担不起，沒那么多錢。"……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很大，我们还沒有解决。

《与某国副首相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学生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完成，教员的任务是把自己的教学计划完成。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十月)

到那里后，要按纪律办事，好好学习，祝你们都以五分毕业回来，让步一点，是四分，三分就不大好了，两分的话，自己就捆被包回来，回来还可能做点事，吃点饭。

《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的讲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在学校内决定一切的问题是教员。

《对教育部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

大学提高的条件：一要有高中毕业生，一要有教员。

《和徐水大学干部们的谈话》

普及教育当前还不是那么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问题。

《对教育部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

学校(党校——编者)要用正规办法，要考试，将来毕业要准备这一着。

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窗外可以问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教学年限，我主张不好规定"为几年，要规定总学时，学完就行，年限可长可短，三年可以五年也可以"。"大学、中等技术学校，到底学多少年就够了，要按学时算，该几年就几年。总之，质量不要降低，降低人家就说话了。不要死规定几年，必须学完课程。

《关于农业教育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开开会，发现干部，总结经验，这就是体现省的领导。发现优秀教师、校长人材是领导的主要任务。

《对教育部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

有同志说，工人现要求学习文化和技术，不愿学政治，这很好，因为目前主要是学习文

化，学技术，将来是学政治。

《在天津干部会上所解答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先学业务后学理论，先实践后理论，干他几年再讲理论。

《和徐水大学干部们的谈话》

有人提出疑问，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沒有教育救国，就沒有工业救国。

《对教育部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

过去的大学是按照西欧英、法、美……等的经验来办的，这些大学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上是有很大成绩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十月）

因此，我们在改造旧式大学。但这不是一天能做好的，是应该比较有步驟的慢慢的改造。

同　上

全中国都有一些新式大学，但那是不算正规的大学，是带有训练班性质，是为了破坏旧思想、旧组织，所以不要学习很久。而我们则要培养具有技术修养的干部，因此我们现在创办这样的大学。

同　上

学校中必须强调教学，行政工作为教学服务，校长负责制，改为校长责任制，要肯定向这方面做。

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治知识，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基础。

《对教育部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

（二）推行資产阶級教育的“双軌制”，反对教育革命

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二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表现在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工厂劳动制度。

…………

学校分两类，第一类学校和第二类学校，第一类学校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学校是半工半读、业余教育。主要是半工半读。第一类学校是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阶级成分好，文化质量要求高，这只能吸收部分人，因此势必要有第二类学校，即半工半读。半工半读有经济目的，个人国家都有经济目的，因为第一类学校吸收不了这么多学生，家庭也供不起，自己又考不取，因此就要不靠家庭，不靠国家靠自己作工读书，优秀的考上第一类，次一些

的就进入第二类。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

我想，我们的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书；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辅而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

《关于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全日制学校也是需要的，还得好好办。大概要搞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

《对教育部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

大学也可以搞半工半读，比如一个大学有两千学生，可以搞五百个半工半读的学生。招生时就公开说，有一千五百人是全天念书的，有五百人是半天念书半天做工的。

《在"八大"二次会议四川小组的一段插话》(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

大学文科坚决搞半工半读，实在不通的，算了，也不要强迫，以前的学生不通，就让他们念全日制毕业，……现在这一批让他们念算了，……不愿意废除的，就可以不改，一部分不愿意改的，就改一部分，……大学的教员就算了，不通的也可以保留下来，这是量的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职业学校，也可以办了，但是沒有明确的目标。办职业学校，我看你们把标准提高一点，一律招初中生，高小生不要，高小生叫他去当学徒工或下乡。职业学校，也搞半工半读，学三、四年，毕业以后能当工人，能当技术员。半工半读这样出来的人当工人沒有反感，但我们分配时可叫他们做科室工作，其中党员也可以搞党团工作，搞经济管理工作。

《同河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办半工半读学校是有深远意义的。对这样一件事，要大声疾呼，对反对的人要斗争，扣大帽子，甚至采取组织处理。你们看值不值得这样？我看值得。

《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

教师采取志愿兵的办法，自愿教半工半读的就干，不愿干就拉倒，让他去教全日制……这是个远大的理想。小学自愿，中学自愿，将来大学也自愿，不愿意就拉倒，省得他去那里搞破坏。

《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期间与何伟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为了实现两种教育制度，特别是在农村数量大，城市不能办很多，因为要吃商品粮。

半耕半读在农村以一个大队办或几个大队联合办为好；如公社办，有的不能走读，势必要划给他一块地方，作为一个集体单位，作为一个农場。还是先在大队办好。县的农业试验場也要搞半工半读。因此，是不是要成立两个教育厅，……另设一个教育厅（市里另搞一个教育局）专门管理这件事比较好。

《同河北省委負责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至于办上述师范学校这件事，我看现在教育局不高兴办，教育厅也不那么高兴办，工业也不那么高兴办，我主张不要他们办，另外设立机构管这个事，管这种学校，管这种工厂。你不高兴，你不要当厂长，换一个厂长，让上海业余工业大学毕业的学生去当厂长。管理农場的人不愿办，就让江西劳动大学的人来当場长，当党委书记。对这些人，要有专门的机构来领导他们，一方面对他们作了安排，一方面又可以使要解决的问题有地方解决。你们武汉市是不是搞一个专门机构来搞？要现在的教育局、工业局、劳动局搞，他们搞不好。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

我在天津说过要成立第二教育厅，专管半工半读学校。如果教育部门和工业部门不愿管半工半读，就另外成立教育部和工业部来管这项工作。将来新设的管半工半读的教育部将是长命的。

《在何伟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半工半读搞得慢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到处讲这个问题，但是回到北京仍旧沒有什么动静，主要是因为有习惯势力。实行这个新制度，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斗爭会是很激烈的。对于反对半工半读的人怎么办？要给他们戴这个帽子，这顶帽子就是"反对消灭三个差别"。

《关于抓紧为半工半读学校培养师资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

有的说半天劳动半天读书不行，我就不相信。因为我就搞过一年，那时候考不上大学，住不起，缴不起学费，就走邓小平同志的路，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先到留法预备班学一年上午读书，有法文和机械学，下午劳动，有的做木模，有的造型，有的翻沙，劳动沒有工资。现在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就是那个时候办学的人，毕业之前，不给工资，我们劳动他赚錢。我们也可以这样办。

《在昆明对云贵两省省、地书记和厅局长以上干部的报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件送团中央一阅。中国是否可个别试办？請你们研究。

《关于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的批示》（一九五七年）

附录：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

（本刊讯）十月五日蒋帮《中央日报》刊载译自美国《大众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谈美国大学生半工半读的情况，兹转载如下：

美国大学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半工半读，整年除了孜孜于学业以外，还要忙于衣

食和筹划应交的学费。加里福尼亚大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在做"兼职"的工作。就是所谓富家子弟学校，象耶鲁和哈佛大学，也差不多有一半学生自食其力，靠做事自己维持生活。

大学生能做什么工作呢？范围甚为广泛，有的驾驶出租汽车，有的在餐厅里当侍者，有的给人擦洗汽车，有的油漆房屋，有的管理花园草地，有的揩玻璃，贩卖书报，也有在工厂里站门岗；总之以劳力取报酬，做各种工作都是大学生自力更生的好办法。斯丹福大学有十多个学生是救火员，除了食宿赖以解决外，每个月并可得二十元零用。

具有特殊技能的大学生，可以打字，修理汽车或是在舞厅里演奏音乐，则收入就比较可观。加里福尼亚大学有个已婚的学生，膝下有三个孩子，虽然毫无经济上的依靠，但他立志要做个医生，于是不辞辛苦的学木工，手艺日有进展，几个月后每小时可赚二元五角工资，有此一技在身，赖以完成大学学业。

一般说来，大学生做事，以每星期工作十五小时为较佳的安排，这样可使他不致影响学业，并得有时间参加校内的活动。依照这个时间表，纵使一小时赚一元，一学年亦可收入五百五十元之谱。是的，普通工读的学生，每学年所赚平均是四百五十元。

美国有几所大学，对于学生半工半读，更是设想周到，譬如俄亥俄州的安陀大学，开了风气之先，学生们以一半时间留在校园内读书，另一半时间则到各地去工作，每二个学生分享到一份全日的工作，轮流换班，甲在校上课，乙去工作，当乙上课时，则甲去工作，每人一星期可拿到五十元，解决求学费用已属相当充裕。

《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中文版)

附录：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刘少奇的批示和"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一稿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市、自治区委：

现将刘少奇同志的批示和"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一稿印发给你们，并請你们转送一份给党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处。关于在学校中推行勤工俭学的问题，根据中央指示，在团的三大报告和决议中已经提出，不知各地的经验如何。现在各校正在热烈讨论勤俭办学的问题，望你们請示党省、市、自治区委，可否和有关方面一起，选择个别单位(如某校的一系或数班)，来重点试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制度，并续将这方面的意见和过去本地区学校中有勤工俭学的或类似勤工俭学的经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报来。

共青团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两种劳动制度同两种学校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制度在旧社会就有……我也读过这样一年的学校，上午四小时上课，下午四小时工作，晚上两小时自习，蛮好。……搞了一年，这样也蛮好嘛！[①]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我就搞过一年半工半读。我原来不是到苏联去的，是准备到武汉勤工俭学的，进了个留法预备班，……那个预备班是上午上四小时课，学一门法文，再学一门机械学，……我

①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也作过类似的讲话。

都学了，学了一年嘛！这一年蛮好。1958年我到天津，在那里讲了一次，他们那个时候热情很高，呼隆呼隆就办起来了。

《一九六四年在广西的一次讲话》

（三）閹割半工半讀教育的革命內容，培养資产阶級接班人

要使青年工人、青年农民能在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上大学；此外，也有些人可以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现在的小青年，小学毕业都想进中学，初中毕业后都希望进高中，这种希望是正确的，应该满足。国家要想办法满足他们的希望。但只有一种教育制度、一种学校制度满足不了他们的希望。国家负担不起，家庭负担不起，农民负担不起，工人阶级负担不起，干部负担不起。有四、五个子女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就负担不起。因此照现在的办法，普及教育就沒有希望。

《在江苏负责干部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

将来人多了，一个大队有一半农民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那个大队、那个公社就可以办大学，还是半农半读，半年种地，半年读书，充分满足他们升学的要求，读到大学毕业。我国人口有这么多，劳动力也够了。他们升学，国家不要负担，家庭不要负担，他们自己负担自己，为什么这样的升学要求不能满足呢？这些人，旣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他们可以当小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党委书记、市长、县长等等。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

办这种机工学校，半工半读的学校，四年或四年半毕业，国家不亏本。他创造的价值够教育经费、教员的开支以及学校的开支，可能还多。

《关于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建立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讨论情况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

学生在四年、四年半之內，不给工资，只吃饭，为什么会亏本？

这种学校四年、四年半毕业，国家根本不要拿錢，不赚它的錢还好了。（国清同志：收税）是啊，可以收点税。税可以收，可以少收一些，开始试办的时候，沒有经验，鼓励他一下。

同　上

为什么算小帐而不算大帐？这些学生旣有劳动技能又有文化知识，旣能劳动又能做技术工作，他们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远看，工厂是不会吃亏的，是会赚錢的。

《和中央学制问题小组的同志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

我想只要用现在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去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可能和现在的学生一样多。用很少的錢，办很多学校，容纳很多学生，这对当前来讲是有

好处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这样办（半工半读招初中毕业生）国家不贴本，甚至教职员的工资也够开支。因为学生四年不拿工资的。如果招高小毕业生，三年毕业国家就贴本。

同 上

我们算一算帐：我们现在有三千多万职工，真正在工业交通部门劳动的只有一千六百万。……如果我们这一千六百万人也参加体力劳动，参加半天的话，等于增加八百万工人，不要好多錢的，也不增加好多工资。大批学生也可以做半天工。那我们的劳动力就增加不少了。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学生按学年逐增生活费的办法恐怕是不能自给的原因，按二十六元恐怕高了，当然统统改成十三元也绝对了一点，分两级嘛，可以两年以内十三元，二年以后，十五元到十八元，因为学生学到三、四年，就能生产好产品，你还是十三元他就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生产。毕业后，当工人评几级？多少錢？（一般评为二级工，五十多元）。比大学生还多啊！（答：是多一点。）毕业后和中技毕业生差不多。半工半读学校办得好，注意节省一点，国家不需要拿多少錢，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的利润不见得会赔錢。

《对河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农村搞半农半读，工厂半工半读。农忙劳动，农闲读书。工厂一周学习，一周劳动，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而且是正规的。只实行目前一种制度，不能普及教育，山东百分之四十九，江苏百分之六十，农村百分之五十不能入学。

…………

用什么方法普及教育可以担负得起呢？就是半工半读，小孩大体自己可以有饭吃。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的讲话》

实行这种教育制度，半农半读或者半工半读，使小孩子自己可以弄到饭吃，又能读书，这就可以了。这样国家可以负担得起，家庭也可以负担得起了。[①]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我们现在只有一种教育制度，全日制的大学、中学、小学，这种教育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搞了这么多年教育，还不到一半，怎么能到共产主义呢？要每个人都入学读书。照现在孩子多的，子女四五个都要读书，都要你们负担，你们负担起负担不起？……都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有什么办法想呢？我以前搞过勤工俭学，完全可以搞到饭吃，国家、家庭都不用负担了，这就好办啦。

《在工业、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

① 同年八月十日也作过类似的讲话。

小学毕业要升中学，中学毕业要升大学，这是很自然的。这样，不只贫下中农上不起，包括你们在内，也包括我们在内，如果四五个孩子都要上学，我看你怎么办！所以，不推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制度是不行的。

《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期间对何伟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这简直是剥削劳动！为什么算小帐而不算大帐？这些学生既有劳动技能又有文化知识，既能劳动又能做技术工作，他们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远看工厂是不会吃亏的，是会赚錢的。……对半工半读，现在就要开始试验，已经有一些经验的地方，如天津市要总结经验，扩大试验的范围，否则就迟了。搞迟了将来要吃大亏的。

《在何伟汇报时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大学非发展不可吗！让学龄儿童入学，就要升学，不叫升就不满意。小学毕业就要升中学，中学毕了业就要升高中，升了高中，不让升大学还是不满意。这样，有了孩子不让生不行，生下来了不让长不行，所以，有了半农半读的制度，就可以充分满足他们升学的愿望，谁愿意上都行。

《关于农业教育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最近我们想出一个办法。……一年可以读半年，一天可以读半天，这样可以不断升学。一个全日制学校的錢可办四五个半工半读学校，可以比较充分的满足青年升学的要求。

但还有个问题得讲清楚，即毕业了怎么办，如果毕业了都要国家分配工作，要当工程师、干部，统统不做工不种地了，这也沒有办法。我们对他们讲清楚了这一条，说毕业了以后还要当工人，当农民，做工、种地。如果你们答应就办，否则就不能办。他们说可以，只要有书读，毕业后，国家能派我们工作就派工作，不能派就做工种地。如果你们答应就办。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半工半读上学时就学会了做工、种地，这也习惯了。这是我们想的办法，可以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与某国副首相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大学毕业生，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多了也沒有办法，就业就有问题。现在大学毕业生有九十万，毕业后要当工程师的。现在工程师还不多，毕业后都可以当。如果再扩大一、二、三倍，统统要当工程师，就沒有那么多可以当了。

所以既要花錢少又要普及教育，不光是普及小学教育，还要普及中学教育，中等技术学校、大学的教育，这是个办法。如果将来行得通，再过一百年，中国人民——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就会比现在进步得多了。那时，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劳动生产率高，创造的价值就会比现在大。办法就是依靠人民，靠青年，靠他们自己办学校读书，靠他们自己做工种田和读书。靠群众自己而不是靠国家。现在只是开始试办，行不行得通还得看，但至少现在小孩子们不闹了。

同 上

（万里：我们调查了两个班，有的是兄弟姐妹五人，都上全日制负担不起，有几个人报考半工半读学校，不报考全日制学校。）

这是我们国家很爱护这一部分人，他们初中毕业了，不要他到处流浪，我们包下来。不用花很多錢，把他们收容起来，一面种地，一面读书。但半工半读不能太多，只能说大部分代替学徒工，不能全包。

《与何伟、刘子厚、万里的谈话纪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新工厂可派一个副厂长搞教育。以后劳动局和教育厅可以合着招生，招工人不是招工人，就是招学生，带老婆孩子的可以不要，这样工厂就沒有家庭负担了。招学生有文化的我要，沒有文化的我就不要，这样搞好生产的能力也有，搞军事化也容易，工厂提高文化好办。工厂里有工程师，文化技术水平很高，这是办学的有利条件。

《听保定地委汇报时的谈话》

我以前向你们提出要搞勤工俭学，你们已经搞了。现在你们青年团要组织青年实行半工半读。我看到工厂里边的青年男女工人……好多都是初中学生，让他们五年、十年都搞现在的工作，到了三十岁以后，就要闹情绪。因此，要替他们想出学习的办法。其办法就是组织他们实行半工半读。工厂可以办大学。中学……大学也可以搞半工半读。总之，要滿足青年的读书要求。

…………

这种半工半读的办法，就是做半天的工，上半天的学，给这些人一半工资，……如果工厂的行政人员，有顾虑、怕误工，不配合办这件事，青年工人就可以出大字报，保证四小时可以搞八小时的工作。这样，他们就会同意办了。

《在"八大"二次会议四川小组的一段插话》（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

半工半读……训练这么一些技术工人，技师，工程师，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各处地方都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不多花錢，比较充分地滿足了青年们的升学要求。……如此看来，乡村里面，城市里面，都可以搞半工半读。就是说，势必会有是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敎育制度同时并行。

《关于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办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滿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工厂里面可以加人。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內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

同　上

（陆定一：初中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三十能升学，这个问题很麻烦。）

不要紧，沒有什么麻烦。那百分之七十的半工半读，让他们去升学……一半以上不能升学，国家是不是应该替他们想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半工半读，想读书就进这种学校，要么你就不读书。上全日制上不起，就得上半日制，而全日制就这么多，要读书，就只好进半日制学校。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

你们不是在讨论接班人吗？这种接班人比较可靠，又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学了四年以后，再学点政治，学点马列主义，学一点经济，学点工厂管理、农业管理，就可以当社长、生产队长、厂长，党的工作也要他们做。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如果上海以后补充的新工人，都是这样出来的，经过三年到四年的半工半读，达到中等技术水平，多读点书，然后还要当工人。这些人最容易分配工作，能文能武，再学一点政治，学一点经济，就可以当党委书记、厂长。

同 上

(半工半读)读了，做了工，又不拿錢，又是无产阶级，将来有的还可以当干部管理国家大事。

《在天津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

他们(指半工半读)工资不少，不需要多吃多占，不贪污盗窃了。

《与河北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搞的好，将来他也可以进大学的。

劳动变成了习惯。对于这些人要继续培养，多数人学习技术，少数人学习政治，将来可以当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还有一部分人学习经济，将来可当厂长，当车间主任，当科室人员，还是让他们半天做工劳动，半天工作。

《在工业、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这些人(指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还可以继续学习，大多数人学习技术，少数人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做政治工作，做党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少数人学工业管理、工业经济，做经济工作。这些人可以当车间主任，当厂长，可以做群众工作，做党的工作。

《在江苏负责干部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

要有计划，安排得好，錢花得少，群众也满意。安排不好，国家花很多錢，群众还不满意。下乡青年教点课，津贴一点，有那么几块錢，就很满意了。

《关于农业教育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这样多的(半工半读)的人又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可以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些

人当厂长、党委书记、市长、县长……他们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到那时候，我们中国的情况就会跟苏联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如果说，你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又种地又升学，那他们就高兴了。这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有帮助。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如果让城市的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光是当农民，他们是不大愿意去的；如果下乡以后仍旧有书读，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他们可能就愿意下乡了。"五四"以前，我到北京去考上了大学，但是沒有錢上，就到保定育德中学勤工俭学了一年。只要下乡以后还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许多青年是会愿意的。

《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期间对何伟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这些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半工半读出来的，是我们的一种新人。他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这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前途，我们国家的前途。

《在广西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我和刘仁同志谈，北京普及大学教育可否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来实现。青年读书靠自己劳动，除非大学毕业，就不敢结婚，这样结婚年龄也可以推迟了，这样，只等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在劳动部关于劳动工作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苏联现在七小时了，我看我们要搞就是六小时……我看再有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产生这个结果，实行六小时工作就有利，最好是十年后就实现。……六小时工作，人们就有了读书的时间，每天有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读书，全民读书，那时才是眞正的文化革命。……那时一面紧张的劳动，一面紧张的读书，就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了条件。

《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的讲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消灭三大差别最重要的是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如一百年后，工人有百分之七十，农民有百分之五十是从半耕(工)半读学校出来的，情况就大为改变，三个差别的消灭就好办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报告》

我在天津，要他们查一查，这两千多毕业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这种人已经是新的人了，虽然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这些人和我们、你们不一样，和工人不一样，和农民不一样，和知识分子也不一样，和纯粹进三个门，出三个门的人也不一样。已经是新的人了，又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首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已经缩

小了。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将来，这些人(指半工半读)有的可以当车间主任，有的可以当厂长，有的去科室工作。……这些若能做到又劳动又办公又管理，就可以看出点共产主义时代的作法。

《与河北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在农村、国营农場、公社都可以搞，可以一个大队办，也可以几个大队联合办、公社办，附近的可以回家生产，远的不能回家生产，要给他划一块地作生产资料。

在城市，慢慢地把工人都统统地换成这种人，那个时候，工人、车间主任、厂长都是他们，规定科室人员、车间主任、厂长在总的劳动中抽出，多少时间办公，就不需要专门的厂长、科室人员和车间主任了。这样的厂长、车间主任就不一样了嘛。

告诉他们，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至少劳动四小时，其余的时间也可能都去玩。或者管经济，或者画画，或者唱戏，或者搞研究工作。将来的人可以做研究工作。

同　上

这种(半工半读)学校出来的学生，对劳动沒有反感，叫他们做工种田都可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消灭三大差别，或者基本上消灭，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

《八月十日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下午)

就他们(半工半读)来讲，他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消灭了，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沒有什么差别了。到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情况就和今天的苏联不相同了。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再过二三十年你还不(原文不清)批搞，那就要出修正主义；出了几百万知识分子都是要修正主义的。工人、农民自己文化不够。那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也死了，大概你们这些人(指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干部。——编者)再过二、三十年也不在世啦。他就要搞修正主义，那有什么办法，相当沒有保证。我看这个办法，培养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几亿这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生，他们靠的住。

同　上

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都会产生资本主义要复辟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在內。问题是如何防止。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要清多少次才能争取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将来劳动是人的生活第一需要，四小时劳动，四小时读书很舒服。搞四小时劳动滿舒服，我在保定就搞过一年，是很好的。

《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期间对何伟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现在我们还只有这两条办法，这两条办法搞了之后，是否还有复辟的可能性，还不一定，因为我们沒有经验。这要靠我们去创造！现在有了复辟的经验，还沒有不复辟的经

验，全世界也还没这种经验，今后至少还要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所以，一切国家都要发生这个问题，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所以要办半工半读的学校，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期间对何伟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半工半读这三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免除官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根本措施。

《关于半工半读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

缩短生产劳动时间，剩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多读些书，别都玩掉，这样都是半耕（半工）半读了。如果你不缩短劳动时间，人们就会说，你这不是共产主义。

《在听徐水县委汇报时的插话》

最 高 指 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

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十二、制定和推行形“左”而实右的“四清”路线

編者按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簡称“四清”运动），是我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在无产阶級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两个阶級、两条道路的斗爭，是一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毛主席在这个文件的前言中，亲自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輝燦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在这个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的指引下，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轟轟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深入，必然引起党内資产阶級代表人物的抵制和反抗。

就在“四清”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跳了出来，炮制了形“左”而实右的“四清”路線，妄图抵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刘少奇从他的反动的資产阶級立場出发，把我国农村描繪得漆黑一团，否認农村中的大好革命形势。他叫喊“敌人……比我們高明”、“斗他不贏”！污蔑“全国‘四清’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間里，基本上打了敗仗”，“連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妄图抹煞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的伟大成績。

刘少奇歪曲“四清”运动的性質，胡説“四清”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抹煞两个阶級、两条道路的斗爭，把斗爭的矛头指向羣众，排斥打击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包庇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

刘少奇还直接攻击毛主席一貫提倡的調查研究，污蔑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已經“过时了”，“不行了”，大搞脱离羣众的神秘化的“扎根串連”。

刘少奇反对突出政治，片面強調經濟退賠，叫嚷“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企图把严肅的政治斗爭引向經濟主义的邪路。

刘少奇为了推行形“左”而实右的“四清”路綫，竟恬不知恥地吹噓王光美的大毒草《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經驗总結》（即所謂“桃園經驗”）是“一个比較完全、比較細致的典型經驗总結”，“桃園大队的經驗是有普遍意义的”等等。并且盗用“中央”的名义批轉全国。

一九六四年九月，刘少奇竟然一手遮天，背着毛主席，炮制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这是一个处处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对抗的，形"左"而实右路綫的黑綱领。

这个黑綱领和"桃園經驗"流毒全国，給城乡"四清"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一九六五年一月，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議。彻底批判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形"左"而实右的"四清"路綫，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和前十条一样，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二十三条的产生，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的偉大胜利，同时也宣布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形"左"而实右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破产。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的指引下，我国城乡的"四清"运动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在运动中，发动了广大羣众，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了坚持反动立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特别重要的是，經过"四清"运动，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羣众运动，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掀起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

（一）把农村大好形势說成一团漆黑，否定"四清"运动的伟大成績

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眞正的领导核心，相当有一批，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不派支部书记派个指导员也行。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震林作报告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五月）

阶级敌人十五年来摸熟了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式，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还高明，以此来跟我们斗。过去革命中，敌人拿着枪，是公开的，现在是隐蔽的，而且有时以工人、贫农面貌出现，有时自己不露头，让代理人出面。现在敌人跟我们进行合法斗争，利用我们的政策、干部，利用我们的党员面貌，利用我们的口号跟我们斗争，从而夺取领导权，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要查清楚，实事求是，领导权在我们手里就是在我们手里，不在我们手里就是不在我们手里。有多少算多少，少于三分之一我也不反对，我看，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还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过。……不管多少，必须实事求是。农村中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各省都说是多数，有百分之六七十。严重四不清，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几百几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贪污盗窃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了，跟敌人搞在一起，反共反人民。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有的大队，有的公社，蜕化变质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或者反革命势力复辟了，就是因为这些干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蜕化变质就是这样变的：有上面的保护，沒有群众的监督。[①]

《刘少奇谈“四清”》（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省委清醒，多数地、县就不会变质，变了也可以变回来。县委清醒，公社、大队多数就不会变质，变了也可以变回来。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大队和公社、个别的县，在一个时期內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发现了这种情况，能够下决心革命，就好了。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因此，要不犯反人民的错误，必须有省、地、县委和政府来保证。……上级党政府机构的各个环节，都是坚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常注意克服各个环节中的动摇分子、不清醒的盲目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经常要发生一些的），那它就能把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不断巩固这个基础。

同上（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

敌人变聪明了，……搞得比我们共产党人更好，……而我们的党、干部，至今沒有学会与地主、资本家、蜕化变质分子的两面政策作斗争，……所以在斗争中打败仗，斗他不赢。

《对中央及北京干部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布置不要漏出去。住在牛棚里的人去扎根串连，就有一个小姑娘跟着，你谈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她盯梢，盯得很紧。强龙难斗地头蛇。如果不小心，或不认眞搞，你们或者被他们欺骗，或者斗不赢。现在看来，如果基层干部后面有地主富农，即使沒有，但有严重“四不清”的，工作队去，沒有不抵抗的。他贪污七八百，上千，他怕嘛，他要抵抗。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他眞是“四不清”，你去搞他，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赶走你们？如果有人要赶走你们，这说明你们是在革命。如果沒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的工作还沒有狠，说明你们还沒有革命。

《在济南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

这次搞“四清”、“五反”，基层干部沒有不来反一下、顶一下的。基层干部对待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哄、赶，最后躺倒不干。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午的一次讲话》

有些地方工作队下去，“四不清”干部就限制他们，不让他们发动群众，不让他们斗争，有的甚至把他们赶回来，山东有个大队就是如此，赶回来还不错。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

① 王光美在抚宁桃园“四清”时，曾写信向刘少奇汇报，这是刘少奇回信中的意见。经肖风整理，报河北省委，省委印发给各地委。

有人反对搞四清，拉拢群众，有计划地搞。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至于坏干部，后边有阶级敌人，不好好斗，不一定成功。你一进村，一切行动在他们掌握之中，优势在他那儿，他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喂你，盯你，餓你，攻你，躺着不干，赶你。我是国家主席，下去蹲了一个时期就给他们赶过。胡乔木、胡启立到湖南去几个月搞出一材料都是假的。我去了十多天，就说妨碍生产，骂我刘胡子，说我把他们搞乱了，影响生产。我是国家主席，去了还被赶走，你们去了还不赶？因为我们去影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同　上

现在敌人和我们的斗争方式已经改变了，敌人变得聪明了。地、富、资很会搞合法斗爭，搞两面政权“和平演变”，比我们共产党人还会搞。过去我们采用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他们斗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全党的干部沒有学会与他们作这种斗爭，因此跟坏人作斗爭打了败仗。

同　上

过去我们也搞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对付汗奸，对付国民党，我们用这一套，日本人对付不了我们，国民党也对付不了我们。现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是很会搞合法斗爭的。很会搞两面政权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大体是这样的：科员如果不拉科长下水，他是不敢大搞乱搞的；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一个部长要大搞乱搞，就要拉市长、书记下水。生产队也一样。生产队长不拉大队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长不拉公社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公社不拉区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公社、区委不拉县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县委下了水，他就要向地委、省委、中央找保护人。恐怕这是一个规律，这是敌人向我们斗爭的一种手段。

同　上

过去十五年来多次运动中，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斗爭的方式，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斗爭方式摸熟了，知道了我们有哪几手，阶级敌人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研究得还清楚，坏干部研究得也很清楚。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的讲话》

敌人和基层干部混在一起，斗爭很激烈，你下去后，不一定就斗倒犯错误的干部和四类分子，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因他们有组织，有准备，并且有一套对付工作组的办法。

同　上

我们就被赶走过：那一年到湖南，介绍到模范生产队……扎根串连……支部书记急

了说“你在这地方妨碍生产”，并且在大队门口骂说：“你们来了，把一切都搞乱了。都是刘胡子给搞乱的……”你们看，我还是被人家赶的。……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的讲话》

过去的“四清”无论在城市或农村，……甚至根本沒有入门，过去一年多，革命斗爭中，我们不是打了胜仗，而是打了败仗。

《对中央及北京干部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全国‘四清’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打了败仗”，“都沒有走上路”，“连一个公社也沒有搞好”。

《对广西自治区“四清”运动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震林作报告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五月)

过去一年多“四清”、“五反”取得了好的作用，煞住了歪风，促进了生产，但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多处沒搞深搞透，甚至还沒有入门。小平同志去了一次东北，也说工厂五反还沒有入门。过去一年沒有打胜仗，而打了败仗。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过去一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恐怕那些问题基本解决了的单位很少。……“五反”还沒有入门，农村“四清”恐怕也有些是如此，沒有入门。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我们过去的领导机关，长期脱离群众，凭着听汇报、看材料来指导工作是很危险的。这个情况从中央到公社党委，如不改变，不要很长时间，我们的工作就会发生严重问题，过去的“四清”、“五反”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抓得不深不透，有的根本沒有入门。还在门外边。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的讲话》

“四清”运动沒有搞好，这是全国性的。

《对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公安部等单位领导干部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

这次听了各省、市委的报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的同志在火车上谈了话。他们汇报“四清”，沒有一个象样的汇报，沒有一个能把斗爭过程讲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午的一次谈话》

最近找了几个同志讨论了一下，到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去了一下，

给省、地、县委书记讲了一次，正碰上他们开三级干部会，看了一些简报，其中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所反映，但看不到一个象样的总结，发言一般。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讲话》

最近我到几个省跑了一下，到了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遇到这几个省开三级干部会，并看了这几个省的会议简报，……我从简报上和地委书记的汇报中感到他们的发言是很一致的，沒有深入下去，讲不出什么名堂，讲不出什么经验。可以说这几个省沒有一个象样的从头到尾的比较完整的经验总结。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许多党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下边的问题不了解，就因为凭汇报。下边有些问题他不向你汇报，还有些讲得天花乱墜，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凭这些作决定，眞危险啊！现在"五多"(会议多、报表多……)沒有改进。是不是可以中央各部发报表未经部长签字，一律不发，而且发下了不要催？有些催得紧，也就假报了，有专门塡造假数字的人。有一个会还沒开呢，就报上来了，说有多少人开，发了些什么言。这是办公室的人搞的——"四清"办公室、"五反"办公室、干部办公室，是吃饱了饭沒事的人搞的。如果把这一点切实改进一下，好不好？如不改，搞多少年我们就要灭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几十年，二十年，十年搞完"四清"。

同 上

(二) 歪曲"四淸"运动的性質，轉移斗争目标

"四清"运动要解决的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对中央及北京干部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要么是"四清"改造"四不清"，要么是"四不清"改造"四清"。

《一九六四年一月关于蹲点问题的讲话》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广大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每一个社员都要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了提高农民的觉悟，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在运动中，认眞地恰当地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爭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地方抓紧进行了这项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步驟。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按〕 刘少奇提出羣众自我教育，实际上是整羣众，轉移运动的重点。

（三）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实行“三結合”，排斥打击农村广大基层干部

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不首先发动群众，不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午的一次谈话》

关于双十条依靠问题，基本是依靠贫下中农，依靠群众，这是我们的群众路线。基层干部如果是好的话，他们会与我们一块依靠群众，如果不是好干部，就不依靠群众。有的基层干部可依靠，有的是可依靠可不依靠，问题是要依靠群众。如果干部出身贫下中农，对搞运动他们会高兴。双依靠，依靠贫下中农是基本的，这与依靠干部不能并行。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不能有干部躺倒不干。

《在天津河北省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工作队到村，要从扎根串连开始。……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前提。……

眞正的群众运动是扎根串连，分清那个是贫下中农，那个不是。

《在济南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

我主张华东局负责同志和上海市负责同志分批搞两个工厂和两个大队都是必要的，农村不要搞一个公社；自己搞一个大队，叫别人搞一个公社进行一般指导。如果你搞一个公社，就不能亲自去扎根串连，找贫下中农谈话，看看地主、富农是什么样子，在后面如何搞鬼。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到一个大队，要把情况搞清楚，至少要有一个月，扎根串连，问这个，问那个，然后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个干部好，那个干部不好，是不是有四不清，严重程度如何，地主、富农情况怎么样。

同　上

工作队下乡……先要做秘密工作，不经过秘密工作过程，是发现不了眞正的根子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午的一次谈话》

工作方法有普遍性，不能叫框框，叫普遍眞理，否则就沒有客观眞理，扎根串连是普遍眞理。

《与李雪峰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现在敌人和坏干部想了许多办法来跟我们斗争，我们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斗争的经验，我们有点落后于敌人。要搞好"四清"、"五反"，除了一批蹲点，还得组织专业队，这就不是一批两批，几个月，而是要几年、十几年，到工作结束为止。要有一些职业革命家。搞"四清"的力量有三种：(1)职业革命家，(2)工作队，(3)受鍛炼的。"五反"一般也要搞工作队。过去沒搞，沒发动群众，不行。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我考虑现在在桃园本地找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群众，制服××等人，并改造×××等人的好支部书记，恐怕是难以实现的。为此就要从上面从别处选派一个好支部书记去，或者派一个好指导员去。

在一个大队的党员中难于找出一个好支部书记，形成一个好领导核心，可能不是很少，而会更有相当一部分。对于这样的支部，大体上都要从外面从上级派好的支部书记或指导员，可能有许多好处。[①]

《给王光美的信》（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沒有参加运动的，沒有资格沒有权利审批案件。"四不清"问题都是经过大多数群众来搞的，难道比你们几个法庭审判官不更可靠？

过去"四清"处理干部，一般偏轻，工作团已经处理了的，监委不要去复查，要批就按工作组的意见办事。

"四清"后的申诉，由原来工作组去处理，沒有参加社敎的，沒有资格去管。

《与中央监委对审批"四清"运动中处理案件和处理申诉控告案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

此外，还有一个躺倒不干的问题，你搞"四清"，他就抵抗，他抵抗的办法就是躺倒不干，我们的领导干部就怕这个躺倒不干，不敢整得他太厉害了，因此就整得他不深不透，社会主义敎育不深不透这是一个很大的顾虑。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震林作报告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五月）

是不是可以依靠公社党委、区委、县委搞社会主义敎育运动？……

是不是可靠的可以参加领导核心呢？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可靠不可靠，查一两个月还查不清楚。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

---

① 王光美当时在抚宁桃园四清。

依靠。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

组织坚强的工作队。在每一个点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必须要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鍵是扎正根子。……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深入地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是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最根本的工作。

同　上

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去，扎根串连，参加劳动……从头到尾，大体上四——六个月一期，“五反”七——八个月一期。

扎根串连，要做一、二个月的秘密工作。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报告》

进村后，贫下中农也要观测你一段时期，看你住哪儿，吃什么。工作做得好，开始跟你秘密谈话，到发动起来了，就能公开说话。这大概起码要一、二个月。

同　上

工作队下去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可以住大队，也可以自已搞，到工厂去搞“五反”可以早去晚回。

同　上

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该强调发动群众的时候就强调发动群众，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就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求：第一，充分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彻底；第二，乱子尽可能少出，不超过一个指头。这两条要求行不行？这样就算高标准。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我昨天翻了一下你们送来的材料，你们第一批不是搞得比较好的吗？群众送了一句话，说是多、大、狠的工作队。这倒是句好话，就是说，来得干部多、大，搞得狠。但是时间搞得太短了。

同　上

工作队进村以后，有一段时期还要做秘密工作，工作的部署不能告诉他们。（“他们”指干部。——编者）

同　上

负责干部下去，就是书记下去，部长、局长、厅长都下去，中央也要下来一些，工作队才强。现在沒有强的工作队，就打不开局面，斗不赢狡猾的敌人，斗不赢同干部勾结起来的敌人。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城市的"五反"也应该派工作队，机关的"五反"也要派工作队，看来不派工作队不行，搞不开，搞不好，要由负责干部率领工作队去搞。无论农村或者城市，沒有负责干部率领强的工作队去，有始有终地搞，是斗不过那一些有组织的、上下左右都有联系的阶级敌人和坏干部的，是斗不过他们的。

同　上

贫下中农要观察你，不象解决问题的样子，不和你谈了。如表现得好，参加劳动，多找贫下中农谈，也不住在亲戚家，他就和你谈。开始是秘密谈，一个人，谈了说了保密。他也是做秘密工作。如此以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贫下中农才敢面对面地指出干部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的报告》

双十条，第二个十条有某些地方起消极作用，限制了群众的发动。我看，第一个十条是行的，第二个十条，基本上可以用，某些地方稍为改一下子行了。普遍念双十条有好处，地富反坏，地富子女，干部群众，好人坏人，都听了，大家放心，起安定作用。贯彻的时候，一步步来，搞到什么问题，贯彻那一条，就强调那一条，那个重点。有些人反对一开始两个十条都念，还是念起安定作用。(这是对彭眞搞的右倾的《后十条》进行假批评，眞辯解，用以掩盖自己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编者)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中央双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许多具体政策规定，其中有些要修改，有些写得不够，或者有些话不那么妥当。第二个十条就是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够，有许多具体政策规定，有些变成清规戒律，某些话的讲法不是那么妥当。(这是对彭眞搞的右倾的《后十条》进行假批评，眞辯解，用以掩盖自己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编者)

同上(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四) 片面强調退賠，把政治斗争引入經济主义邪路

生产关系上有四不清，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搞清楚了，群众积极性就高了，不然积极性不会高的，生产就不能发展。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

关于退赔，不知你们情况怎么样。我在河北了解的情况，基层干部有东西退。……干部有手表、自行车、縫級机、收音机、留声机，是有力量退的。实在不够，卖掉一两间房子

就够退赔了，而且有些一次就退完了。有的两次就可以退完了。……看了你们的简报，好象退赔很困难，我看，一是沒有搞彻底，不是那么多，所以就不退；二是沒有发动群众，所以也不退。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退赔退得不好，是群众沒有发动起来，所以他们不退。他们能不能退？我看可以，他们有手表、自行车、縫級机、大肥猪、房子，如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卖掉了，就可退了。讲退赔，我们有些同志首先考虑他生活困难等等，而不考虑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是个阶级立場、阶级感情问題。要做好家属工作，你们要问她，你愿意你丈夫搞贪污分子还是做共产党员？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不退群众恼火。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报告》

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不论多少，必须彻底退赔。对于犯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和放高利贷的人（包括社会上的和农民中间的这样的人），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或者要他们补税，或者要他们退息，或者罚他们的款，或者沒收他们的不义之财。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鎮上的企业、服务行业都是面向农村的，运动的成果除了表现在更好地为农村服务以外，也要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增加生产，扩大生产范围，使劳动者（工人）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生产，就要扩大生产范围，要很好安排，不要紧一阵，松一阵，常年有活做，经常有收入，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利润增加了，才可以扩大再生产，增加工人收入，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只谈生产增加，生活提高，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反对突出政治。——编者）

《吳法宪同志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五）否定調查研究

现在，照毛主席过去那样做调查研究已经不行了。那时沒有土改，沒有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題，找贫农座谈可以听到眞心话。现在在农村开座谈会，大部分眞话听不到，我们找基层干部，听汇报，了解情况非常片面，很不可靠。有两个数字，到底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就搞不清楚。

《在济南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现在，农村中天天开调查会不行了，贫下中农不会讲，调查不出什么来。干部袋里有几套，看你要什么。眞正的调查研究，就是要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五反”，才能调查清楚。

《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

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一次谈话》

调查的方法，过去的也不行了，搞"四清"、"五反"，要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的讲话》

现在先开座谈会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不行了，因为基层干部对许多情况不报告。现在该采取什么方法？要在斗争中认识客观眞实情况。搞五反、四清，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参加劳动，才能把情况搞清楚，要经过斗争，有的可能很激烈。

同　上

毛主席不是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吗？现在，在许多情形下，召集基层干部或贫下中农开两天座谈会，他就把情况告诉你，那样行不行呢？能不能调查得眞实情况呢？调查不了的。……现在仍然按中央调查组那样的调查方式，不行了。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他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告诉你，或者告诉的是假的，贫下中农和工人也不能无顾虑地和你谈话，是不是你开调查会他就会把眞实情况告诉你？不会的。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是采取开调查会的办法。调查会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行了。干部会，很多重要情况不告诉我们，贫下中农有很多顾虑，不向我们说眞话，不把眞实情况告诉我们，所以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的讲话》

现在有许多阶级斗争的问题，你只开调查会已经不行了。找基层干部开调查会，找贫下中农开调查会，几个人座谈，一谈情况就清楚了，沒有那回事！

《对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公安部等单位领导干部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

你们自己不亲自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运动，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负责同志来讲非常重要。否则，不能作领导工作啰！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公社书记也不能作了，其他厅局长，中央的部长，司局长，我看也作不下去了。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

（六）大捧王光美

关于蹲点的方法，河北省较好，唐山抚宁(这是王光美"蹲点"的县。——编者)较好，……无论如何要蹲下去，搞生产也要这样办，一件新的工作都要这样搞。

《在河北省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群众运动的规律"》(一九六四年六月)

"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搞社教试点,县监委开始沒有去人,但后来去复查,说这个不合乎规定,那个不合乎规定,这些情况,王光美可能向你们谈过了。""监委系统有点右倾,主要表现在'五反'、'四清'问题上,河北省监委派一位处长去复查抚宁县桃园大队的案子,有什么资格去复查?!谁沒有参加'五反',不许审批五反的案件,谁沒有参加'四清',不许审批四清的案件,前段的案子,如果你们要审批,只许同意,不许翻案,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有的(人)可能寃枉,寃枉就叫他寃枉一两年,以后再平反"。

《召见中央监委领导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十月)

她(指王光美。——编者)讲出来了,我就讲不出来,你(指李颉伯)能不能讲啊?……不行怎么会知,不眞行就沒有眞知,经过实践,搞出个报告,这是规律。现在还沒有很好总结,她还沒有完全用上去。她讲四五小时,你们要她讲六小时,还是三小时半讲完的好。

《与河北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听了河北一个大队的经验,比较完整,对整个运动怎么搞法,怎么发动群众,怎么要他们自觉革命,他们不自觉革命怎么办,只有帮助他们革命嘛。

《在安徽省委常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二日)

沒有想到,王光美的报告影响那么大。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午的一次谈话》

要蹲点,放手发动群众,要蹲就要认眞蹲……王光美蹲了五个月,一个月回来一两天。

同 上

要下去蹲点,彻底闹革命。沒有料到王光美的报告那样受到欢迎。当然,她有实际经验,一报告就是六个半钟头。我现在本来沒有资格发言,我就是听了她这一点。

同 上

抚宁工作队在卢王庄公社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好的,值得各地同志参考和学习。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抚宁工作队关于卢王庄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转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

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的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王光美有经验，只有二十天即打开局面，你们沒有经验。

《与李雪峰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最　高　指　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五页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醒的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个运动的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十三、提出資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編　者　按

我們偉大的导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帅、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領导的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闊的新阶段。这是无产阶級为着巩固革命政权、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資本主义复辟而对資产阶級和一切剝削阶級思想展开的一次总攻击。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斗爭。这是关系

党和国家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头等大事。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們最最敬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象一股紅色的巨流，滚滚向前，向着那些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冲击。

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被这場史无前例的羣众革命运动吓破了胆。他們急忙跳了出来，利用他們窃踞中央的要职，抛出了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妄图扼杀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妄图在中国复辟資本主义，断送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尖銳斗爭的焦点，一直是圍繞着对待羣众采取什么立場，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是相信羣众、依靠羣众、尊重羣众的首創精神，讓羣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羣众去斗爭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讓羣众去斗爭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热烈支持羣众的革命大字报，热烈支持革命大串連和革命的紅卫兵，热烈支持无产阶級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和羣众心連心！

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大喊"内外有别"，压制羣众的革命大字报，包庇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們背着毛主席，擅自决定派出大批工作組，划框框，定調子，下令关閉校門，禁止革命串連，污蔑紅卫兵是"秘密組織"，反对羣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搬出国民党的"訓政"来对待羣众。他們把羣众当作阿斗，把自己当成諸葛亮。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因此，他們反对革命羣众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夺掉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叫喊"工作組代行党委职权"。他們轉移斗爭目标，制造白色恐怖，圍剿革命羣众，提出"反对工作組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反动口号，把革命羣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何其毒也！

去年七月，正当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嚣張一时，企图将无产阶級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关鍵时刻，我們最最敬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下令撤銷了鎮压革命运动的工作組，揭开了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盖子。紧接着，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主持和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們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亲手撥正了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宣告了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的偉大胜利，宣告了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慘重失敗。

毛主席教导我們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正是按照这个邏輯行事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捣乱得更凶，而失败得也更慘，彻底暴露出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但是，我們还务必提高警惕，万万不可疏忽大意。事实証明，他們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总是要伺机反扑的。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們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动員亿万人民羣众，穷追猛打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猛打背后支持他們的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讓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占領一切陣地。

（一）疯狂反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場严重的斗爭。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爭。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場，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眞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眞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場重大的斗爭，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戏曲的改革，要逐步的，不要过急，太急了，改了太多。如要脱离了原来的东西，要到更高的阶段，沒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不要去干涉。过早过迟都不行。

问题是禁止演戏的人多了，瓜沒有熟，要去摘，主观主义，自以为是。

《在文化部負责人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

京戏与现代戏，是很好的舞台戏。要采取帮助、提高的方针，不能采取压制的方针。

同上

很多的观众，喜欢整本的戏，整本故事。要有完整故事。有些有历史教育意义。

可表现现代生活的，就演现代生活的戏。不能表现现代生活的，就演历史戏。让大家看了戏，好好休息，就是鼓励社会主义劳动热情。

《在文化部负责人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

《打渔杀家》中的小姑娘，是群众喜欢，她穿得漂亮些，不要去干涉她。

脸谱、胡子、服装等，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

剧目凡是无害的都可容许演。有害的，有些地方稍改些也可演。

同 上

方针是百花齐放，土嗓子也好，洋嗓子也好，然后推陈出新，陈旧的东西推掉一些，但不能勉强，能推掉一些，出来一些新的。

同 上

京剧唱词，大家听不懂，这是普遍的观众问题。听不懂，脑火得很。这个地方是否可改良一下，弄个幻灯片，从听不懂到听懂。

唱词不必去改，那个时代的话反映那个时代的思想。现在观众有判断能力的。

同 上

世界各国的电影，都搞点进来，一种是进步的，一种是不怎么进步但也无害的，搞些进来，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生活、学习。

总之，全世界好的东西，我们都要。

改良主义的东西，不要怕。

《在文化部负责人汇报时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

文艺工作者可以坐着汽车下乡，吃饭、睡觉都可以在汽车上。

《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七月）

是否要在文化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的问题，二十几万人，一方面搞五反，绝大多数人用社会主义教育，有些反党的也要批评，不要象反右派那样搞得厉害。

《在怀仁堂主持会时的发言》（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

历史戏也是可以演，有些还是好的，可以古为今用，有些要重新编，《将相和》还是好的。《恶虎村》黄天霸改了，就有教育意义了。

同 上

演历史戏要古为今用，有些戏要重新改编。过去有些戏改得不错，象《恶虎村》，揭露黄天霸，也有改得不好的，象《李慧娘》、《谢瑶环》、《团圆之后》等。……改得好的还有《十五贯》、《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有些传统戏，花了好大力量也改编的不好，不如另搞新的。

《在中央召开的讨论文艺问题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

乌兰夫同志说《王昭君》在内蒙影响很大，对蒙汉民族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央召开的讨论文艺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

现在，文化界、文艺界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方面搞"五反"，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文艺……有少数人与我们不是一条心，是反党的，要对他们进行批评，不过不要象反右派那样搞。

同　上

现在我向他们（指整个文艺界）提出了要求，就是反映现代题材的要占压倒优势，要占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帝王将相"也搞，但要少搞些。

《与××文化代表团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

周扬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只是认识上"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只是工作上"有时候抓紧点，有时候抓不紧"，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新东西"扶植肯定不够"等等。

刘少奇说："周扬同志讲的情况和意见都很好。"

周说："大跃进以来，出了不少好作品，但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五风，工作中的缺点。"

刘说："工作缺点也可以写，要总结经验。"

周说："要注意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

刘说："传统戏、外国戏摆到第二位。"

《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插话》（一九六四年）

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些文艺界的人，反对现代的东西，没有别的理由，就是说艺术水平不行。

对外文委政策研究室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在和外宾谈话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话》（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二）支持和包庇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和一切牛鬼蛇神

〔按〕为了抵制和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二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彭真、陆定一抛出了臭名远扬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在炮制过程中是在刘少奇家里討論通过的，后来又在他的支持下盗用党中央名义发到全党，流毒全国。在彭、陆、羅、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揭露以后，刘少奇又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手法，掩护和开脱他們的罪行。

对新疆宗教出版物，仍以照新疆分局所拟办法，政府不作事先审查，较为主动，因为全国出版物现在都不作事先审查。如果政府答应事先审查，那大家就可能送许多来請求审

查，而自动送审者，又大体是沒有反政府言论者，势必要批准出版。为此，就可能发生大批由政府批准出版宗教书籍。这是很不利的。这些允许出版的书籍中也不可能沒有错误，但政府在以后就不能禁止，人家也不好批评。而不允许出版的书籍，也难免有一个明白的界限。如只有少数字句和错误，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的不让其出版也不好。因此审查起来也将陷于被动。

《对新疆分局一个关于宗教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四年）

科学上的眞理是愈辯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彭眞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错误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进行宗派活动，他沒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提不出创造性的意见。对彭眞，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领导人之一，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他滥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在毛主席和我们面前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

彭眞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也反对党內外（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彭眞不接触实际，不接触群众，喜欢搞个人突出。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按**〕刘少奇虽在表面上談彭贼的問題，实际上是为彭开脱，竭力洗刷自己和彭的黑关系。以下談陆、羅的問題亦更如此。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同志，但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不满足。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林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逼林彪同志让位，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工作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排斥，他是专搞一言堂的，不听别人意见，他到处伸长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同　上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

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解放就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嘛！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坏右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的子女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女呀！他们的子女要报仇啊！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人吗？就有资产阶级"权威"。生活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一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枪毙人容易，可是他们死了还有子女，子女不高兴。你们学校有出身不好的，有地主的，有资本家的，也有干部不好的，他们的子女不要歧视。对他们的反动言论要提高警惕，不要歧视，歧视他们有反感。今天只能提这么一个问题，以后的任务就由你们了。

《在北京建筑学院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

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全人类指无产阶级劳动者，还包括剥削阶级子女，还包括沒有枪毙的。给他们饭吃、地种或劳动，使思想变化，改造他们。劳动改造是有变化。对不枪毙的人你就改造他，他要不改造，就永不能解放，这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地主阶级枪毙了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的父亲被杀了，他儿子有杀父之仇，他要报仇，就不能解放。解放全人类包括那些不被枪毙的犯人。无产阶级还要鎮压犯人，无产阶级不专政就不能解放自己。把所有的犯人都枪毙，杀父之仇的人就更多了。

《与"八一"战斗团代表谈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言论，材料不充分。

《在人大会堂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三) 瘋狂推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大派工作組，大搞国民党的"訓政"

一九六六年六月，刘少奇说："内外有别"，"注意泄密"，"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宅"。

清华大学《井冈山》：《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按〕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刘少奇就一手策划制定所謂《中央八条》，提出上述框框来束縛革命羣众运动。

学校、干部、教员要分类排队，不要打击过分。娃娃们起来什么都要打倒。也不要怕乱，(只要在八条范围内)建立一个革命秩序。现在坐不下，吃不下，睡不着，不要硬限制，要引导，冷静地分析批判。

摘自《胡克实传达的刘、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

在北京以两个月左右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爭，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要注意，对问题较小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要掉进三类，内外有别要注意。

同上(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沒有党的领导不行，工作组就是代表党的领导。

学校情况复杂，学生左派右派都起来了，右派以左的面目出现，要赶工作组，现在更离开不得，派工作组是过去搞运动的成功经验，校党委烂了要派工作组夺权，校党委问题少，也得派工作组去帮助领导。

现在谁也沒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不是撤出问题。

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

"那里出事，那里派人去"。"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

摘自《胡克实传达的刘、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

为什么怕恢复党团活动呢？要立即恢复。党、团支部不开秘密会，吸取群众参加会，至少要为党员人数的一倍。三级干部会(集训)主要解决领导核心问题。领导核心主要是教职员问题。

《同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革委会的同志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

(1)要加强工作组。(确定由教育部派一批同志参加北京市中学工作队)

(2)中学太分散，沒法讲道理。实事求是，在中学生中不讲不通。集训，先向一部分讲通了就好办了。

(3)初中搞到九月底，"十一"后开学，高中搞到年底。

(4)学生中除一定会有小流氓、小反革命等，一般不戴帽子，也不要天天辯论，浪费时间，抓起来就行了。

(5)对工作组要加强教育。

(6)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吸收群众列席党团会议。

(7)现在只是都恢复党团生活，未恢复领导，这么大的文化革命党支部不领导怎么行。

(8)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搞些典型，要与文化革命现阶段要求有关的。

(9)工作队要训练一下，调整一下。

《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中学文化革命初步规划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

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

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开）。工作队革委会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同学参加，告诉他们守秘密。

《给刘平平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

工作组进校后受到欢迎，接着发生撵工作组的情况，原因很多，……也有的别有用心，攻工作组，反对党的领导，这时强调了在革命的基础上恢复党团活动，加强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对别有用心撵工作组的人进行了些辩论，现在又出现了些停滞的情况，中心是教育提高工作组，学会大民主，学会民主集中制，对工作队不能采取消极的换的办法；而要积极地教育，实在不行的再撤，大民主的焦点是大辩论，辩论中要积累一套规则，一套办法，如何斗争的问题，要准备好了再斗争，高水平高质量地斗争，斗前要演习，校间互相支援的内容，现在要强调互相学习。

摘自《胡克实传达的刘、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否改选一下？改选嘛，你们自己罢，要罢官可以，选举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如果相持不下，可以临时找个召集人。非党员认为不好的人，你让他（她）当委员，结果全体党员丧失信仰。选不出来，临时找个召集人，今天你召集，明天他召集，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群众不满意一、二个委员，党委丧失威信，处理党员在最后嘛！谁最后入党，看最后决定，是不是？省得他们罢你的官，说你们保皇。你们保什么皇呢？保个党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怎么叫保皇呢？……以后除了市委通知让党员开秘密会的可以开，市委没有通知就不开。

（插：群众都来了，该怎么办？）他们都来，来多了不好，可以加倍，二十个党员再加二十，他们可以轮着来，反正我们沒有什么秘密，这样就不被动了，不会有意见了。

《在北京建筑学院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我提个问题，党总支，党支部是否要联系群众，联系非党员，非团员？你们党员开会，可以让他们参加，总支委员也不要开秘密会，团总支，团支部，团委会亦可以让非团员参加，这样他们放心了。文化大革命是大家的事，要一起商量。

同 上

有党员，有团员，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组织改选，改组原支委，原支书你们不喜欢，可以改选，如暂时成立不起来，可成立临时的。你们可以改选，选不出来成立临时支委。

院党委要改组。开全院党员大会，要改选，能选出来就选出来，选不出来，暂时慢些。

《与“八一”战斗团代表谈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刘少奇还借坚持恢复党团組織生活，以镇压羣众运动。

（四）顛倒黑白，圍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爭，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一律不进行批判斗爭。

对于一些问题严重，一时弄不清楚的，可以举办集训班，进行审查批判。

《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

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眞右派，和我们激烈地爭夺领导权，破坏性很大，对此方针是：坚决揭露、分化、瓦解，把头子抓起来，到适当时候是要反击的。对这种人工作组沒有办法，一是沒经验，二是他们的策略很厉害，用大帽子压人，用各种办法纠纏你。

组织民兵纠察队，负责校內的秩序和违犯政策的、维持斗爭会的秩序。

从来访者中发现假左派。

阶级阵营分清后，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在工作组领导下面，恢复必要的行政职权。

乱这么一阵是大好事，是必然的，但现在到时候了，注意一分为二，要抓紧分类排队，特别是中学，是不是一棍子都打？

要注意敌人的行动。

摘自《胡克实传达的刘、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指鎮压六月十八日北大革命师生斗爭黑帮分子的革命行动）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

"抓紧分类排队工作。"

"中学权威不多，也有一点，副产品也暴露和揪出一批反革命。"

"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兔不了有混战的場面，这是几种原因造成的，有以敌人来的，有以假左派来的，有的是以幼稚的左派来的，要充分估计运动的反复性，有充分准备，有警惕，有策略，分析敌、友、我的形势，要抓口号，抓住敌人的辮子，把大多数人爭取过来，组织起来，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眞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

摘自《胡克实传达的刘、邓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计委口传达、学习、声讨阶段过去了，学得不深不透，现进入大鸣、大放、大字报阶段，上下内外左右结合，以内部突出人物为主，都出来，初步排队，分性质，焦点、左、中、右。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的讲话》

大概在六月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

一、要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对刘涛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

七月二十七日，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此人就是刘少奇。——编者)单独找我谈话，他认为我是支持少数派的后台老板。当时我对你们的情况还不了解。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沒去过，我对情况不太清楚。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谈清华鎮压蒯大富是错误的。

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说：不是。

他们讲：你们说是鎮压，是不对的，不是鎮压。

我说：不是鎮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吗？

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康生同志在希斯尼·卡博和清华大学井岡山兵团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出现了说你(工作组长——编者)是黑帮的大字报，证明內部不一致，证明他们(指贴大字报的七个同学。——编者)对运动不滿。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先打好这一仗，先争取和××(师大一附中校长兼党支书记——编者)合作的学生，这是子弹。这七个人的后盾是地下的。

《与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革委会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能利用，写大字报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帮不肯定，辩论一下，就不用多辩论了。

《给刘平平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为什么不听工作

队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辩论好，一条一条地驳，他出五张，我出五百张，他是在搞地下活动，违反工作组指导，利用群众情绪，乱斗一气，把文化革命搞乱。高中辩论完了，初中也要辩，要不还会被利用，揭露×××反动面目，×是谁指使的，把她孤立起来，不要打人，让大家驳，大家出大字报，他们那边一定有××，前市委或高级干部。……

他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高二(一)的几个人利用了"乱"，乱斗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可以讲×××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她们。

要开大会，照原来的，要相信群众，不一定打人嘛！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乱，不要上坏人的当，向所有的人讲，打人是×××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对师大一附中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不要相信，只要不捣乱就行，开大会检讨，可以嘛！让大家知道嘛！(后台)能问出来就好，问不出来就算了，让他保留。看调查情况怎样，不会不跟外校联系，后边定有人，她说用意是好的，不可能……。

现在形势好……不要让大家沒事，沒事就会闹事，不能几个人准备，大家沒事，要提高警惕，×××的检讨就是麻痹你们，反革命分子经常在红旗下进行更恶毒的活动。这次反下去了，下次还可以起来，胜利了，不要骄傲，你大意了，他们就会更精明了。

《给刘平平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

〔按〕刘少奇的这个黑指示，是在师大一附中开了斗争群众大会，×××被迫作了检讨，并由中学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宣布×××为"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情况下，对他的女儿刘平平講的。

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个问题基本上平静下来了！后台揪出来了吗？(×××汇报了总后勤部宣传部×副部长和×××的情况，说正在追查中)×××是学生还是教师？(答：学生)，跟×××、×××是一起的，沒有出面就是后台，幕前幕后嘛！他承认不承认是后台？他父母都是干什么的？×××、×××承认不承认是幕后？给他们出主意就是后台嘛！你们沒有斗他们这些人？沒有打他们？他们现在还在学校？(×××汇报说：×很久不到学校，绝食)绝食，让父母劝告一下，学校里沒办法，他在家里绝食有什么办法？告诉他不要到学校里来了，来了也可以，要认识错误。……他们都检讨，假的不要紧，下次再来嘛！……他们是高二的，(已经高三了)快毕业了，还留在你们学校里，反动的交给你们学校几个，反正开除也不行，到外边去，他还不是要捣乱？沒人管，就这几个办法，沒有地方去，还是留在学校。……只要争取了群众，把他们孤立起来，就可以了，孤立起来，可以不做什么处理。他们闹也是好事嘛！可以教育大家，看有多少人受骗。

《在听取师大一附中革委会汇报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

这些人(指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七个同学。——编者)高中毕业了还得留在你们学校，

就交给你们了，反动的留给你们去改造。工作组、团委不要讲人家是反革命，同学可以讲可以骂，我们不能。……不要给他戴帽子，戴帽子还要经过法律手续嘛。这些假左派是眞右派。

《与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革委会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你们听了我讲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也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吧，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作结论，作结果。

《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爭”。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分干部“挂起来”。

工作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待”。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沒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

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

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胡××、

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

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4)沒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都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請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眞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蔣××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內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蔣××性质还未定"。刘×（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爭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

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

"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剝，先揭基层，后揭党委）；

"先扫外围，后打黑线"；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顺藤摸瓜，內查外调"。

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

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

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

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

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

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七月十日，王××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工作組撤走之后，在工作組一手扶植起來的清华"三臨"（文革臨时筹委会、"紅卫兵"臨时总部、臨时主席团，都是由賀××、刘×主持的）掌权期間，繼续在干部問題上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綫。

（一）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

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除根"。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一群混蛋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聊睡不问国事

（二）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

他们把干部分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

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三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沒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三）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的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六）开脱罪責，布置退却，妄图"秋后算帳"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沒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与王光美、刘涛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准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当权。

《对刘平平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工作组走后，×××（反工作组的那七个学生之一）可能翻案，如果翻案，×××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好的就听。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看清楚了，

还会把权夺过来，这时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对刘平平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工作组已撤销了，再不能回来，有人说工作组还在活动，有没有？(有！没有！两派意见)，如有就不对。你们什么时候要他们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组留在你们这里好，还是离开学校？(留着好！)有多少同志赞成留下，有多少同志要他们回去？听你们的意见，批评。再不许他们乱指挥，乱发表意见，工作组没有权利再发表意见。叫他们天天劳动，为人民服务，给你们扫地、刷碗、替你们写大字报……以前做的不好，现在做点好事嘛！

《在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有错误，不能全部由工作组负责，党中央、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看来派工作组这件事不好，是不派好一点。工作组在他们学校做了哪些，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中央、市委该谁负责的就由谁负责。

同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按〕毛主席明明反对派工作組，并且已經下令撤工作組，刘少奇却說工作組是"党中央同意的"，"有责任"，諉过于毛主席，可恶！可恨！

辩论会看事实怎样，有人材料知道很多，他也不揭，他也不斗，他们的话是站不住的。他们抓人多。要抓根，谁冒点头很短，一打就缩回去了！你等他完全露出来就好了，这就可打倒了。他不完全出来是打不倒的。有些人刚刚出来点就回去了。

《与"八一"战斗团代表谈话记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按〕"完全露出来就好了"，"就可打倒了"，企图对左派实行反攻，杀机毕露。

可以造新市委的反，当然可以造你工作组的反，让他统治一个时期。

《在怀仁堂与工作组领导骨干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按〕在刘少奇看来，左派只能"统治一个时期"。

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了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你怕反革命上台，……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

同　上

将来得开大会，市委得替你们担责任的，中央也得替市委担，你们不得上推。

《在建工学院工作组座谈会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你们这样检讨过不了关的，现在的问题如何脱身，错误要讲够。

同　上

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趣就越来越高。要承认立場、方向是错误的。

《在建工学院工作组座谈会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我也要看一下你们的检查稿。如果你们检讨好，我就好讲些，如果你讲不好，我就难讲。

同 上

现在反革命要用反革命口号反毛泽东思想。搞反革命不容易，现在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群众也看不清楚。

同 上

〔按〕刘少奇反咬一口，説左派“打着‘紅旗’反紅旗”。

又怕群众闹事，又怕反革命上台。反革命上台有好处，市委彭眞的反革命不是也上台很久吗？罗瑞卿是总参谋长，他们可以搞多少年，为什么现在叫他们出来几个月就不行，公安局也要让反革命露头。

同 上

你们错误的性质，你们工作组到学校后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是个别问题，还是方向问题？

同 上

〔按〕刘少奇吞吞吐吐否認派工作組是方向錯誤。

恐怕一些部长、局长、处长、校长、党委书记是不允许人家造反的，人家造反，就势必压制群众运动。而且你工作越是积极，就可能坏事做的越多，眞是一点事不做，倒可能学到一点东西。

同 上

〔按〕掩盖派工作組是方向的錯誤，为自己开脱罪責。

最 高 指 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四页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四七页

十四、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綫

編 者 按

关于党的建設問題，毛主席教导説，我們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又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长期以来，刘少奇利用他在党内所窃踞的重要职务，把持着党的一些领导部門，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綫，为实现其篡党阴謀作組織上思想上的准备，幷妄图使党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党的思想建設是党的建設的首要問題。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党員还是用其他什么思想来影响党員，这是关系党的思想建設成功还是失敗的一个关鍵。刘少奇为了从思想上控制党，一貫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員，相反，却大肆兜售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級斗爭，不要奪取政权，宣揚腐朽的資产阶級世界观和反动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貨。《論

共产党員的修养》则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思想的代表作和綱領。长期以来，刘少奇一直用这个黑貨来反对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对偉大的毛泽东思想，并妄图用它改变党的面貌，使党演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在組織建設問題上，刘少奇违反毛主席关于**"向着眞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以及**"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公然主张把資产阶級分子、蜕化变質分子，以及入党动机严重不純的分子拉入党内。他招降納叛，培植私党，一九三六年曾指使薄一波、刘瀾濤、安子文、楊献珍等数十人变节自首，其后又多方庇护重用这批叛徒，并鼓吹叛徒哲学，鼓吹修正主义"全民党"的謬論。

在党内斗爭問題上，刘少奇借口反对"錯誤的过火的斗爭"，妄图取消党内的政治的原則的斗爭。汚蔑党"硬要去搜索斗爭对象"，"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内斗爭"。并否認毛主席关于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爭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一科学論断，胡說党内斗爭只是由于"各种党員看問題的方法不同"，鼓吹党内保持无原則的和平，宣傳"妥协"、"调和"，腐蝕党的战斗性。

为了从組織上控制党，刘少奇极力曲解党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反对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教导，大肆宣傳盲目服从，說什么"就是不对，也要服从"，提倡奴隶主义，要求党員做所謂"馴服的工具"。

在基层組織(机关支部)的任务問題上，刘少奇违反毛主席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指示，取消基层党組織的首要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把机关支部工作說成只是領导学习、党务和照顧党員生活等，使党支部这个无产阶級的战斗堡壘淪为文化补习班、伙委会和俱乐部，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和破坏了党的战斗作用。

列宁教导我們："堡壘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而苏联共产党就是被鑽进它的内部的大野心家大阴謀家赫魯曉夫及其一伙所篡奪，并使苏共改变了颜色，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我国文化大革命所揭露的事实告訴我們，刘少奇正是隱藏在我們堡壘内部的一个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是中国的赫魯曉夫。刘少奇所竭力推行的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綫，正是为了从内部篡奪党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的。我們必須挖出刘少奇这一埋在我們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彈，揪出这个中国的赫魯曉夫，彻底清除其修正主义建党路綫的恶劣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更加革命化更加战斗化而斗爭！

(一) 宣揚剝削阶級的道德，妄图用地主資产阶級的思想面貌改造党

党员是有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发展，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对立，……党的利益与党的发展中包括着个人的利益与发展。党的阶级的成功与胜利，也就是党员的成功与胜利。党员只能在争取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中，来发展自己，不能离开党的发展而去争取个人的独立发展。也只有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党员才

能发展自己，否则党员就不能发展。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第三十六页

党员有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在任何形式的掩盖和借口之下，企图牺牲党的利益去坚持个人利益。……事实也证明，党员只有全心全意地争取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本领，否则，党员要进步、要提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党员个人的利益必须而且能够和党的利益完全取得一致。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要使自己个人的利益完全与党的利益一致，以至溶化。[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四十三页

在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不应有个人目的，私人打算；不应什么都只顾自己，到处向党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责备党沒有抬举与奖励他。……而党及党的负责人在解决党员问题时，就须……使党员能充分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对于那些眞正克己奉公的同志们，要给以更大的注意。只有这样，只有两方面的注意与努力，才能配合起来，才能对党有更大的利益。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

总而言之，一方面，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不应该有同党的利益相违背的个人目的、私人打算。……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在解决党员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党员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教育情况，使党员能够更好地为党工作，使党员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对于那些眞正克己奉公的同志们，要给以更多地注意。只有这样，只有这两方面的注意和努力配合起来，才能对党有更大的利益。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谁能忠实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人民有贡献，并且一贯做下去，最后就会有好处。对共产党员我们也是这样要求。

《接见民建会、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他们要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就必须同时发展别人，提高整个劳动阶级的地位。

同　上

如果我们的党员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加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等，作为自己的目的，那末，共产党员这种个人目的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

① 所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溶化一致，揭穿了就是弃公营私。

在我们党内，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还要求党员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还不能也不应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得要根据他的个性与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是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之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与特长。党而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去帮助党员个性与特长(于党有利的)的发展，给他以适当的工作与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

依我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象做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最有前途。比如有很多同志，特别是长征过来的，他们总喜欢带兵打仗，可以当团长，当旅长；……但是，不久的将来，战争打完了之后，那些团长、旅长又干什么呢？那时有很多同志，就要放下枪杆来搞你们这一行——搞工业，搞经济，或者搞文化。

《在工厂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技术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把敌人消灭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术工作为中心，……我们将来建设新中国，要大家管理国家，那时技术工作就要占首要地位，而今天的军事指挥员到将来也要到工厂去做工。到那时技术工作就要决定一切，因此技术工作是最有前途的，任何轻视技术工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

既要作一个终身的党员，也就不要怕有什么事被人误会，被人怀疑。因为误会怀疑总是暂时的。真相总是在最后要暴露出来。一年二年被人误会，被人怀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终身。你如果是一个好党员，总会被人明了的。暂时的误会怀疑，对于个人常常不一定是有损失的。因为误会怀疑一旦被人明了之后，不独能挽救你在误会中的损失，而且增加对于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励。

《论党》(一九四六年版)

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与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最有效的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而后者即对于个人来说，它的进步性也极有限度。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

至于在党内存在的本位主义，与这种个人主义是不同的。……犯本位主义错误的同

志，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不见得一定是怎样不好的。这固然不能与个人主义来比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

对于我们共产党员，……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我们说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同　上

中国共产党，……它有强固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同时继承着中华民族历代进步思想家、事业家的优良传统。

同　上

党的领导者如何团结干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团结干部就不能巩固党的统一，就不能开展工作，不能胜利的完成任务。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干部。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不少能干的封建帝王。如刘邦、项羽、刘备、曹操、赵匡胤、朱洪武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打游击中打出天下来的。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打游击的英雄很多，要最后能够统一天下的便称为“眞命天子”。他们所以能得到成功，具备有两个共同的条件：第一是有比较适合群众要求的政策；第二是因为他们能够团结干部，能够以宽大政策对人。比如刘邦能够用人，争取了张良、韩信，结果得到成功；而项羽则勇而无谋，不知用人，终于事败身死。曹操、刘备也是能团结人，故能成事。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就喜欢宽大，而不喜欢对人刻薄。历史上凡是不会团结人，不待人以宽大，那是不会成功的。……

中国今天的情况已经大大的变化了。……但中国民族的传统，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都是不能不注意的。

《组织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

在中国古时，有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诗经上的“切、磋、琢、磨”，以及“反躬自问”，“座右铭”，“书诸绅”等。中国宋儒也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各种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中国大学上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的这一套。这些一切，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自己的进步，必须下深刻的工夫，郑重其事的去进行自我修养与学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

所以，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沒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幷不承

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鍛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餓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負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爭中的鍛炼和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五页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鍛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同 上

我们必须在党內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法国的、美国的、孙中山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我在华中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及合法斗爭等，也值得拿到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党员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学习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幷最好的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与群众。还须制订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如各级政府组织法……）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吏的办法等。在党內对于违反民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斗爭和处罚，在人民中也应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及解释各种法律等，……总之我们要下一个决心，要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要建立眞正民主政府，要眞正的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致某同志的信》(一九四三年)

在美国，即使他是工程师，赚錢多，本领大一些，但，幷不以为比工人高一等。……民主精神在我们干部中间，有许多人不大够的，眞的以为人家要比他低一等，他自己是比人高一等的。……美国大总统华盛顿、林肯退职时，就退为平民。美国的资产阶级还能够这样的讲民主，但在我们党员中，却还有要他退为平民，退为普通人民就不滿意的。

…………

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一般人民沒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得民主。而我们党內，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的。我们比欧美经过民主革命及几十年民主训练的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一个官僚。所以今天来介绍一些外国的民主精神，在中国很必要，甚至在我们党內也必要。

《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一九四一年)

现在我们党內党外都沒有民主的训练，对于民主政治的精神与实质及方法，党內党外极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此，我们的民主政治，大部还是在口头上，还大部沒有见之于实际。

《致某同志的信》(一九四三年)

然而在你们中我常常听到这种说法：认为在学校中学习不是鍛炼，不是修养，要鍛炼

和修养，就必须离开学校，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鍛炼。同志们！鍛炼和修养，是终身的事情，有许多方面随时随地，在随便什么问题上，都须有鍛炼和修养。我们不能说只有在某种时候，某种地方，某种事情上就能鍛炼修养，而在另外的时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事情上就不能鍛炼修养。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十三页

中国党內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鍛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

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幷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须如此作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本人，更是如此。过去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在党內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內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內以极坏的影响。

《答宋亮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为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同时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现在文艺工作者，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在学习的实质上说乃是找到了主要的基本方法。学习就是打倒无知，这比苏联打倒希特勒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决心长期的学习。

摘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

《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招降納叛，結党营私，鼓吹修正主义"全民党"

农会是中心组织，不要怕农会代替政府、代替党，统治了乡村一切。因为农会没有地主，农会统治一切，就是农民统治一切。……农会的人当区长、党委书记，由农会来篡党、篡政。

《在六地委报告中关于工作和土地问题的摘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

① 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的指示。他和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唱一个调子。

本来乡村支部就应是贫农组(即无产半无产的先进分子)。现在乡村支部成分复杂不行。如支部一百人,全村贫雇农才八十人,吸收二十人参加党也不占优势。这样支部无法领导贫农组,如何解决?大家讨论、讨论。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听说你们要求入党,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情况,这种愿望是好的,要怎么入?是秘密入?公开入?

工商界有几个参加共产党好不好?有点榜样,搞几个。可是那就对国外沒有影响了,我看帽子还可以戴一个时期,有利于工作。你资本家也当了,也沒有整你,又入了党则更好了。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批评要严,处分那些不愿意改的。有民愤的要撤职,开除党籍。撤职,开除党籍后,有一部分人还可以爭取,蜕化变质的再变过来,爭取重新入党。

《在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插话》(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以后接受的新党员,都必须经过考察,经过教育,都必须是成分好的,即是从工人或劳动者出身的人,至于从剝削阶级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在基本上抛弃了剝削阶级的观点和作风弁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爭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互助合作与集体农庄,是两个阶段,今天要防止急性病。各地的经验都证明了,凡是党员都不敢做的事,群众就不会去做。党员不能单干、不能雇人、不能有剝削,便会影响到群众也不能单干,不能雇人,不能剝削,便必然阻碍了扩大生产。

《对安子文、王甫的口头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建立党的同情者小组,是有一种需要的。因为在中国劳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大批的党的同情者,他们需要一种组织,需要党经常地去指导他们进行一定的工作与进行学习。但是他们还沒有完全具备作一个党员的条件,或者因为他们有某些实际的困难而不能、或者他们不愿意完全履行一个党员的义务与遵守党的组织上的约束,因而他们不能被接受入党,而党又不能降低党员的条件去将就他们。为了照顾这种情形,用党的同情者小组的办法去团结、教育与指导他们,可能是适当的。此外,在过去加入了党的组织,但是不够条件的党员,在他们退出党的组织后,加入党的同情者小组,也可能是适当的。……这种组织如果建立起来,并运用得好,对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可能是有帮助的。它可能成为党的亲密的可靠的一种助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对于不愿补课,或补课后仍然不够条件的党员,如果是坏分子,就应当清除出党,如果不是坏分子,也应该分别地为他们作出适当的结论,具体指示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够条件,弁請他们退党。如果他们不愿退党,而愿继续作一个党员,也可以向他们提出条件,等候

他们一个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再审查他们的问题，如果仍然不够条件，可以再次請他们退党。要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保持党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不要和他们伤感情。

《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爭》(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富农党员问题提得早了！有剝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对雇难民作工，不能叫剝削。圣西门是个资产阶级，但他也是个社会主义者，假如今天东北有个资产阶级照圣西门的办法做，他可能办成，不会垮台。当然不是一般农民所能做到的。……

…………

党员要交公也交不出去，我的油坊，马上要交公，国家不要，不得已(本来不愿意)只有暂时私有，私有是今天的社会制度。现在发展了，将来可交公，这样的富农也是好党员。

…………

现在要宣传与说明互助组的好处，但又要使他也能单干。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不鼓励单干，但党规党法上允许单干，允许雇人，不准剝削是敎条主义。

《给安子文、王甫的口头指示》(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

要使农村出身的党员来了解并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应该教育他们。

《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爭》(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还有些人主要还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沒有职业，沒有工作，沒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甚至还有个别人为了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某些人要依靠共产党，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他们找共产党沒有找错，除开敌探、汉奸、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以外，我们对于这些人，还是欢迎的。只要他们承认和遵守党纲、党章，愿意在党的一定组织內担负一定的工作，并且交纳党费，他们是可以加入共产党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十八页

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凡是有这八个条件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就有资格做党员……家庭出身，我们也注意，但不过分注意。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三) 取消党內积极的思想斗争，鼓吹无原则的和平，腐蝕党的战斗性

在党內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都不敢讲话。不敢讲眞话，也不让讲眞话。这样就严重的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

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应该怎样进行？……大家耽心的是怕一棍子打下去，又弄出一大批分散主义者。这次一定不要这样搞，以后也不要搞。过去那样搞也是错误的，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內斗爭方法。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党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党內斗爭的态度，他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些似乎疯癫的人看来，任何党內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们在党內并沒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爭的对象，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內斗爭中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爭的胜利，只有依靠这种错误的斗爭，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內斗爭，才算是"布尔什维克"。当然，这样不是什么眞正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党內斗爭，而是对党开玩笑，把极严肃性质的党內斗爭当作儿戏来进行。主张这样做的人，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来投机的人。

同 上

抱这种绝对态度的人，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內斗爭，而且斗爭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他们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他们不按照客观需要、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地具体地进行党內斗爭，而是机械地、主观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爭"。

同 上

这种对党內斗爭的绝对态度，在一个时期內曾经被党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党內的机械的过火的斗爭，发展到故意在党內搜索"斗爭对象"，故意制造党內斗爭，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爭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依靠这种所谓斗爭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

同 上

当着党內产生机会主义思想，存在原则分歧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进行斗爭，来克服机会主义思想和各种原则错误。但是，这绝不是说，党內不存在着原则分歧、沒有产生机会主义的时候，硬要把同志间在某些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扩大成为"原则分歧"。

同 上

要读书，要整风，党校要把整风和学习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好。要力求两不误，既读了书，又整了风。整风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检查党和各方面群众的关系。这个方针就是强

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主观上沒有必要先强调斗爭。故意的人为的使斗爭激烈化，使斗爭紧张起来，似乎要来制造斗爭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象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解决。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懂得的，你们就要在这次整风学习中，运用辯证法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同杨献珍、侯维煜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五月）

不可否认，在我们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过去的党內斗爭中，……党的进步还不够大，成绩还不够多，幷且在党內所引起的痛苦太多，代价也费得太大。以很大的牺牲，很大的代价和很多痛苦，換来了不够大和不够多的党的进步与成绩。这就是我们过去党內斗爭的基本总结。①

《论党》（一九四六年版）

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內总是想抬高自己，幷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他好参加党內一切无原则斗爭，对各种无原则的纠纷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在党內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

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而对一切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采取敌我不分的态度，或者抱着绝对的态度，都机械地过火地去进行党內斗爭，主观地去制造党內斗爭，也是根本不对的，是和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

同　上

有人说："党內斗爭所注重的是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如果原则上政治上对了，组织方式是次要问题，可以不必计较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组织方式恰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组织方式错了可以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要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首先要拿稳这个组织原则。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二年）

党內的斗爭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任的事，我们必须要以最严肃最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而决不可以草率从事地"强调"，必须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有准备的去进行。

《论党內斗爭》（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许多同志还是死记着列宁的原话，认为党內的斗爭是必须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要不得的，但他是机械的死板的运用原则。他们认为在党內，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爭，而且是斗爭得愈凶愈好。

同　上

---

① 刘少奇上述关于过去党內斗爭的基本总结，它的矛头是指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刘少奇否认自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以来，通过党內斗爭所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绩。

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①

《论党内斗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原则上、思想上的对抗，与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抗，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

同 上

改善我们党内的关系、同志关系，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改善党的关系的方法很多，刚才我讲了一些，就是建立党内好的关系，假使关系已经不很好，冤气很多，作事不吸收意见，因此不好就要改好一下，改好用什么办法，共产党员要用一个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大家批评一番，检讨一下。……自我批评有许多种自我批评，整风就是很多自我批评，……心里有些不高兴，开个反省会，坦白会，开他过(个)一两天，我对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对我有什么不高兴，你那一点对不起我，我那一点对不起你，大家来坦白一番，互相批评一番，在负责干部中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甚至于在群众中间，老百姓中间，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论发扬民主》

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与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与解释一下，如果解释不了，只好让别人去说。也应该记着中国两句古话："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华北人民大学教务处印

我们想消灭山头，使大家一样，这不是很好？但是客观原因存在，就是我对你相信，对你熟悉，我们在一起，对你什么话都可以讲，但是对他我就不熟习，不清楚就不相信，我什么话都不对你讲，恐怕你揍我一下，这种现象，恐怕长期的存在，因此要估计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讲话中，处理问题中，在我们的干部政策中，在我们的分配东西，在我们的待遇上等等许多问题上我们就要照顾山头界线，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改造山头，才能教育他们进行改造山头的教育工作，你教他，他才会听。

《关于党内关系问题》(一九四四年)

(四) 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党内民主集中制，党的制度是集中制，集中制可以是民主集中制，可以不是民主集中制，可以是个人的集中制，个人集中制叫独裁，蒋介石就叫独裁，我们军队内是首长制，也是集中于个人。

《关于党内关系问题》(一九四四年)

① 刘少奇把党内斗争的产生归结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引起，企图抹煞党内许多重大斗争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这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里面的制度，政府里面也是民主集中制，但是有些机关，有些地方组织，他们就不是民主集中制，比如我们军队里面的制度是什么制度呢？他就不是民主集中制，或者我们叫他首长制，我们军队里面，叫做首长制，我们有些机关里面也是首长制，工作机关甚至于学校也是首长制，所以我们现在的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民主集中制；一种是首长制，我想这两种制度我们去用的时候，不要把他混淆起来，应该是有所区别，应该认识这两种制度。……但是一到军队里面，一到机关里面，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要服从一个首长，服从这个指挥官，工厂里面全厂几千几百人要服从一个厂长。

《关于党内关系问题》（一九四四年）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只要是大多数，是上级或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二年）

决议、指示、命令等等，……即使不对，甚至是真不对，你在组织上行动上也必须服从的。……

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服从党、尊重组织的绝对性上，表现在对于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对于党的一切东西的尊重、执行与爱护上。……

对于真理与原则的坚持性，和对于党的组织之服从的绝对性，是不可分离的。不能因为你在原则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而且应该坚持，就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组织与多数，不服从上级。

《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九四一年）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坚持，对抗与争论，和同志们对于党的组织上的服从，对于多数与上级的服从，是不可分离的，否则就沒有党的统一与行动的一致。同志们决不可以因为在原则上坚持己见，就在组织上与党对抗，就不服从多数与上级，就去自由行动。这是违反党的基本纪律的。

《论党内斗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民主集中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是，有很多人却认为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据我所知，他们所提的条件，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人说：要我服从上级和多数是可以的，但上级和多数在原则上，在政治上先要正确，若在政治上错了，我就不服从。这就是以多数的，或上级的，或中央的正确与不正确为服从的条件。这个条件的提出是不对的，这就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

不作工具作什么？作党的工具好不好？很好。

作什么样的工具？驯服的工具，还是调皮的工具？是容易驾驭的，还是不容易驾驭的？……动脑筋的人就不能作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就不能动脑筋了？作一个驯服的工

具，又有理想，是绝对不能统一，还是能统一？这是可以统一起来，有一致性的。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我曾听见一个同志说，在党内斗争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在组织上即使错误一点是不要紧的，是次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可以采取各种不合组织纪律的手段向反对者斗争。这种说法，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他把正确的政治路线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对抗起来看，他不知道捣乱党內的秩序与组织，就是犯了一个最严重的原则的错误；特别在今天妨害与破坏党內的团结和统一，就是最大的帮助了敌人，最大的妨害了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他原则错误更加严重的错误。

《论党内斗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五）取消基层党組織的政治工作，破坏它的战斗堡壘作用

我今天提议：支部的任务应是以下几件事，請你们审查：

第一，总支委的任务就是领导学习，全支部的任务就是大家学习。我提出的学习问题，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也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工作的问题。支部要把组织与领导学习的工作，提到政治工作的高度。……要斗掉这些不正确的思想，采用甚么方式呢？这个方式就是学习方式，把文化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学一些马列主义，全世界事情讲一番，增加革命思想，增加知识，把家庭问题、老婆问题等坏东西越挤越少了，最后就挤的沒有了。①

《在西柏坡总支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们的总支三百多个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班，有的编入中级班，有的编入初级文化班。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即是开党的会。

同 上

事实证明，文化班是党员与群众都喜欢的，就是不喜欢小组会。这个成绩是好成绩。这个办法是好办法，我们要改组支部就照这样改组，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多搞一些，普遍一些。不仅办小学，高小、初中，还要办高中，办大学，将来把高中，大学办起来，把理论班政治班都办起来，把三百多个党员与非党员通通吸收到学习班里，全体学习，大家

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西柏坡总支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谈机关支部工作任务问题。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虽然也说了一些机关支部要作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要和党员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资产阶级的方法、习惯，封建思想作斗争等貌似正确的话，但又说："政治工作是阶级斗争，学习班办好也是斗争，教育就是斗争"，并把机关支部工作归结为四项任务，即：一、领导学习、组织学习（文化、理论）；二、党务工作；三、照顾同志的生活；四、居民工作。从而在事实上取消了机关支部的最根本的任务——政治思想工作，使党支部这个无产阶级战斗的堡垒，降低为文化班、伙委会、俱乐部，使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成了空话。

进步，那么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都挤掉了，政治工作是阶级斗争，学习班办好也是斗爭，教育就是斗爭。

《在西柏坡总支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演两个钟头戏，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会，沒有戏班子，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很喜欢唱，我们可以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总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但是我们不要开的太多，太多了大家就会讨厌。

同 上

甚么叫切身利益呢？大锅饭吃不下去，就是切身利益问题。……都应当好好解决，现在我们还沒有工会，党的支部就应该直接办理，组织生活委员会，组织伙食委员会，专门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事情办好了，对三百多个党员都有利益。把这些事情办好了，党员一定会活跃起来，而且琐碎事情也会减少。你做支部工作，支部的全部事情就是这三百多党员的事情。这三百多人每天至少吃两顿饭，现在饭里有砂子，他们端起饭碗来就骂娘，这样的重大问题忽视了，还要工会、支部做甚么？

同 上

许多带一般性质的问题，都要经支部大会解决。所谓带一般性质的问题，包括许多党务工作，组织学习，还有许多生活问题：如发保健费，米里有砂子等，都要开支部大会解决。支部大会要开好是很为难的事，总支委要研究，要有很好的准备。比如米里有砂子，要开总支大会讨论，如果总支委事前沒有很好的准备，讨论一天以至十天也沒有用。事先要商量好，准备好，如果自己不熟悉就找熟悉的人研究，然后开大会，伙夫同志也参加，报告二十分钟，之后付表决，只要四十分就解决了问题。会开完了大家看戏。

同 上

机关党的支部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提高生产力，就是要为提高工作效率而斗爭。

同 上

最高指示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九五——一〇九六页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三——六五四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〇三页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九七页

十五、反动的資产阶级世界观

編者按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被革命人民热烈地、亲切地称頌为“老三篇”。林彪同志指示：**“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归根到底一句話，“老三篇”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級世界观，也就是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光辉最集中的体

現，是巩固无产阶級专政、保証社会主义鉄打江山永不变色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刘少奇长期以来和毛主席的"老三篇"大唱反調，竭力推銷一心为私的資产阶級腐朽世界观。一、刘少奇鼓吹唯利是图的賺錢哲学。宣揚"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还恬不知恥地說它是"符合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其实戳穿来看，只不过是"将本求利"、"一本万利"的資本主义生意經，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二、鼓吹个人利益第一。刘少奇胡說什么"沒有个人利益，就沒有集体利益"，"个人利益集中起来就是集体利益"。这是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抹煞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本質区别的謬論。它是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干着化公为私的勾当，用"个人利益"作外衣，販卖个人主义的私貨。（正如他自己所招認的，"这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先公后私。"归根到底，还是为私。这正是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丑惡灵魂的自我大暴露。）三、推銷騎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的剝削阶級反动貨色。刘少奇对下乡知識青年說："你們和农民建立起了密切关系，大家都說你好"，"人們就会选你当社长，当乡长，当县长"。用資产阶級政治来对抗无产阶級的政治。四、公开鼓吹叛徒的活命哲学，为他的招降納叛，結党营私，制造輿論。五、从一心为"私"出发，在方法論上和認識論上大搞形而上学和煩瑣哲学，提倡反革命的"合二而一"謬論，对抗唯物辯証法，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綫，为他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服务。

刘少奇的这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是两个阶級、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爭在党内的反映。这是一心为私的資产阶級世界观同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斗爭在党内的反映。正如林彪同志所說：**"剝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

刘少奇頑固地站在資产阶級反动立場上，一貫宣揚一心为"私"的資产阶級腐朽世界观，妄图用这些黑貨来改造党，来瓦解无产阶級革命队伍，来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复辟資本主义。我們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必須大破資产阶級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級世界观！我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对刘少奇的資产阶級反动世界观进行坚决斗爭，彻底批判！

（一）大肆宣揚"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反动哲学

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点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宁愿要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吃小亏，占个大便宜。……占小便宜，人们会看清楚的，那是遮盖不了的，也许可以蔽盖一时，长时期蔽盖是不可能的。

与人接触时，情愿吃点亏，遇到困难，人家不愿做的事我做，任劳任怨，最后大家说你是个好人，大家愿意与你交朋友，将来还有大发展，人都会有一天不能做工作了，人也有发生、发展、消灭的时候。国家总是要青年人管的。后一辈总要接手，是人民叫你们管，建立起信任来就可能有更多工作要你去做，吃点小亏，占个大便宜，这是符合马列主义世界观的。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沒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要丧失一部分。为人民作事，大家就会照顾，规律性即是这样。现在是人民作主的国家，有公道眞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即不会有个人。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如果说是占便宜的话，他最后要占大便宜。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讨小便宜的人吃大亏，吃大亏的人挣大面子。好事让人家些，困难的事我拿来做。这就是要吃点亏，但这是吃小亏。这样，大家都喜欢你，都相信你。相反地，处处占便宜，结果被作个结论：爱占小便宜，不可靠。

《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的讲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老实态度的人，会吃点小的苦头，但最后是得大便宜的。不老实的人起初会得到点小便宜，最后会吃大亏的。

《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共产党员不要怕吃亏。规律是占小便宜要吃大亏。有些人什么亏也不吃，有威信的事他去做，占小便宜，这样一年二年可以，十年八年就不相信他了，结果吃了大亏。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暂时看来是吃了点小亏，十年八年相信你了终究是不吃亏。

《在天津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

"总想占人家便宜不是互利，而是一利，那样关系总是搞不好，要不怕自己吃一点亏，不是吃一次、而是二次、三次、多次……要这样做下去，一年、两年、八年、十年……长了，人家就会知道你是个好人，诚实的人，可靠的人，可信任的人。"

"立志去干几十年野外工作，最后人民是会了解你们的，照顾你们的。"

徐才、王玉如：《和刘少奇同志渡过一个美好的下午》(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我劝你们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吃苦。不怕吃亏的人才能站的住。凡是什么事情不愿意吃亏的人，那是不好的。是不大那么受信任的。

《在郑州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

我也未进过大学，考上大学沒錢去，曾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去。后来我进了苏联东方大学，去的人有一半是不好的，需要送还中国。还要派几个好的人带他们回来，免得他们不满，当时我就回来了。这是不是吃了亏呢？是吃了些亏，我的俄文没有学好，是不是一定

不如哪些住完大学的人呢？不一定，不要迷信住大学。

《在郑州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

应当看到下乡种地当农民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不是没有前途的，认为不是光荣而是可耻的，不是占了便宜而是吃了亏，这是错误的。

同 上

怎样和农民搞好关系呢？就是要吃亏。你们反映有些乡、社干部不好，他们为什么不好？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吃亏。遇到好事抢在前面，手脚长，自私，愿意占便宜。要和群众搞好关系，就不能自私。要让人一点，自己吃点亏，吃亏一次、两次、三次还不认为你是好人，但终究会认为你是好人。一年、两年、三年不认为你是好人，但几十年人家总会说你是好人。人家会说你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好人。占便宜是不会搞好群众关系的。这是当好人的根本点。

同 上

“青年人，要遇难挺先，舍己救人，不要占小便宜。占小便宜的人，将来会吃大亏。”

刘维孔：《革命后代应当干什么——记刘少奇委员长教导我参加劳动的经过》(一九五七年)

在党内，凡是诚恳坦白的老实人，最后一定不会失败的，共产党员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也是尧舜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有许多人调皮捣蛋，不老实，专门“钻空子”，手膀很长，什么东西都揽得到，到处占面子，占便宜。这样的人，最后要被检举的。至于那些埋头苦干的人，都是老实人，现在吃一点亏，最后会成功的。人家总会知道你是好同志。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

(刘少奇插话)有人说，讲眞话的人要吃亏，这是错误的，讲眞话的可能暂时吃亏，最后不吃亏，讲假话的，迟早要吃亏。

摘自《邓小平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

在我们中，那些埋头苦干的党员，那些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斗争的党员，那些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党员，是我们好的党员，虽然在某些个人享受上，他们暂时的吃一点亏，然而他们是，或者最后是，为我们大家及群众所信任，所尊敬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最值得的。……相反，那些不愿埋头苦干，好出风头，怕困难，怕危险，不忠心为党为人类的利益奋斗的人，那些要求享福在前，吃苦在后的人，都不是好党员，虽然他们在某些个人享受上或者暂时讨了一点便宜，然而他们是，或者最后是，为我们大家及群众所不信任所反对的。

《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

应当提倡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党提倡所有党员和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参加生产劳动者的姿态……。党员干部参加劳动，扫扫地，剷剷土，群众的观感就改变

了，相应的关系就改善了，生产就提高，灵得很，小工商业者和家属凡是有可能的也这样做。工作不在乎多少大小，只要力所能及，就全部拿出来。不要选择工作，这也不做，那也不做，这部分工作不做，就会引起做这部分工作的人反感，提倡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对你们会有好处。

《在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丢了芝麻，捡了西瓜"。稍大一些，他又说："讲老实话，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会吃亏，但最后不吃亏。"六四年，他对我说："开始自己不自私自利，舍得吃亏，就会得到信任，怕吃小亏的人，反倒吃大亏，就失去信任了。一个人年轻时就要有信任，不要在中间丧失信任，恢复信任就要很多年，年纪也大了，这辈子也差不多了……"后来，他说我们进半工半读学校，也是："你做第一代脑体结合的新人，不吃亏"。为了证明他这套市侩哲学是正确的，他还举了自己亲身经历，他说："我刚到安源时，工人不理解你是干什么的。生活很差，后来和他们一起搞罢工，罢工胜利后，工人理解你了，大家给你钱，生活也就好了。"他对我们这样教育，对干部又是如何呢？抗日战争时期，他要干部安心工作，说："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吃得开，所谓行行出状元。作宣传教育工作不好吗？当整风运动来的时候，作宣传工作的同志就吃得开了；作保卫工作不好吗？当肃反运动来到的时候，做保卫工作的就吃得开了；作农会工作的不好吗？当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时候，农会干部就吃得开了；作军事干部不好吗？当芦沟桥炮声响的时候，将军们就吃得开了"。

刘涛、刘允真：《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有一些党员喜欢占小便宜，今天也占点小便宜，明天也占点小便宜，后天也占点小便宜，好象占了便宜，但到了最后还是要吃大亏的。不占小便宜的人，不怕吃小亏的人，最后还是占大便宜。"

"不要拾了芝麻，丢了西瓜。要看得远些。"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不知你们怎么样，我是有这个经验的。"

《对光华大队几个干部讲话》(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当干部的就要吃点亏，吃点亏不要紧，最后群众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在湖南公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插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我记得你到延安中学读书之前，我就向你谈过，你要同先生们、同学们团结合作，在先生们和同学们面前，不要怕自己吃一点亏，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宁肯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

《给刘允若的信》(一九五五年)

他(指刘少奇)曾对我母亲说过："你看人家刘×(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得不好，吃得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看不见，穿在外面大家都看见了吗！"……还有一次给战士縫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小孩，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小孩多累，去縫衣服又松快，又是群众場合，大家都能看到"。

刘涛、刘允真：《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二）极力鼓吹私字当头、名利挂帅

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党号召他搞，他不搞，说不合自己的志愿，那会有什么大作为。不搞社会主义要成什么家，不可能成家。即使成名成家，无非是××这种人，甚至身败名裂，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定的。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个人的成名，不能长久的，不要看这些，只有根据党的方向，历史的需要发展，搞几年就能成专家，搞得好就能成什么领导同志。

同　上

比较起来，还是上山（指"一二·九"以后。——编者）的个人成就比较大。那时上了山的北京大学生，现在有的都是地委书记，部长助理，有的是副部长，不上山的现在也在工作，但当不了地委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当时学地质，后来上了山，现在当副部长。但老学地质的，不能当部长，当不了。这是历史事实。

同　上

要是促退，还叫什么个人志愿，往坏处说，那是遗臭万年的问题。个人志愿是否实现，看你是促进还是促退。这是一个问题，方向正确就能促进，个人志愿就能实现。假如党掌握的方向是正确的，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人，眞正诚意，好好地去干，创造性地去干，都是能成功的。党和人民成功了，胜利了，为党和人民的方向努力奋斗的人也成功了，这是一定的。

党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党号召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号召土地改革，上山，打游击，他就干，不是成功了吗。当时当农民的人，现在当了将军。如果不根据党的指示，顺这一方向去作，不能当将军。那时候，有不少人比现在当将军的人聪明的多，他们以为上山打游击划不来，不去，就当不了将军。

同　上

我们成功了，也不过是因为跟着党走，党走对了，我们也走对了。所以你们能当社长、总编辑，否则谁要你们来当。

同　上

只有跟着共产党，个人才能成功，即使改了行。×××原来学化学，后来上山了，现在搞商业。鲁迅原来学医生，他觉得文学能代表人民说话。他们才成功了。假如×××还搞化学，顶多么象××这个人吧。

同　上

许多人想当专家、教授，也难怪。他们只是看到现在，看到专家、教授、部长最好，沒有

看到将来，将来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理想要落空了。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个人顺着历史发展，才能促进历史前进。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写上你一个名字，个人名利莫过于这个吧。

同　上

现在搞工业的，多数可以满足，但是工业也是各行各业，机械工业最多，但越是多，大家都干，越不容易出头。比来比去，恰恰是人少了的事出名，因为只你一个。

同　上

比先进，首先从这个问题比。第一比红，第二比专。红只能摆在第一位，如不红也可以变右派。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一手，要有两手，即还要专。只专不红，那只有一手。不红，即使搞得好，这或可以工作，但不能领导。领导即是处理各种相互间的关系，不按一定方针原则处理不行，……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日)

下去不是做乡、社干部，不是要求他们去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编者)，而是要他眞正的做农民，取得“农民”这个光荣称号，将来，如果群众选你做了县委书记，那么，那时候你将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的职务是县委书记，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本人成分是农民，你看，我给你设计的好不好。

《在工作组干部汇报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省长、县长、各级党委和青年团的书记、委员，都应该要求有农业生产经验知识，不懂农业生产的人，就不能当省长、县长，就不能在地方上做党委和青年团的书记和委员，至少今后提拔新干部都要从农村来提，这样大家就愿意到下面去了。

同　上

回农村去是光明还是黑暗？我说是光明。回村以后是当干部还是作农民？我劝你们回去先不作干部，先作农民，老老实实地学着种地。现在你们还不会种地，还沒有农民的资格，至少在种上三、五年地以后才能学会。到那时候，农民能作的事情你们都能作了，讲种地你们和他们一样，讲文化你们比他们高，因之，你们第一会种地，第二有文化，第三再加上你们和农民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大家都说你好，都说你办事好，政治上好。到那时，人们就会选你们当社长、当乡长、当县长。

《在郑州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

我劝你们回乡后不当干部，连会计都不当，……认眞地种三、五年地，到那时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比任何农民都不差，你们有文化，农民沒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上一条跟群众关系搞得好，具备三条就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以到中央，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你们是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第一代要得便宜的，参加革

命我是第一代，现在成为中央委员，第二、三代象这样就不成了。

《在河南许昌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

种了三、五年地以后，第一讲种地，那一门不比别人差，农民能干的，你们都能干；第二，讲文化就比现在普通农民高；第三，就是和农民关系好，这就是政治关系好。所谓搞好关系，就是能帮助别人，不欺侮人，取得农民的欢迎、信任、拥护，不感到你们脾气大、架子大。有了三个条件：劳动好，文化好，政治好，这样你们在群众里就有人欢迎了，那时如果选举，就可能选你们当人民代表、生产队长、社主任、乡长，你们也就当得了。……只要有了这三条，那时你们还可以学特殊的农业技术，你们就比别人有更多更便利的条件当干部了。

《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人生在世都要准备几条办法，前朝古人做事也要准备上策、中策、下策；上策不行，中策；中策不行，下策。这是中国的哲学上历来就有的。

同　上

同我一起读书的，人家进了大学，我看今天他们不一定都比我好。

同　上

凡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人，人民最信任的。吃苦的事情避开，有好的事抢着去干的人，谁又敢信任呢？

同　上

我们要死，大概你们也要死，中央的人要死，省、县里的人也要死。难道省、县的人就不死？死，谁最有可能代替呢？就是你们代替，你们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年龄，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死。只有种过地、又有文化，群众关系好的人最可能代替我们，就看你们那个人这样做。这样讲来，有沒有前途呢？我看前途是远大的，条件是要你们吃几年苦，学到知识，同人民搞好关系，前途就好办了，有人说，种地就不能当科学家、专家了。我看也不一定，谁说一定要大学毕业才能当专家、科学家呢？高尔基、米丘林、牛顿、爱迪生、瓦特也都是大学生吗？不是的，有的人小学也沒有进过。……所以你们的事情还沒有完，即使去种地也要继续学习。

同　上

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

《给刘允若的信》(一九五五年)

假如有了这样三个条件——会种地，有文化，政治上好。有了这个条件，到那时就会怎样呢？乡里不是选举吗？就可以选你当社干、乡干、当乡长、当县长。这样就当上干部了，但是必须有三个条件。你们好好在乡里搞，将来还是可以当干部的。也可以进城。将来人都是要死的，北京的人要死的，省政府的人要死的，厂长、铁路局长也要死的，你们也

要死的，但是你们年轻不是死得那么快。……这些人要死是肯定的，你们年轻也是肯定的。你们有文化，但是差两个条件，一个是会种地，一个是要和人家搞好关系。就要在人家面前吃亏了，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不要怕吃亏，这样关系搞好，农民就会拥护你们。

《在郑州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

只要你受得苦，能发奋钻研农业技术，向老农学习，这样日久天长，群众关系搞好了，生产斗争知识也有了，群众自然会找你，拥护你，选你做更多的事。你有了先进的农业知识，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会把你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这样你的伟大理想也实现了。

刘维孔：《革命后代应当干什么——记刘少奇委员长教导我参加劳动的经过》(一九五七年)

恐怕这样讲一讲，他们下乡种地也就高兴一点，而不是倒霉地下乡种地，垂头丧气的下乡，而是高高兴兴地挺起腰杆子下乡。他会认为我要实现我的理想，则发展前途更好。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那些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以为在技术工作中埋沒了他，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斯达汉诺夫① 就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一时，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因此，使他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前进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五十页

现在还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安心作这工作，长期的坚决的作这工作，最后出风头的还是你们。

共产党出风头的，就是最不想出风头的人，如果你愿做一些人家不愿做的事，不怕倒霉，不怕困苦，自然得到同志的拥护爱戴与推荐，这风头便是你们出了。相反的，你专门想出风头，好的事情你便去居功占便宜，倒霉的事总想推别人，沒有你的份，这样党和同志决不会捧你的。

《对盐城保卫人员训练班的讲话》(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种工作，非常实际，在开始时，要埋头苦干，要切实解决问题，不能浮夸，不能出风头。但在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后，你又能在全局上来指导这个运动，使群众得到一定的利益，以后，群众就会把你当做她们的好朋友和领袖的。不实干，就要出风头，跌下来，还是要从头做起的。

《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一九四五年四月)

如果你眞能干，党一定会提拔你，决不会长久埋沒人才的。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秋)

刘少奇对我们贾政式的教育，除了孔子的"三十而立"，老子的《道德经》"正人先己，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明哲保身，自由主义)，还加了不少"新时代的特点"。

五九年，我已在争取入团，他就对我说："不怕吃亏，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大家。长期这

① 原版在斯达汉诺夫之前有爱迪生。

样坚持做下去，不要为一时的挫折而动摇。这样经过一个时期，你就可能入团；再经过长期的努力，你就可能入党。”让我们立大志，树雄心。他说：“不管作什么，当农民也一样，干得好，工作能力强。就会当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书记……不要自己向上爬，别人也会选举你。”六五年，他又说：“做工作，总会要提升的，也会有情绪。……”他还自吹自擂地说：“你想要得的，一定得不到；你不想得的，倒能得着。你看，我以前根本沒想着当国家主席，杀头也不顾，现在不也当上国家主席了吗？”

刘涛、刘允眞：《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事情。将来要记载在历史上的。

刘维孔：《革命后代应当干什么——记刘少奇委员长教导我参加劳动的经过》（一九五七年）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应该吃点苦，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在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想为人民服务，贡献给国家人民，这样的人不少，特别是大学生，至于如何贡献那是另一个问题，有的把办法搞错了，如先专后红，有的是个人主义，有的是眞的想有贡献，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若干问题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

但是我看到他们（指青年工人。——编者）的劳动操作大都很简单，就只会那一门，他们现在情绪很高，但是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以后，还是作那一门，我看会要闹情绪的，跟我们的速记员和译电员一样，开始搞译电员很高兴，速记员也很高兴，搞了七、八年上十年，就闹情绪了。只是搞这一门，搞到二、三十年，我看他们的情绪不会高。

《关于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工会工作）不是沒有前途，这种思想不对，那种工作的前途会有这个工作的前途大呢？问题怕自己不进步，不学习，将来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工业工会干部……不安心，怕无前途是不对的，用不着担心，今天已经有了铁路，大兴纱厂等，不要赶时髦，时髦是一时的，工人与工会将来也是要时髦的。

《在赴哈职工代表各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只要他眞有本领，眞能起积极作用，则虽然今天沒有重要地位，到明天、后天仍会有重要地位给他的。

《在华东党校的讲课》（一九四一年）

“不管做什么，当农民也一样，干得好，工作能力强，就会当生产队长、大队长、公社社长……”“下连当兵将来会当连长、营长、团长……”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

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爭的鍛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爭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鍛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第四——五页

不能沒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集合起来即是整体。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民族利益也要服从世界利益，有时就要吃点亏，只要对世界有好处，那好处更多嘛！

这就叫矛盾的统一，而不是矛盾的破裂，人民內部讲团结、即是统一起来。也可能閙事，因矛盾有统一性和斗爭性。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们加入党，是看到个人问题横竖解决不了，先解决国家利益，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个人问题也解决了。随着大家利益的提高，个人利益也会提高。只要有贡献，社会一定有适当的报酬，不会大家都好了，你餓饭，那是阶级社会的事。

同　上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其中沒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的工人，国家机关中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合作社的农民，他们的劳动是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是直接为着他们个人的利益。……但是只注意增加生产，增加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注意增加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是不正确的。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一九五六年五月)

凡是把个人志愿和党的方向一致起来，眞心诚意地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奋斗的人，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个人也就胜利了。否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独立”的个人志愿，其结果幷不美妙，有的甚至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道路。①

《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社论)

广大的劳动群众进一步地看到了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依存于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看到了个人幸福依存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因而他们在劳动中表现了共产主义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

《“八大”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党还要号召人们去作许多事情，需要很多人。作得好，会有成功，党会成功，人民会成功，个人也会成功。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一点好事，就会拥护你。

《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一九四五年四月)

① 此文是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写的。

个人利益一定要照顾，沒有个人利益就沒有集体利益。六亿五千万人的个人利益集中起来就是整体利益。因此，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先公后私。

《在接见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

不要顾两头，要奔改造服务的这一头。要一边倒，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有了这一头，就有那一头，沒有这一头，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也是顾不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利益的人是搞不到个人利益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会有个人利益。只顾一头，反而会有两头。因此应当一心一意一边倒，顾一头，不要三心二意顾两头。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信任共产党，往这个方向奔，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一头我们照顾，如顾不到，你们提出来，这样坚持为人民工作，做了多少年，总会有好处的，总会有前途的。

同　上

你们里面有些人很年轻，又有文化，应尽量地参加劳动，肯定有前途。你们看到我们有些干部学得这么快，比你们內行些，这一条是因为只顾一头，和群众搞在一起。工商界是不是也能够做到呢？你们有经验，有技术，有文化，只要顾一头，别顾两头，同群众打成一片，改造就会好，问题在于你们相信不相信。

同　上

世界观的改造只能慢慢来，不能强迫，要经过细致的工作。别人可以帮助，决心要自己下，方向就是这样。我们提倡这个方向，以便你们丢掉包袱，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这样做，共产党会高兴，劳动人民会高兴，其结果不是一头沒有了，而是两头都有了。

同　上

“每个人应该有所作为，力争上游，应有伟大的个人理想。”“个人志愿是否实现，看你是促进，还是促退。这是一个问题，方向正确就能促进，个人志愿就能实现。”

《在北京日报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当工人同志说：“我们以厂为家，为六亿人民服务”时，刘少奇则说：“也是为自己服务”。

北师大井岡山公社搜集整理：《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江南造船厂的言论材料之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与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而后者即对于个人来说，它的进步性也极有限度，并且是沒有前途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九年版)

人生观就是怎样做人，活着干什么，怎样做好的人，更多贡献，作用更大，……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消费，不只消费，还要生产，消费一百，生产八十就欠帐了。……一个人的生产如能养活十至二十人那就好了，如能养活了三至四人，那就不能建设，问题是社会总生产、

总消费一加一减很简单，有多少积累，搞多少建设。对整个人类及个人也是这样。

《和王光英一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　件

《十条论对人的态度》——刘少奇

1. 看问题要透骨敏锐，不要小聪明，不要爭面子，对发生的事情，要透彻分清，全面了解。

2. 要消灭表面主义、印象主义，应当用理智去判断每个人的变化和发展，决不能用静止的眼光对待事物和人。

3. 糊涂一点，不要多疑，不要过敏，应当本着大事情清楚，小事情糊涂一点，原则性问题清楚，非原则性问题糊涂的精神。

4. 对內不应该以牙还牙，有报复的心理，对同志报复的恶果会发生內部分裂，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

5. 消灭一切成见，成见会阻碍一切工作的开展，会引起人事纠纷，应该平心静气地注意事物的发展和他人的意见。

6. 对人诚恳热情、作到单恋的态度，一个认识清楚的工作者应该做到以诚恳热情的态度对待一切所遇到的同志和朋友。如初次诚恳的态度得不到对方的共鸣时，应以诚恳、单恋追求情人的精神去追求工作的对方，诚恳地帮助对方，感动对方。

7. 肚內能撑船，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根据客观事实去说服纠正工作。

8. 限制自己，承认别人，限制自己的个性，承认别人的存在，切不可看不起别人，轻视别人的能力，绝对不能独断独行，包办代替。

9. 要有老年人的心肠，认识他人的缺点，不能把缺点认为永远地错误，要原谅他人，要进一步以老年人的心肠去关心他、帮助他、劝试他，使他健全起来才行。

10. 容忍他人、苛求自己，不出无理的气，不找无味的苦恼，专心工作，努力学习，保重身体，爭取伟大的共产主义早日来到。

清华井岡山兵团转抄

（三）宣揚叛徒哲学，炮制叛徒集团

什么也要准备两条路，比如打仗，谁也准备打胜仗，一个好的指挥官在作战时，口里讲的只准打胜仗，不准后退，其实心里有个打算，万一打败了，还不是要"开溜"。

《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就个人来讲，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基本问题是一个想头，"一念之差"的距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他要反动，也是"一念之差"。我们就有很多共产党员，本来

是眞想革命的，但是后来当了叛徒，跟蒋介石一道反对共产党。比如叶青……所以立場的变更，是容易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一下子可以变过来，因此其他阶级也可以一下变过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但是根据最近的经验，在敌人力量很大的地方，有一些人加入维持会是被强迫的，还有一些人加入维持会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对于这些人我们也不能一律把他们当作汉奸来处罚，只应该很轻的责备他们，要他们改悔，要他们在以后帮助游击队，接受游击队给予他们的任务。

《关于抗日游击战爭中的政策问题》(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因为日寇的压迫，有时人民还不得不向日人报告游击队的行动，游击队还应当谅解人民的苦衷，不使人民为难，组织人民向日人谎报等。

《抗日游击战爭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題》(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刘少奇这个怕死鬼悲观地认为：事物的存在，就是向死亡发展，而最后结果还是死亡。生命就是死亡。人生的斗爭就是与死作斗爭，就是死的不断的克服，否则人都死了，原则还有什么用呢？

北航《红旗》：《打倒大叛徒集团头子——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因为中共在武装中保存了干部和部分武装，所以现在才能发展偌大的党，可是这只是在苏区中保存的，白区除了保存革命的旗帜外，工作上基本是失败的，这是工作的大错误，也是白区中的机会主义，这是犯着不去同合法斗爭与非法斗爭联系的错误。

但是部分的组织是保存的，河北省委保存了几十个干部，其次国民党监牢中保存了残余的同志。

《关于华北华中抗战的总结》(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

刘少奇当上了北方局书记不久就出卖了共产党员的灵魂，他假借中央的名义，给关押在敌人监獄中的共产党员下达黑指示说：你们可以履行自首手续。登报，写反共启事出獄。

北航《红旗》：《打倒大叛徒集团头子——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刘少奇向獄中人解释：党需要你们出来做工作，你们可以“假”自首出獄，可以登报，可以有反共內容。并说：登启事出獄虽然有些不好影响，但这样使国民党监牢中保存了残余的同志，保存革命的力量，这是正确的，这是合法斗爭与非法斗爭联合的正确方针。只要以后搞好革命，那点影响是可以弥补的……。

同 上

张闻天交待：一九三六年三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达北方局。不久，刘少奇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白区干部很缺乏。北京监獄中有一批干部，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就能

解决白区工作干部缺少的问题。监獄里边最近传来消息，“何梅协定”以后，监獄当局准备离开北京，想早一些处理这批犯人，监獄里的人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就可以出獄。来信中还附寄来獄中干部提出的三条請求条件。刘少奇要我在請求书上簽字，让獄中人知道中央同意这样办的。

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于是就私自写信、签字表示同意刘的意见。我沒有把此事汇报给毛主席，也沒有在中央会议上特别讨论一下。

北航《红旗》：《打倒大叛徒集团头子——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附录：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共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　周　斌　张家璞　杨仲仁　董旭生
刘华甫　夏维勋　冯俊斋　徐之荣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二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同上反共启事内容有：李即吾、王伯庆、张鹏德、刘俊才、胡锡昆、廖广謇、高仰云等人。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五日《华北日报》第二版，转引自北航《红旗》：《打倒大叛徒集团头子——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四) 提倡反革命的“合二而一”謬論

矛盾的最基本的性质是矛盾的统一性。

《人为什么能犯错误》

党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呢？这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结构，是矛盾的统一体，即两个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而存在。自然科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每一物体，都是这么结合成的。世界上已发现有九十四种原子，每种原子都是由阳电子和阴电子结合成功的。阳电子和阴电子是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新的东西。例如，金子是一个阳电子，七个阴电子结合成的，水银是一个阳电子和八个阴电子结合成的。由于电子结合的数量的不同和运动的不同，这就造成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事物。一定要两个相反的，矛盾的东西加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新的东西。结合不等于混合，不是总合，也不是“+”号。相同的东西加起来只能有量的增加，不会有质的变化。例如，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一升米加一升米仍是米。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

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

我们共产党也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结构是支部。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九四一年秋）

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反映党的上下级关系，反映党的结构矛盾，……我们的方针是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不去扩大它的斗争性）。

《人为什么能犯错误》

党与干部也是矛盾的统一，……我们的立場是利用统一性。

同　上

基本上是不对抗的矛盾，可以调和的矛盾，可以相互斗爭，又可以相反相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是可以用改良主义方法取得的。

同　上

差别的东西，是沒有形成的矛盾，是矛盾的萌芽，是可能发展成为矛盾而尙未形成的矛盾。

同　上

党的调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及”，但思想斗爭过火，也要变成机会主义的“过”了。

“过犹不及”都不能保护马克思主义的安定性，所以我们要反对“过犹不及”。

同　上

（五）兜售假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还沒有到共产主义，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准备好条件，将来到共产主义就不要重新改组了，利用现在的这些，再加上一些东西就行了。

《对全国妇联党组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

城里的青年长大了大批下乡；农民呢，当临时工大批进城。这样，就使工人同农民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慢慢地缩小了。

《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人人都来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现在这么多人脱离生产，共产主义就来的慢，反之就可以早点到。

《与河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有人说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之后再实行共产主义，还是先实行共产

主义制度，同时就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与共产主义觉悟？恐怕这件事情是相互促进的。物质上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行，在精神上也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在江苏省、南京市和驻宁部队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是不是可以利用劳动力紧张这么一种情况来做好这么五件事情。使社会上一切有劳动力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要有闲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妇女；进行技术革命，改进劳动工具，改进社会劳动组织；学多面手，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文化水平。那么，做好以上这五件事情，我想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很大的一个促进，一个很大的好处，就要使我们国家提早或者说促进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同　上

社会主义不仅要改造所有制，还要改造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改造社会的各种生活。物质世界改变以后，就可以反映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上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对劳动部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按需分配是否一定出懒人？给了他，更容易教育他。先给你吃饱，你不好好工作，就好批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信任劳动人民，这样有利于教育，有利于改造懒人。

《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一九六〇年）

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时是一些空想，可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沒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者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对全国妇联党组同志谈话》（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

一百年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天做四、五小时工，其余时间做些什么？统统玩？都去跳舞，打牌，这样就会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势必还要学习，搞一些业余活动。有的唱戏，有的画画，有的跳舞，有的写小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所谓政治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还有演员、演电影的、唱戏的、画画的，都变成业余的，不是专业的。也沒有专门的文学家，每个人都可以写小说，文学家也要去劳动四、五小时，可能有某种科学研究，到紧张阶段，要专门研究半年，一年多，那是临时的。

《在江苏负责干部会议上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

不要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由那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少得多的。中国要到六十亿人口，一个人睡一个床怕不行了，说不定要轮班睡。马路上走路也不能乱走。人